



引用格式:薛庆超.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1): 1-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01-09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The great turn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薛庆超

XUE Qingchao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北京 100017

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主要经验。当前,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立潮头的历史创造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国际战略,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新的辉煌。

关键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 2018-12-24

[作者简介] 薛庆超(195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局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讲座教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

习近平指出：“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1]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果断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一系列关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书。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既具有历史性、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前瞻性，全面论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始终不渝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缘起，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有利于凝聚整个社会共识，有利于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有利于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全面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征程。

一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制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和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2]10-11}

二是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拨乱反正。关于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功过是非，全会

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3]关于“天安门事件”,全会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3]。“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3]。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共中央开始认真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是用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

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3]。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确定新增中央领导成员分工,对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步骤,对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全会决定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3]。

四是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2]309}邓小平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党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作用自然形成的,是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结果。邓小平长期的革命实践、丰富的历史经验、卓越的政治智慧、恢弘的世界眼光、精辟的理论阐述、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开放意识和深邃的治国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前进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2]298-299}。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

一座历史丰碑。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全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在全党与中央的核心地位,增选中央领导成员,这是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随后,针对“十年内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危害,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经济调整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决策,李先念代表中央分析经济形势,论述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是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国民经济工作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集中

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遵义会议到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夺取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严重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致使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肆意践踏。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方针又造成党内思想理论极大混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形势要求和全党愿望,重新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基本内容,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根本原则,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完整的准确的科学体系,这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年徘徊”期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恢复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行新的发展,针对过去多年存在的“左”的思想僵化情况,提出对过去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结论,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辨别,对错误的东西拨乱反正,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4]

二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但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工作中心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了过去长期未能解决的工作中心转移问题,明确决定把全党工作中心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除非有大规模外敌入侵,绝不能动摇和干扰这个中心。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极大地发展生产力,极大地繁荣科学文化,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惟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在新形势下,及时地果断地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从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宣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等错误理论与观点。以此为开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安定团结,改革开放,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新时期全党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顺应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潮流。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开端,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三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过去那种违反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个人说了算和个人崇拜现象。同时明确指出,要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坚决纠正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并且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要求少宣传个人,多歌颂人民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代革命家;加强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 and 组成人员,会后接着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和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又犯了新的错误的同志,主要不是清算过去的“老账”,而是着眼于现在,既要看到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又要看到他们曾经做过有益的工作,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在处理党内问题上重新恢复了党的历史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做法和优良传统。

四是决定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突破口。突破一点,带动全局,大获成功,大见成效,深得人心,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对此,无论怎

样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平反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以前,对于冤假错案以“两个凡是”为基本原则来对待和处理,甚至置之不理、不管不问;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后,一切以“两个不管”^{*}作为基本原则来对待和处理。平反冤假错案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步骤。在此之前,凡是毛泽东批示过的案子、凡是毛泽东决定了的案子,都不能触动,更不能纠正。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彭德怀案”“陶铸案”“六十一人案”“右派案”等大案,凡是实践证明错了的都可以彻底纠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十年内乱”中长期受到禁锢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平反冤假错案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坚实基础和必要条件。平反冤假错案清除了改革开放的重重障碍,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民族、统战、侨务、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在“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错案,凝聚了人心,化解了消极因素,调动了积极因素,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领导核心。

五是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决定: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

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20多年乃至30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除极少数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者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诚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按照这个决定,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以及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摘掉了帽子。这就充分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使亿万社会主义劳动者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等,妥善解决了大量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促进了全国安定团结局面的发展,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热烈拥护。

六是从根本上纠正了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通过端正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解决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伟大转变。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坚决地、全面地依靠群众和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从此,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实现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

* “两个不管”是胡耀邦提出的,即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论世界风云如何急剧变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会始终不渝乘风破浪向前发展。

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主要经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6]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得出的结论。当前,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发展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我们要立足现实,谋划未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立潮头的历史创造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然而由于继承者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精神,造成理论僵化、思想退化、组织蜕化、干部老化,最终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74年的时候,竟然未经一枪一弹,在1990年代轰然倒塌,自行解体,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千载遗憾。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开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

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立潮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新的历史辉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发展。进入21世纪不到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进入了新时代,但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立潮头,在理论上、思想上、实践上,根据21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国际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像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那样,像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开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样,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辉煌。要充分运用世界格局扑朔迷离、风云变幻、千载难逢的这段机遇期,充分运用改革开放40年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充分运用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宝贵经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强大自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韬光养晦、发展自己的国际战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要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战略力量严重失衡。面对世界局势急剧变化,邓小平高屋建瓴,妥善应对。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990年12月,邓小平讲:“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992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为此,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从此,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即简而言之“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便成为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战略方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邓小平全局在胸,深思熟虑,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他访问美国期间,坚持原则,化解矛盾,赢得美国朝野普遍赞誉。他访问日本期间,实事求是,提出应对钓鱼岛问题的高明对策,赢得日本政界和舆论的广泛赞同。他抓住机遇,果断实现中国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他超越意识形态束缚,在苏联解体后,指导中国外交抢占先机,使中国与东欧一系列新成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始终牢牢掌控应对国内外形势的主动权,“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始终不渝地坚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成效显著。从197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当美国手忙脚乱地充当“国际宪兵”“国际警察”,声称要“领导世界”实则是妄图称霸世界的时候,中国则通过“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悄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坚定奉行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7]。

三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对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贡献。19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盛衰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说明。当时,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形势,提出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其实质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的工作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与苏联和东欧一系列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签订一系列互助合作条约,对苏联和东欧各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获得大批

经济技术援助,新中国迅速站稳脚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共八大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中共八大路线实行一年就中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三大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到中共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这些历史性转变和实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认识日益成熟、深刻和完善。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迅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高歌猛进,才实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彻底解决曾经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中国彻底解决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伟大贡献。总结经验,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7]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人民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整个人类的进步、文明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 - 12 - 18) [2018 - 12 - 22]. www.jjckb.cn/2018-12/18/c_137682263.htm.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 (2013 - 06 - 05) [2018 - 12 - 22]. politics.rmlt.com.cn/2013/0605/151317.shtml.
- [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EB/OL]. (2018 - 06 - 27) [2018 - 12 - 22]. https://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80627/32587297_all.html.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
- [6] 习近平. 2018 年新年贺词[EB/OL]. (2017 - 12 - 31) [2018 - 12 - 22]. https://www.sohu.com/a/213893600_301529.
-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 - 10 - 28) [2018 - 12 - 22]. cpc.people.com.cn/nl/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引用格式:张乾元,刘甲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探索与基本经验[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10-16.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1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 对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探索与基本经验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s basic experience

张乾元, 刘甲星

ZHANG Qianyuan, LIU Jiaying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调节在经济领域中辅助作用的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都表明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成就,一方面是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割裂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突破;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大发展,主要体现在壮大了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得以增强。其基本经验有:(1)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根本保证;(2)改革要遵循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3)以回应问题与推动发展与实践旨归,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4)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新经验、实现新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政府;
市场;
中国共产党

[收稿日期]2018-1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VZT002)

[作者简介]张乾元(1965—),男,湖北省广水市人,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刘甲星(1994—),女,安徽省阜阳市人,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九大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明确强调了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应然角色和关系。而对于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早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已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2]116}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地驾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既要新的实践探索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又要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寻找答案。本文拟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演变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我们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基本经验,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演变历程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在政府的推动下,市场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保持一定张力的同时也逐渐趋于和谐。

1. 市场调节的辅助地位逐步确立

其一,指令性计划的功能开始减弱,价值规律的作用日渐突出。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

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3]6-7}。这一论断以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问题为导向,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要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将权力“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这里虽然未提及“市场”字眼,但从本质上涉及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内容。从此之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重要性与具体措施便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频繁提出、反复强调。

其二,市场调节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其辅助作用逐步确立。1979年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发言提纲中指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4]。这些论述指出了市场调节在经济领域中不可缺失的地位,“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5]。邓小平在1980年一二月间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6],李先念直接使用了“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原则”^{[3]449}。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7]。这一《决议》,一方面明确规定了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的主辅地位与作用,并具体到经济形式层面加以说明;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8]350}。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被频繁提出,商品经济的作用得到了空前重视,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错误论断。

2.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从主辅作用到内在统一的转变

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确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而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进一步摆脱了计划和市场主辅地位的束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8]484},并强调所有制基础的不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可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由主辅关系转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统一关系。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8]547}这表明党和国家开始着手从宏观调控着手,从制度设计层面保证政府与市场内在统一关系的规范化和稳定性。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意义重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看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

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10]155}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0]226}这就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两种表达的侧重点和精神实质是不同的。前者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指令性计划不能违背但要符合市场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在这里,政府功能起决定作用,市场功能是在较低的程度起着作用,市场机制并不能起到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的作用。后者则注重在政府的推动下由市场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优化组合,各自发挥其优势。

3.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化为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作用的全新定位,这一定位也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中共十五大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11]。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2]。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13]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1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5]此后,市场不仅起到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还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必须认识到:首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前后两个继承的阶段,两者不能相互取代和否定。其次,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我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和前提的,是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实现的。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从而达到既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引导作用,又避免价值规律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以问题为导向,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转变呈现出渐进性、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不平衡性等特点。各个发展阶段前后衔接、层层递进,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成果,并取得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为壮大国家实力提供了更为持久、更深层次的动力。

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过程中取得的理论成就

其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曾指出,“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16]467}，“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6]474}，“假如生产是共同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要研究的问题”^[17]。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对生产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而市场调节也并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提出计划经济理论,也并未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等构想。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与发展实际,逐渐认识到计划与市场并非水火不容,且只有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才能够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就。

其二,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如突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地位、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关等经验。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便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允许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正面回应: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发展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基础即所有制不同;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其适用性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断地调整优化,这说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

其三,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割裂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突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其理论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割裂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唯一主体,政府作为“守夜人”,其职能是处理“市场失灵”。苏联的

经济建设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消灭私有制,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不相适应,从而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而在今日中国,政府既是市场的引导者,也是“市场失灵”的弥补者。因为,只有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才能破除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与弊端,从而让市场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只有这样,改革才可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我国一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强调这一作用的实现必须在政府的指导和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实现,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一是壮大了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13]。经济领域的发展也带动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协同发展。当前,我国各类公共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科技实力与国防实力显著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经提出就获得多国普遍赞许、纷纷响应,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按照中共十九大的部署,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世界的国家。毫无疑问,这些发展成就的取得和发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问题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逐步打破固

有的计划经济的藩篱,增加市场调节的比例,增强市场调节的作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和确立,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各种经济要素在市场合理、合法流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多样、更加持久的内生动力。政府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实现了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民营企业有了较为放松的发展环境。现代财政制度稳步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更加协调。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金融风险的发生率大大降低,在市场发挥的“无形”作用中,整个经济社会有序稳定发展。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得以增强。中共十九大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61}。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等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弊端,这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定的执政考验,也提出了提升执政能力的新要求。对此,政府通过改革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利用宏观调控稳定物价、实现充分就业、扩大对外贸易,推动了经济发展;通过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使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达到科学规划、综合平衡,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使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更加明晰。这些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不断增强。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基本经验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2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化

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 坚持党的领导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之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自身执政规律为己任。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其运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据唯物辩证法,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在制定一系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推动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在今后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关系,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仍要牢牢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正确领导,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也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优化顶层设计。

2. 改革要遵循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18]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摸着石头过河是指要大胆试验、积极探索、总结规律,在实践中获得真知;加强顶层设计则是要求从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高度作出整体规划和系统谋划。正是因为我们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遵循了这一方法论原则,才取得了政府与市场合力推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光辉成就。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的成功促成了中央作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设计;198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方案的通知》,决定进行简政放权的改革,山东省莱芜县被确

定为试点县市,“莱芜经验”也为后来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这都启示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首先要坚持渐进改革的方法论和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既要树立战略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实验先行—总结经验—归纳规律—逐步推广的工作步骤。其次必须认识到“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2]68}。新时代,我们仍要遵循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更好的制度设计和实践安排。

3. 以回应问题与推动发展与实践旨归,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之关系认知的历史嬗变,与以调整政府与市场之关系为核心问题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基本同步,并且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1)以计划经济为主,适当发挥市场调节作用;(2)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3)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实现了市场良好的微观效益、政府的绝对权威与运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的有效结合,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职能,同时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可以说,每一次调整都根源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都回应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因为其既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也不拘泥于社会主义各国长期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割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际,而是立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国情、最大的实际,坚定地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实践证明,在任何时候,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回应问题中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正确认识过去、准确把握现在和清醒面对将来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4. 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新经验、实现新发展

毛泽东曾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9]而具体到每一阶段,又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借鉴苏联建设经验,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集中有限资源办大事等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9]148-149}。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探索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深化对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推动实现两者功能的优化组合,力求实现两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相辅相成、互补共生。我们必须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实现新发展。

四、结语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牢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并且清醒地认识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必须有机统一,而非相互割裂、相互否定,更不能互为替代,既要注重发挥市场经济的激励与推动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确保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运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4] 陈云. 陈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245.
- [5]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8.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7.
-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5.
- [8]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50.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10]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5.
- [11]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
- [12]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9.
- [1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7.
- [14]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
-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
-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3.
- [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4.
- [1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1.



引用格式:许徐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建构的历史性贡献[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1): 17-25.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17-0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建构的历史性贡献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world discourse power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许徐琪

XU Xuqi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话语权得到显著提升,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论,进一步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和兴盛,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具有说服力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力量;二是促进了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有力地改变了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丰富了全球话语体系的内容,使原来处于话语边缘和失语状态的国家都开始在全球话语体系中谋求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三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四是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性,推动了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话语权;
现代化

[收稿日期] 2019-01-18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立项课题(Y201840793)

[作者简介] 许徐琪(1986—),女,浙江省杭州市人,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成功的政治话语。在这一政治话语指导下,我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认同度和影响力,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话语权。“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时,世界上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没有人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在多极化世界中最具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证明,人类历史并未终结,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感召力。”^[2]正是这种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使中国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论,促进了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

一、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论,进一步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和兴盛,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具有说服力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力量。

1. “历史终结论”曾经躁动一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东欧的失败严重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于是乎,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开始极力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争正走向终结,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

度取得了超越其意识形态对手的全面的、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所有的大问题都已经真正解决,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套方案定于“一尊”,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普适性的人类政府宣告成立。加上后来发生在东欧、拉美、亚洲和非洲如火如荼的民主转型浪潮,一时间,“历史终结论”躁动一时,似乎福山的观点是正确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功,福山转而开始批评美国衰败的政党制度。2014年,福山在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号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失灵了,三权分立的“麦迪逊模式”不仅没有做到防止个别利益集团的独裁统治,结果还导致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相互掣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侵入行政权的正当运作范围,最终导致政府决策缓慢、无效甚至失误;国会中的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干扰政府政策,操纵政府把本应该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有利于自己的开支,提高赤字预算;这种用利益绑架政府,甚至不惜牺牲普通民众利益的行为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在文末,福山批评美国政治制度腐朽,政府开支成本高昂,决策效率低下,国内政治弊病顽固不化,分权制衡和两党斗争带来的无休止的纷争和过分的约束演变成了互相否决的游戏,政客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只是不想切断自己的利益才不愿意触动改革的神经。因此,福山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福山的观点何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除美国社会本身出现的衰败迹象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与新自由主义日益遭受世人质疑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2. 历史没有终结,社会主义不会灭亡

“历史总是按自己的逻辑向前演进。主观臆断终究抹杀不了铁一般的客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的活力与生机。”^[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得西方盛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不攻自破,世界见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和兴盛,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翼政党都期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从低潮走向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迎来新的春天。“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4]即便是在当年苏东剧变的严峻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有着超常的智慧和清醒的头脑,对时事的分析有着非同寻人的敏锐眼光,坚信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邓小平)^[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成功的实践证明了中国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中国拥有13多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一股重要力量正在展现出它的独特魅力,它有力地打破了西方鼓噪的“历史终结论”的谬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领域的生动实践,进一步证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的提升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实践,具有强大的、有说服力的

科学性和真理性力量。

二、促进了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力地改变了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主导的全球话语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搞世界话语霸权,而是倡导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话语体系,丰富了全球话语体系的内容,为世界提供了更多话语表达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原来处于话语边缘和失语状态的国家都开始在全球话语体系中谋求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1. 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曾一度主导全球话语体系

话语权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平等的、可以互动分享的,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世界中,话语权存在大小、强弱之分。长期以来,西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所获得的早发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构成的强大物质力量不断侵袭征服异域,并顺此将西方文化传播全球各地。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各种西方语汇,特别是作为近代学科发展产物的各种西方术语,亦随之四处扩散传播,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7]西方话语霸权对世界和平造成了严重后果。“寰宇世事,操之在耳”。个别西方国家总是把自己的经济制度、政治理念、伦理道德标榜成世界上唯一优越的模式,以“天命神授”的姿态对别国政治进行强权干涉。追溯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近看21世纪西亚、北非的动荡乱象,无一不显示出是西方话语霸权在作祟。这种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实质是在不顾他国利益、牺牲他国人民和平与幸福的前提下,大肆掠夺他国资源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丑陋行

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等理念和价值诉求显然是对立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当今世界格局已经不是过去的单极世界了,单极时代开始走向终结,世界多极化时代的曙光已经来临,面对多元话语蓬勃发展的事实,全球话语体系正在改变以往那种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语霸模式。

2. 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话语体系

未来的全球话语体系不可能再是一个中心、一种模式,那种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主产地和传播渠道控制者,又是内容与手段操控者的话语霸权图景将消弥,随之出现的将是东西方在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合作共赢的良性局面。全球话语体系差序格局的背后体现的是硬实力的强弱。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力的不断壮大,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格局开始出现变化,全球话语体系的格局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一方面,由于最近几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不断遭受理论质疑和实践困境,导致西方话语霸权的地位开始动摇,日益显示出力不从心的局面。从1970年代开始,以英美两国为主导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以霸权式的手段在全球强制推广且迅猛扩张,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曾占有统治地位。然而,自从2008年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自由主义便开始遭遇“滑铁卢”,特别是“使不少青年、民众,乃至政治家、决策者和相当多的资深经济学家,又想起了马克思”^[8]。一时间,新自由主义不仅遭受来自其接受、推广国家的批评与责难,就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失败。正如2016年3月特朗普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所说的:“我们不该再进行所谓的意识形态建设了,事实证明效果不大,而且现在的美国也与过去的很不同。我们不该再继续向其他国家

推销我们的意识形态了,他们不需要我们做这些。”^[9]此外,原先处于全球话语体系边缘地带和失语状态的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开始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和争取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这势必会对现有话语体系构成挑战。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不会主动拱手让出话语权的,它们会千方百计地巩固原先话语霸权的地位,这必然会导致全球话语体系之间冲突、对立、矛盾等现象的产生。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一直致力于改变全球话语体系的不平等现状。中国提出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政策、策略,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且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10]与西方话语追求的“唯我独尊”“至高无上”截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商共建共享”,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话语体系,这为当今世界大大增加了和平因素。新自由主义纵然历史悠久、派别众多、理论体系庞杂,但由于其表里不一、强行霸道的本质特征,终究经不起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残酷现实中开始面露衰色。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不是话语霸权,我们倡导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以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目标,通过探索共赢发展之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更多的力量,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更多的表达话语和解读方式,以丰富全球话语体系内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亲和力和说服力。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打破了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神话地位,打破了全球话语体系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单一模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单一世界政治格局和权力体系

格局,有力地促进了世界政治格局从单极向多极的发展。

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11]10}。

1.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西方,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其实,现代化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一种模式。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即原发型现代化、后发型现代化、新发型现代化,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模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原发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即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并没有经验可循,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因此,原发型现代化模式具有缓慢、稳定、渐进、和谐的特征。后发型现代化模式是指后来居上的国家以原发型国家为样板,这种模式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具有快速、突进的效果,但是后来居上者由于内外环境等原因,如挑战和逼迫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协调、不和谐甚至冲突、动荡等现象。新发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与前两种相比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它们在借鉴原发型和后发型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又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因此民族性和多样性是新发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征。历史上,西方国家

现代化大多伴随着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即使是现在,某些超级大国依然延续着这种发展模式。这种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满足自身欲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不会长久,而且已经遭到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摒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2]“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1]36}那种视西方化是现代化唯一途径的错误思维正在不断地被实践抛弃在历史的尘埃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的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没有复制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走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掠夺和扩张的老路,而是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连在一起,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与世界一道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证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中国道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2. 中国方案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在世界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西方政党热衷于搞“拳击赛”,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接力赛”,而且这种“接力赛”有蓝图、有规划,这是西方国家没有且羡慕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完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现在正在谋划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的细化。2020年即将到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因此,对于第二个

百年目标,我们党又将之细化成两个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11]²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就是在这样一步接着一步的完成中实现的,这就像“接力赛”,一棒接过一棒,向终点奋进。今日之中国已经从一个现代化的参与者成为现代化的领跑者。这样的成绩让世界各国都羡慕不已。世界从未像今天经过近年来的发展,这样渴望治理方式的迭代创新,而中国道路的探索和成就,恰恰适时地激起了世界新的思考。今天的中国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表明中国正在快速地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时机,中共十九大已经不仅仅是国内社会热议的重要话题,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借鉴价值、社会主义的真理性、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一带一路”、新四大发明、反腐倡廉、执政党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都是此次大会之后各国政要和学者热议的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世界的贡献是提高了世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信心,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智库开始研究中国的成功之道,试图破解中国成功的密码。^[13]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期待学习、分享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以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2017年3—6月,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凯度华通明略(Kantar Millward Brown)、Lightspeed合作开展的第五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结果显示,海外受访者普遍认同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

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普遍看好中国的未来发展,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会持续增强,高达3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2017年在越南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菲律宾前众议长德贝内西这样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14]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这样评价中国:“与全球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是中国越来越自信的体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中国的朋友圈必将会越来越大。”^[14]除发展中国家外,发达国家也开始正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017年11月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首次分别用中英文写着“中国赢了”“China Won”,文章指出:美国虽然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正在赶超美国,美国则在走下坡路,中国在世界舞台将会占据中心位置。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因对于《时代》周刊的文章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让西方无法视而不见,让其他国家无法置身事外。”^[15]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肯定,更是让国内的人民群众备受鼓舞。“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中国共产党”,一时间,“厉害了”成了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这个通俗易懂的词,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自己国家现代化成就的认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心,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世界有理由对这样一个时代抱以期待。^[16]

四、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模式

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成功。^[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打破了过去西方国家普遍信奉的“历史终结论”的谬论,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性,而且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推动了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堪称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我们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话语权强有力的实践证明。

1. 苏联模式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其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挫败。社会主义制度明显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高度民主、经济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的高水平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自由,等等。但是十月革命发生在经济社会不发达的俄国,这就使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极其艰难的任务。虽然列宁曾经采用“新经济政策”来大力发展国内生产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斯大林执政下的苏联模式大大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和平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亟待改革与调整。遗憾的是,苏联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先是斯大林拒绝改革,再是赫鲁晓夫想改革却又未能走出斯大林模式,然后是勃列日涅夫停止改革,到最后戈尔巴乔夫胡乱改革,另外再加上西方国家长期和平演变等复杂原因,最终造成了苏联解体的悲剧。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史无前例的重创,许多西方学者纷纷断言社会主义已终结,然而,仍然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政党组织和个人活跃在当今世界政坛。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为处在低潮发展中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正如邓小

平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5]382-383}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描述多侧重于设想、期待、憧憬,并没有身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年代,因此他们在其著作中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任何描写都不能被直接拿来套用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上面,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计划、蓝图都应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做出调整,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应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事实却恰恰相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俄国诞生的,后来出现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力状况也大致如此。因此,简单地直接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言论来建设各国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过时了、没用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要学习和遵循的。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吸取教训,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特别是一些具有共性的认识,比如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监督与建设、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借鉴资本主义优秀成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等,这些可以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借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自身的实际国情和时代特征制订出具体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

社会主义实践的巨轮,早已抛弃那些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东西而破浪前行,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革除了和正在继续革除苏联模式弊端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绝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说过的但不适合于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论述,而是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辉煌事业的新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更新和超越,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做到尊重劳动、解放资本、约束权力,成功实现了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推进改革开放,破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初步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属于重大理论创新,开启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在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又奋斗了二十多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自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

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11]10}。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大力打击腐败,重新塑造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反驳了西方所谓的“只有多党制才能反腐败”的言论,使得“反腐败党,不反腐败国”的谬论破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胜利,也与苏联时期共产党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胜利。2017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中国学论坛上^[19],斯里兰卡前外交部部长尼哈儿·罗德里格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重要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对中国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全世界也都是一个好消息。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杜进森教授表示非常有意向与中国合作,他认为越南应该学习、研究、探讨并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创造。杜进森认为,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并且他希望越南能和中国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就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领域进行合作研究。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荣誉教授伊扎克·希霍认为,虽然中国表示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其他国家学习、研究甚至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02).
- [2] 任理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贡献[N]. 人民日报,2016-05-19(07).
- [3] 刘新如. “中国方案”的时代意蕴[N]. 解放军报,2016-07-27(07).
- [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14.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1-06(01).
- [7] 陈正良,周婕,李包庚. 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J]. 浙江社会科学,2014(7):78.
- [8] 曹天予. 权力与理性——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
- [9] 张新宁. 特朗普现象:内忧外困的资本主义世界悄然发生重大变化[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0):72.
- [10] 黄宗良.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85.
-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3.
- [13] 任理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贡献[N]. 人民日报,2016-05-19(07).
- [14] 世界这样评价新时代的中国领袖[EB/OL]. (2017-11-13)[2018-12-14]. <http://www.ccln.gov.cn/hotnews/269298.shtml>.
- [15] 中国模式,为何西方无法视而不见?[EB/OL]. (2017-11-20)[2018-12-14].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7/11/20030767241.shtml>.
- [16] 胡泽曦. 全球“同步解读”凸显中国分量(盛会说)[N]. 人民日报,2017-10-24(05).
- [17] 陈曙光. 深入理解把握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7·26”重要讲话精神)[N]. 人民日报,2017-08-03(07).
- [18] 黄宗良,项佐涛,古明明.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社会主义改革 60 年: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的对话[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1):4.
- [19] 徐海娜. 全世界都渴望了解新时代的中国——第七届中国学论坛外国学者观点荟萃[Z]. 当代世界微信客户端,2017-12-20.



引用格式:欧内斯特·拉克劳,李西祥.虚空能指缘何对政治重要?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26-31,47.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26-07

虚空能指缘何对政治重要?

Why the void index is important to politics?

欧内斯特·拉克劳^{1,2}, [译者] 李西祥³

E. LACLAU^{1,2}, [Translator] LI Xixiang³

- 1.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 2. 美国西北大学;
- 3.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任何意识系统都充满差异性,都是围绕着一个虚空的位置而建构的,这个虚空位置虽来自于生产对象的不可能性,然而这一对象又是系统的系统性所要求的。虚空能指这一没有所指的能指所指向的正是这一不可能性。霸权之争就是为争夺这一虚空能指而进行的斗争,因为社会建构性的不可能性只有通过虚空能指的生产才能表征自身,政治才是可能的。社会力量的不均衡性,使社会中的各种力量都倾向于霸权化不在场的共同体的虚空能指,对这一裂隙的建构性质及其政治的制度化的认识是现代民主的出发点。

关键词:
虚空能指;
霸权;
民主;
政治

[收稿日期]2018-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X005)

[作者简介]欧内斯特·拉克劳(1935—),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77)、《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1990)和《解放》(1999)的作者,并与尚塔尔·墨菲合著了《霸权 and 社会主义策略》,与齐泽克和巴特勒合著《偶然性、霸权、普遍性》(2000)、《民粹主义理性》(2005);李西祥(1971—),男,山东省泰安市人,浙江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双龙学者特聘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

[译者导言]在欧内斯特·拉克劳(E. Laclau)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虚空能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拉克劳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借鉴而来应用在政治领域中的,它是理解拉克劳的霸权逻辑的关键。可以说,不理解拉克劳的虚空能指,就无法理解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霸权、激进民主、解放等。这篇《虚空能指缘何对政治重要?》就是理解拉克劳理论所不可不读的经典文献。这篇论文虽只有几千字的篇幅,却意义深刻,蕴含丰富,讲清了虚空能指与霸权、民主之间的关系,不但对于我们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政治哲学理论提供帮助。本文原为拉克劳所著《解放》(*Emancipation(s)*, 1996)第三章。

一、虚空能指的社会生产

严格地说,虚空能指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然而,这一定义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能指并不附着于任何所指,仍旧是一个意义系统的有机部分,这怎么可能呢?虚空能指既然是一系列的声音,那么如果后者被剥夺了任何意指功能,能指这一术语就将成为一种僭越。声音之流从任何特殊所指中脱离而仍然保持为一个能指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它能不通过一种虚空能指的可能性所包括的符号颠覆达到内在于意义本身的某物。这一可能性是什么?

某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可以很快被丢弃。人们可能会认为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中(由于符号的任意性)可以附着于不同的所指。但是很显然,在一种情况下,能指将不是虚空的而是模糊的:在每一语境中意义的功能将完全被实现;在另一种情况下,能指不是模糊的而是模棱两可的:无论所指的多元决定(过度决定)或决定不足都能够阻止其完全固定。但是这种能指的漂浮并不能使其成为虚空的,尽管这种漂浮使我们迈出了朝向问题答案的一步,但是后者的

规定仍然被规避了。我们不必在意意义的剩余或不足,而必须在意义过程之内指向其自身界限的话语所呈现的关于某物精确的理论可能性。

因此,只有当存在着意义本身结构的不可能性,只有当这种不可能性将自身标志为符号内部的干扰(颠覆、扭曲等)时,虚空能指才能够出现。也就是说,意义的界限只能将自身宣称为在自身界限内部实现的不可能性——如果这些界限可以以直接方式被意指,那么它们就是内在于意义本身的,并因此不再是界限。

进行一种回到原点的纯粹形式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这一点。我们知道,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拓展开来就是所有意指系统)是差异系统,因此语言的同一性——价值——是纯粹关系性的范畴,并且因此,语言的总体性被包含在意义的每一单个活动中。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很明显,语言的总体性本质上是需要的——如果差异不能建构一个系统,任何意义都将不可能。然而,问题是,意义的可能性正是系统的可能性,而系统的可能性正是系统界限的可能性。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思考某物的界限与思考什么超越了某物的界限是同一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讨论的是意指系统的界限,很显然这些界限本身就不能被意指,而必须将本身显示为意义过程的停滞或崩溃。由此我们被滞留在一个悖论式情境中,它建构了意指系统的可能性条件——它的界限,它也建构意指系统的不可能性条件——意指过程的持续扩展的阻碍。

这种情境的首先和重要的规定是,真正的界限从来都不是中立的界限而是一个前提。中立的界限将会是这样的界限,它本质上与在其两面的东西是延续的,而这两面是彼此有差异的。然而,因为一个意指总体性确切来说就是差异系统,这意味着这两面都是同一系统的部分,并且这二者的界限不可能是系统的界限。相反,在拥有一个排他性的情况下,我们拥有一

个本真的界限,因为超出这个排他性界限的东西的实现,将涉及什么是界限的这一面的不可能性。真正的界限总是对抗性的。但是这种排他性的界限逻辑的运作具有一系列的效果,这种效果蔓延至界限的两面,并导致我们直接进入虚空能指的产生。

这种排他性的界限的第一个效果是它在由这些界限所建构的差异系统之内引入了一个本质的两面性。一方面,仅仅就系统内的每一要素都与其他要素不同而言,它才具有同一性:差异=同一性;另一方面,就每一个差异都属于排他性的边界来说,所有这些差异彼此都是等同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同一性都表现为建构性的分裂:一方面,每一差异都将自身作为差异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由于如此进入与系统中其他差异的等同关系而自我删除,并且,既然只有当存在激进排他性时才存在系统,那么这种断裂或矛盾对于系统性同一性来说就是建构性的。只有就存在着作为纯粹在场的系统(它超越所有差异)的激进不可能性而言,现实的系统(以复数形式)才能存在。现在,如果说系统自身的特性是排他性界限的直接结果,那么只有这种排他性才真正是系统的基础。这一观点具有本质重要性,因为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系统不可能拥有实证的基础,而且系统不能按照任何实证所指来意指自身。让我们暂时假定系统性整体是其所有要素分享一个实证特征的结果(即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区域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实证的特征将不同于其他差异性的实证特征,它们将全部求助于一种更深层次的系统整体,而在这个整体内,它们的差异将显现出来。但一个被激进排他性所建构的系统扰乱了差异逻辑的运行:被排除在系统之外的东西——远不是某种实证的东西——是实证性(纯存在)的单纯规则。这已经宣布了一个虚空能指的可能性,即这是一个所有差异都被纯粹抹除的能指。

当然,这一运作得以可能的条件是,超出排

他性边界之外的东西被还原为纯粹否定性,即还原为一种超出系统之物对系统提出的纯粹威胁(系统就是这样建构的)。如果这一排他性的维度被取消或者削弱了,要发生的就是超出的差异特征将强化自身,并且系统的界限将因此被模糊。只有当超出变成纯粹威胁的能指、纯粹否定性的能指和单纯的排除物的能指时,界限与系统(客观秩序)才能存在。但是,为了成为被排除物的能指(或者简单说,排除的能指),不同的被排除的范畴就必须通过等同链条的构成抹除其差异,而系统为了意指自身就会通过等同链条魔化自己。我们在此又一次看到了虚空能指宣称自己的可能性,通过这一逻辑,差异性蜕变为等同链条。

然而,我们可以自问,为什么这种纯粹存在或系统的系统性——或者它的颠倒——被排除物的纯粹否定性,为了意指自身需要一种虚空能指的产生?答案是我们试图意指意义的界限——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除非通过一种意义过程的颠覆,否则就别无他途。通过精神分析,我们知道并非直接表征的东西——无意识——如何能够找到作为表征方式的意义过程的颠覆。每一个能指都通过将自己依附于特殊所指建构出一个符号,作为差异在自己意指过程之中铭写。但是,如果我们所试图意指的并非差异,而是相反,是一种本身是差异基础和条件的激进排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另外差异的产生都不能达到目的。然而,由于所有差异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当意指单位的不同性质被颠覆,只有当能指清空了其对特殊所指的依附而担负起代表系统纯粹存在(或者不如说,作为纯粹存在的系统)的作用时,如此的意义才是可能的。这样一种颠覆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是什么使其得以可能?答案是:每一个意义单位的分裂,系统必须被建构为非决定的场所,在这里等同逻辑和差异逻辑运行。只有把等同逻辑特权化至其差异性几乎被完全删除的点——清空其差异性——系统才能作为

总体来意指自身。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虚空能指来代表的系统的系统性或存在并非一个还未现实地实现的存在,而是一个建构性的不能达到的存在,因为无论何种系统性效果的存在,都将是等同与差异之间的不稳定的妥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建构性的短缺,一个不可能的对象,它通过其恰当表征不可能性来表现自己,如康德的“物自体”。在此我们可以给予问题以完整的答案:在意义领域内之所以可以存在虚空能指,是因为任何意义系统都是围绕着一个虚空位置结构的,这个虚空位置来自于生产对象的不可能性,然而这一对象又是系统的系统性所要求的。因此,在此我们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像在逻辑矛盾中那样无定位的不可能性,而是一个实证的不可能性,一个真实的、虚空能指的 X 所指向的不可能性。

然而,如果这一不可能的对象缺乏恰当的或直接的表征方式,这只能意味着为了承担表征的功能而被清空的能指总是建构性的、不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在不同情况下是这个能指而非另一个能指承担了意指功能?在此,我们必须走向本文的主要论题:虚空能指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

二、霸权

让我们返回到我们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1]中详细讨论过的一个范例: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工人阶级统一体的建构是通过很长时间党派斗争的多元决定取得的,其基本论点是,阶级统一体不是由关于经济斗争或是政治斗争的优先性的先验思考所决定,而是由所有政治运动的累积效果所决定。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其论点总的说来接近下列观点:在极端压迫的情境中,任何争取部分目标的运动,都将被理解为不仅与具体要求或这一斗争的目标相关,而且被理解为与系统相对立的行动。这一最终

事实就是确立了不同的具体或部分斗争及运动之间连接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视作互相联系的,不是因为它们具体目标的内在关联,而是因为在与压迫体制的对立中,它们都被看作等同的。因此,并不是它们所分有的某些实证的东西而是某种否定的东西——它们与共同敌人的对立——确立了它们的统一体。卢森堡的论点是革命大众的统一体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多种分离斗争的多元决定确立的。在一个革命的契机中,这些传统在一个爆发点上得以融合。

让我们将以前的范畴应用到这一序列中。从一开始,所有具体斗争的意义(所指)显现为内在分裂的,斗争的具体目标不仅仅是在其具体性中的目标,它也意指对系统的反对。第一个所指确立了其要求和运动相对于所有其他要求和运动的差异性特征;第二个所指确立了所有要求之间在对系统的共同对立中的同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具体斗争都被这一同时既肯定又取消其单一性的矛盾运动所支配。因此,表征作为总体的这一体系的功能,依赖于同一功能直接胜过差异功能的可能性;但这一可能性只能是每一单个斗争都总是已经原初性地被这种建构性的模棱两可性所贯穿。

如我们原先所确立的,如果差异能指的功能是为了表征共同体空间本身的纯粹等同的同一体而拒斥其差异同一体,它们就不能建构这个作为属于差异秩序的某物的差异同一体,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例如,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列举沙皇强加于大众的某些部门的压迫而把沙皇统治表征为压迫统治,但这样一种列举并不能给予我们压迫环节的具体性,这种压迫环节——在其否定中——建构了对实体之间的压迫关系的特别之物。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压迫力量的每种情形都被看作被压迫部门同一体的否定性的纯粹承担者。如果压迫行为的差异同一体以那种方式通过将自己转化为另一实体存在的纯粹否定性化身使自己从自身中远离,那

么很显然,这种否定与其所表达的实体之间并不存在本质联系——没有能够预先命定地决定一种特殊实体能够使否定性化身的东西。

恰恰是这一点使同一关系得以可能:不同的特殊斗争是如此众多的实体,它们能够漠不相关地将它们所有的对立面都转化为压迫权力。这包含了双重运动:一方面,等同链条越是扩展,每一具体斗争就越是不能封闭在差异性自我之内,即(通过一种自身独有的差异)封闭在某种将其与其他差异同一体分离的东西之内。相反,由于等同关系表明这些差异的同一体仅仅是漠不相关的实体,它将某些在所有这些事物中同样在场的某物实体化,所以,等同链条越长,这个“同样在场的某物”就越显得不具体,在这个界限上,将是一个不依赖于所有具体显现的纯粹共同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超越界定共同体空间的排除的东西——压迫权力——将不再被看作特殊差异压迫的工具,并且将被表达为纯粹的反共同体、纯粹的恶和否定。由此,等同的扩大所创造的共同体将变成缺席的共同体之完满的纯粹观念——原因是压迫权力的在场。

但是,在这一点上,第二个运动开始了。这种代表了通过所有差异的同一体的崩塌而显示的缺席完满的纯粹等同功能,不能是具有其自身能指的某种东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超越所有差异”将成为另一个差异,并且不是所有差异同一体的等同崩塌的结果。恰恰因为共同体本身不是客观同一体的纯粹差异空间,而是缺席的完满,它就不能拥有任何自身的代表形式,并且必须从某些在差异空间内建构的实体中借来后者——与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但同时承担了代表一般价值的功能相同。对特殊能指的特殊差异性的所指的清空,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使虚空能指作为短缺能指,作为缺席的完满性的能指的出现成为可能的过程。但是,这又把我们引领到了我们在前一节中思考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差异斗争都能

够表达超越其差异的同一体的缺席完满,如果等同功能使所有差异立场同样地与等同的代表漠不相关,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本身是预先决定去完成这一角色,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它们之中的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体现了这种普遍功能?

答案是:社会的不均衡性。因为如果等同逻辑趋向于取消所有差异定位的相关性,这仅仅是一种趋向性运动,它总是被本质上非平均的差异逻辑所抵制(毫不奇怪,霍布斯的自然国家模式——它试图描绘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等同逻辑的完全运作使共同体成为不可能——必须预设人与人之间原初的和本质的平等为前提)。不是社会中的任何立场和任何斗争都能够在成为虚空能指的缝合点中转化其自身内容。那么,这难道不是返回到社会力量的历史有效性的相当传统的观念?这种观念断言结构定位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它们之中哪一个将成为总体化效果的来源?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不均衡的结构定位——它们中的某些代表了权力的高度集中点——本身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差异逻辑和等同逻辑是交互多元决定的。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等同结构定位的逻辑有效性问题,毋宁说,是否认同对于作为整体的它们而言,存在一个在自身之外决定社会运动规律的基础结构的问题。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在单纯的差异/等同的形式分析的层次上决定哪一种特殊差异将成为等同效果的场所就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个特殊结合点的研究,因为恰恰是等同效果的出现总是必需的,但是等同/差异的关系并不是内在地与任何特殊的差异内容相联系。这种特殊内容借以成为缺席的共同体完满性之能指的关系恰恰就是我们称之为霸权关系的東西。虚空能指的出现——在我们对其进行定义的意义——正好是霸权关系的条件。如果我们在应对一个构成了大多数霸权理论——包括葛兰西的理论——中重复出现的障碍时,这可以很容易看到。当一个阶级或群体不是在一个狭隘的

社团主义视角内封闭而是将其自身表现为实现了更广大的目标或者解放或者保证了更广泛的大众的秩序时,它就被认为是霸权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精确地确定“更广大的目标”和“更广泛的大众”指向什么,这将使我们面临一个困难。这包括两种情形:其一,社会是持异议者群体的累加,每一个群体都趋向于其特殊目标并且彼此之间持续存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更广大”和“更广泛”只能意味着群体之间谈判协议的不稳定的平衡,所有群体都能维持其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同一体,但是霸权显然指向一种比这种协议所引起的统一体更强的共同体的统一体。其二,社会拥有某种预定的本质,因此“更广大”和“更广泛”地拥有其独立于特殊群体意志的自身内容,并且霸权将意味着这样一种本质的实现。但是这不仅将消解总是与霸权运作相联系的偶然性维度,而且将与霸权的交互性特征不相容:霸权秩序将成为先前既定的组织原则的加强,而不是某种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东西。现在,如果我们从虚空能指的社会生产的观点来思考这一问题,那么问题就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霸权运作将作为虚空能指的化身而出现,这一虚空能指的所指是缺席的、尚未实现的现实性的共同体秩序。

那么这一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让我们思考一下社会基质的激进混乱(无序)的极端情景。这种情况十分接近,人们需要一种秩序,并且其实际内容变成了第二性的东西。“秩序”本身并没有内容,因为它只有在它所现实实现的不同形式中才能存在,但是在一个激进混乱情景中,“秩序”是作为缺席的东西在场的,它变成了作为那一缺席能指的虚空能指。在此意义上,不同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为把他们的特殊目标现实化为承担了这一短缺的填充的努力中竞争。霸权化某事物恰恰就是承担这一填充的功能(我们所说的是秩序,但显然意指与“同一体”“解放”“革命”等术语相同的事物秩序)。

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任何变成了这一短缺的能指的术语,都起着相同的作用,因为社会建构性的不可能性只有通过虚空能指才能表征自身,政治才是可能的。

这也揭示了为什么任何霸权总是不稳定的,并且总会被一种建构性的模棱两可性所贯穿。让我们假定工人运动成功地将自己的目的呈现为一般自由的能指(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可能的,因为这一在压迫性政权下发生的工人运动,也被看作一种反系统的斗争)。就一方面的意义而言,这是一种霸权的胜利,因为特殊群体的目标被社会整体同一化了;就另一方面的意义而言,这是一种危险的胜利,因为如果工人斗争变成了自由本身的能指,它也就变成了铭写的平面,基于这一平面,所有的自由斗争将被表达,以致围绕着这一能指统一化的等同链条趋向于清空它,并且模糊它与原先同其联系的实际内容的联系。由此,因为它的成功,霸权运作趋向于打断它与作为原有的发起者和受益者的力量之间的联系。

三、霸权与民主

让我们反思和总结一下对虚空能指与霸权、民主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主要思考的是社会能指在现代政治思想产生问题上的作用,本质上,我所指的是霍布斯的著作。如我们所看到的,霍布斯把自然国家看作一个有序社会的激进对立面,看作只有以否定的术语才能界定的状态。但是,作为那种描述的结果,统治者秩序必须被接受,不是因为它所拥有的任何内在美德,而是因为它就是秩序,并且是激进混乱的唯一的替代选择。然而,这种图式的连贯性的状况是以在自然国家中个体权力的平等为前提的——如果个体就权力而言是不平等的,秩序就能够通过纯粹的统治来保证。这样,权力就被消除了两次:在自然国家中,所有的个体平等地享有权力;在共和国中,它完全集中在统治

(下转第 47 页)



引用格式:米洛斯拉夫·贝德纳,刘勇.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渊源和主题困境[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32-39.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32-08

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渊源和主题困境

Philosophical origins and topical predicament of diversity in unity

米洛斯拉夫·贝德纳¹, [翻译]刘勇²

M. BEDNAR¹, [Translator] LIU Yong²

1. 捷克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捷克 布拉格 02116

2. 扬州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江苏 扬州 225001

摘要:古希腊哲学对宇宙统一性神话的质疑,为西方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了哲学前提和思想基础,并表现在现代众多思想家那里。比如,费希特准确理解了被现代哲学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清晰地证明了民族主义真正的哲学基础是内在模棱两可的两重含义——自然的与精神的——都必须付诸实践;帕拉茨基辨识了正在增长的中央集权,致力于给奥地利联邦制君主政体创造一个恰当的思想基础;马斯特斯要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上恢复自然正义,在现代条件下应再加上自愿承担的义务;帕托卡认为一个真正和适当的多样性统一被锚定在个人的有机整体和细节的经验知识上。然而,在现代世界,人类生存的和解,需要强烈的、基于精神上负责任的共同努力的积极行动。正是在这个扑朔迷离的、具有挑战性的哲学起源和主题困境背景下,一个精心阐述的、令人信服多样性统一观点或许可以完成它的使命。

关键词:
多样性统一;
费希特;
帕拉茨基;
马斯特斯;
帕托卡

[收稿日期]2018-07-20

[基金项目]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0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JZD055);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资助项目(苏教社政函[2018]18号)

[作者简介]米洛斯拉夫·贝德纳(1958—),捷克社会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欧陆哲学;刘勇(1974—),男,江苏省海门市人,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译者导言]捷克哲学家、文化学者米洛斯拉夫·贝德纳是世界著名的西方思想、西方文明的研究者和诠释者,也是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这篇《多样性统一的哲学渊源和主题困境》是他于2016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工作坊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该文旨在基于古希腊哲学对宇宙统一性神话的质疑,为西方文明的多元起源奠定哲学前提和思想基础。文章通过对费希特、帕拉茨基、马斯特斯、莱布尼茨、帕托卡关于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思想论述和观点分析,辨识了统一多样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各种内在张力,认为合适的多样性统一包含了统一体中的个体差异,恰当的多样性统一观念能使我们回归到表象世界,从而对这个世界产生意义。

一、哲学与神话:西方世界的精神和道德基础

关于神话与后神话世界之间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后者对前者产生了消极影响,且两者之间没有纯粹的可比性。撇开与此相对立的其他观点不说,这些观点都没有考虑到哲学的存在,以及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的对神话的道德依赖,使宇宙时间周期的统一性神话遭到质疑,使得其中的多样性有了基础和架构。这种极端的质疑态度集中在神话世界,并隐含着重要的道德后果:通过内化,从内部应对神圣。也即虽然我们不在外部遵从它,但是我们从内部面对它的本质基础,其入口已被人类的困惑所打开,动摇了它最基本的根基,同样也作为我们墨守成规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后神话世界的精神、历史和政治,最初并不等同于对神话世界及其精神的消极否定,其核心在于将后者提升到最终激进的、危险的人类在不可分割的负责任生活的可能性。

于是,另一个从本质上衍生的方法是对先

前被质疑的宇宙神话进行研究——诡辩学派随之而生。而哲学将宇宙原本神话般的和谐——它的生命、死亡、复苏——当作可证实的真理来质疑(例如在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文本里)。“多样性的统一”假设了一个在诡辩解释上非常不同的状态。其核心含义被普罗泰戈拉(前481—前411)表述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柏拉图《泰阿泰德篇》)根据人类如何使用物品,我们理解了宇宙及其多样性。由于自我的特殊性,人类对世界外表领悟力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合法的观点呈现了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这样的局限性仍然保留了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基本立场。无论如何,诡辩哲学的局限性在其修辞学形式的应用上,同样显示了无法抗拒的想要替代哲学的倾向。从此,质疑原始哲学的真实性也就造成了对宇宙及其多样性活动的神话洞察力的摇摆不定,随之而来的是对其所笼罩的诡辩式自我主义蒙上了阴影。这是欧洲精神重要的批判语境,它丰富并发展了这样的特征,并创造出与我们当前困境中类似的主导精神基调。

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是这一框架的基本,其原始特征由动摇和支持神话的信仰直至追溯其哲学上自我责任的质疑根源。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与生命统一的第一哲学观念体系及其内部多样性,清楚地表现为人类一种新的可能性的精神表达,其中的宗教元素和激进理性在本质上是洞察力、态度和行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类这一生活不确定的和谐是根植于存在的认知,而不是根植于对所有现实的体验,这是关于惊讶的最初哲学范畴。这样的精神立场并不是单独出现的。一方面,这一显著举动是公共政治生活与纯粹的组织或家庭世界的紧张局面;另一方面,历史的崛起为走出世界和生命的神秘时间循环踏出了冒险的一步。

在古希腊,政治被理解为是专制团体,其最终目标是要更完美地实现之前的人类共同体(家庭和村落)。人类生活的完美本质存在于公民能够自由和平等地出现在他人视线中,以及具备能够与他人对城邦的整个行动进行对话的能力。从哲学上来说,政治生活提出了人类的主要对抗与整体生活的可能性和在整体中生活的可能性,哲学生命从这个主干上生根、发芽直至收拢、封闭。简·帕托卡从亚里士多德关于积极生活的区分中受到启发,为这个词在正确意义上的历史渊源推断提供了思想基础——历史存在于生活变得自由和完整时,历史存在于人们有意识地建立同样的自由(不是筋疲力尽的)生活空间时。因此,政治的出现是哲学和历史播下的种子。

西方文明的多元起源清楚地表征了多样性统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这方面的张力主要源自哲学洞察力及其智慧的局限性。一方面,哲学的、沉思的生活将世界和生活视作整体。这需要把它的冲突性质看成是它的共同特征。这一洞察力展示了理性的原初面貌,并持续要求根据他的言词区分人并说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如帕托卡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原初的区分为意味着最初论战具有为黑暗世界照亮光明的能力,使所有个体呈现为他们的原初模样,比如,在本质上作为独特的、有区别的、多样的存在进入独立的宇宙开放空间的能力。因此,最初的论争表现了最初的统一,这在原则上比任何暂时的嗜好或共存更为深奥,因为它是基于既定现实的混乱。

哲学诡辩推导的局限在于其以特定的、多样的和个性的自我克制为出发点,对这个原初统一性的疏忽使得任何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出现得以可能。由此所衍生的论争和分歧及其导致的压力,无视其原初统一性的重要性,这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政治来说都具有根本意义。总的来

说,人类政治、哲学和历史的多元可能性的前提当被解读为神话世界的基石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高度关注西方,而是欧洲内部以及整个西方与亚非的统一性问题。

二、现代世界困境的德国精神内核

J. G. 费希特准确地理解了被现代哲学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很明显这是受到了J. G. 赫尔德关于人性的哲学观念影响。费希特很清楚民族主义真正的哲学基础是内在模棱两可的两重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付诸实践。一方面,人类的自然本能想要在无常中追寻永生不仅只涉及凡人肉眼,而且用不可思议的方法看到其无法穿透的永恒深渊;另一方面,意志高尚的人愿意并希望以改进的方式通过生儿育女再次复活生命,在他们死后很长时间里继续生存,培养和完善生命。很明显,这种特定的人类欲望可以通过事物的秩序来满足,承认人类是永生的并有能力接受自己变成永恒实体。对于费希特来说,这一特定的、受追捧和急需的秩序本质上是不明确的。

费希特将民族的自然和精神之两重含义称为神性自我发展的一个特殊规律。希腊关于民族的定义直接关系到公民权的概念。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它是广义上和精神上的世界公民身份。对于费希特来说,就像野蛮人对希腊人那样,其他民族沉浸并被永恒循环的观念所俘获,即成为落后的历史哲学的囚徒,克服这种危害的唯一方法是拥有健康精神即德国精神。此外,充满希望和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是向所有成员开放的,而其他民族在属性上是排外的和封建的。

因此,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民主独特性高度重视,尽管这是由于法国拿破仑占领德国领土所引起的,但在事实上增强了他原本和谐的、双重的民族概念中自然的、无意识的哲

学因素。在19世纪德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严重夸张被证明是致命的。黑格尔哲学左派(青年黑格尔派——译者注)将费希特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转化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强有力批判材料,从而把形而上学传统与现代主体性哲学思想结合成了一种历史哲学。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应该采用客观、唯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来扭转迄今为止被异化的、非真实的历史过程。

19世纪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灾难,似乎是1848年在自由理想主义、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和民族沙文主义混合的基础上试图统一德国努力的失败。这一事件的思想后果包括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哲学的逆转,从哲学化和理想化的政治理念出发转化为明确的唯物主义政治理想与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这一流行趋势为俾斯麦的德国政治理念的成功创造了现实土壤,它旨在通过加入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喜好,推动奥地利和德国结盟,并通过世界强权政治使自由主义批判失声。德国的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唯物主义基础被囊括在1862年俾斯麦的臭名昭著声明中:伟大的时代问题不是由多数人的言论和决定来解决的,而是通过铁和血来解决的。这实则是德国对欧洲民主文明的基本精神、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公然蔑视。

相应地,一个统一的德国与日益统一的奥匈帝国的地缘政治努力似乎是缺乏西方精神的模式:以个人及其共同体的现代形式对唯物主义的真正精神和道德责任的逆转。这是种族沙文主义、全球军事经济帝国的设想和具有明确反民主、反联邦性质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同盟。通过这种方式,德国与奥匈帝国的结盟被认为是反民主力量对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大英帝国的攻势,其最终目的是控制欧洲和整个世界。换言之,“一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的结盟是以一

种明确的暴力方式为西方世界明确了最后的解决之道。

三、问题、抵抗和对民主精神的冒犯

现代唯物主义在德国一个致命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形式表达,就是综合法国式的中央集权、行政自由主义和基于种族的德意志民族帝国主义。由此产生的极具侵略性的混合意见遭遇了双重的抵抗。一方面,抵抗来自于由民主创立和建设的世界某些单元,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单元,其自身的自由主义传统牢固地根植于其精神、道德,其中的代表就是欧洲民主文明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类似的抵抗也出现在德国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出现在奥地利/奥匈帝国的领土内,主要集中于奥地利宗主国下斯拉夫和罗曼语系民族的知识界与政治代表中。特别是在捷克领土内的公民,很显然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观念(这同样也是美国民主的基础)。这种抵抗明显地重建了西方传统。对于捷克来说,胡斯改革和之前提到的启蒙运动潮流的双重压力,再次肯定了欧洲原有的精神和道德传统。沿着这一思路,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创立了迄今为止仍然非常活跃的历史哲学,明确强调了多样性统一的问题。

帕拉茨基的多样性统一包括了在人类历史上两个明显的基本趋势。一方面,帕拉茨基辨识了正在增长的中央集权。在此背景下,他强调将最初不计其数的单一的、独立的力量、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宪法等的多元化和多样化转化为统一整体。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原始的无数多样性由于集权而逐渐减少:到处都是轴心,而不久后它们本身又被吸引到一个更强大的轴心内。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问题已经走得那么远,地球上所有现存的轴心国很容易被接受,也很容易被统计,而且所有人都认为地球上的国家统一和联合进程迄今为止尚未达

到终点。这种集权与文明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事实上,这两者是理想战胜现实的胜利,是团结统一的智慧战胜事物无限多样性的胜利。从政治上来说,这种世界的集权化趋势表现为一个集权的国家政权。然而,这一现象已达到并超过了它的顶峰。他的判断是基于以下观点:中央集权看起来似乎是愈演愈烈,几乎无法测量,但在经过极性自然规律后,已演变为更强大的对抗力量。这样,帕拉茨基辨识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趋势——公众意见优于中央集权。首先,文明的进一步提高显然更受到公众意见而非中央集权的青睐。其次,根据定律,国家原则是从公众意见发展而来的,是作为人类历史上对权力的集中统一强有力抗衡的新代理人而出现的。在此背景下,帕拉茨基强调,国家原则似乎对中央国家权力和公众意见有些漠不关心。

1865年帕拉茨基对世界历史这两种基本趋势进行解释时,进一步强调了世界集权的正面影响,如全球性知识分子的出现。而且,媒体手段的进步意味着起源于一个地方的情感和意见可以迅速传播到不同国家,并且它们能够在所有国家和社会阶层中要么立刻得到接纳和同情,要么就是彻底拒绝。他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法的精神基础是内在的平衡运动,避免了片面性的明显危险。意气相投的统一行动导致了对多样性的排斥行为,一个明显的实例就是联合国的出现。与此同时,相关国家之间的交流加深了对彼此分歧的认知,也加强了对统一的抵制。因此,一个统一的宇宙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出于神的旨意。

从政治上来说,帕拉茨基的历史哲学构想是力图解决多样性统一的问题,致力于给奥地利联邦制君主政体创造一个恰当的思想基础。然而,由于德国反对在欧洲中心——奥地利跨国疆域内——进行基于多元主义的民主重建,导致了这一设想的多次失败。这一思想的危险

发展对导致全球性灾难的“一战”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它的性质及其对20世纪历史的至关重要性。

由德国和奥匈帝国引发的“一战”实际上是对基于人权和民权的民主文明原则的宣战。这样一来,多样性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很自然地,这一复杂的反民主——用强烈的暴力行为——对西方问题作出答复并引发了强烈回应。“一战”开始后不久,在被侵略的民主力量——协约国(后续美国也加入了进来)——之间建立了一个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威胁的自由民主文明联盟,形成了被奥匈帝国压迫的民族的精神、政治和军事抵抗。

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是令人难忘的。在西方民主文明观看来,作为“一战”的政治结果,欧洲专制权力崩溃,于是面临的挑战迫在眉睫:沿着民主路线进行复杂、深刻和坚定的欧洲重建。这意味着有意识地运用欧洲主义精神和道德根基。这样,一个稳定而关键的民主文明必然会出现。不过,协约国的民主政权并没有正确应对这种苛刻的挑战,它们最终失去了和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缺少道德上的决心、团结和勇气,更不用提普遍误解,这导致了原来的结盟未能应对世界大战胜利后重大的全球责任。

这一不确定的态度不论在直接后果和最终结果上都是致命的、可悲的,其中也包括我们目前的困境。就全球范围来看,反民主运动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急切地抓住了机会。德国在经历彻底改革后转变成极权主义政体,以另一种人类生存方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文明的根基。就精神上来说,这一变动正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民主文明缺乏强化而造成的。其主导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道德责任的泯灭。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统一问题是这样从根本上来解决的:

在多样性前提下确立意识形态的统一,而这种多样性基本上不可能被塑造成一个完全可治理的、支离破碎的单元。回顾“一战”造成的全球战火,似乎就是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未来冲突的预兆和前提。在打败纳粹德国之后,冷战代表着反对极权主义的世界大战的延续。现在说极权主义和在1989年中东欧诞生的民主战争已经结束,是言过其实的乐观。

民主世界在前两个阶段与极权主义政权的冲突中取得胜利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时间、真正的道德责任、团结民主政党与普通公民的共同行动——致力于全世界的民主价值观。这种历史性奉献意味着对多样性统一观念的奉献,尽管在每一种情况下通常需要修改。如今,如果我们认为,在100年前已经预示过,并在“一战”中成为现实——全球民主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的持久冲突已经过去,这将是一个严重和致命的错误。原则上讲,在“一战”结束后,民主国家的公众意见产生了同样的错觉,导致了在随后的“二战”中更为糟糕的重演。同样,民主国家天真地以为,由于里根总统下决心实施“超越遏制战略”,与极权主义政权的冷战已经结束。

作为一个普遍性原则,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民主文明极其重要的精神、道德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困境。其根源在于:在民主国家及其更广泛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综合了西方民主文明与精神、道德起源的持久困惑。政治作为一个从只专注于私人生活的公民个人道德信念中严格分离出来的公共理性领域,不论是从起源于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还是自由主义的附属品来看,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偏见,其生存和进一步发展是历史和政治混乱的主要根源,也是民主世界与激进主义之间全球冲突的概念性模糊的主要根源。特别是在此背景下,自由主义包括其后现代主义版本,拒绝任何赞同所谓故事或个

别事件的一般原则,不是强调任何谨慎行动所必需的共同知识核心,而是强调绝对的多样性和同等关注每一个声音的必要性。

换言之,迄今难以想象的技术指数增长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可操作性,并加强其作为这个世纪邪恶标志之势不可挡的推动力。全球冲突导致了人类的贫困,消除了他们的不可替代性并辨识他们的适当角色。这使得人们和各个国家重复极权主义的努力,为人类生存去建立激进的替代品。同样,从政治上看,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沦为极端原教旨主义的牺牲品,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向民主文明宣战的霸权主义。在1989年以后的欧洲产生了典型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在这些国家中,修正主义的怨恨往往演变成政治行动,给俄罗斯最近的国内外政治民主变革带来危险。

显然,“一战”所引发的欧洲和世界变革,如今已经累积并急需当代民主世界回归以履行它重要的历史使命。这是团结在一个精神和道德的基础上,并制定和实施一个全球构想的民主概念的东方问题,即重建欧罗巴和全世界的民主。这是民主文明的历史使命,它需要决定性的开端。

相应地,多样性统一问题似乎是精确的和局部的。一个严重的危险是混淆了两种概念,在1989年以后呈现出一个强化的形式。就当时流行的“战略互动的新的地缘政治”而言,几乎是自发的过程,它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缺陷模式,帕拉茨基称之为世界集权模式。皮埃尔·哈斯内将其定义如下:

机制的传染和互动超出了国家的控制,涉及到资金流动和操控、毒品和武器的交易、通信革命、关于腐败和暴力的图像传播,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极权国家、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削弱了社会

控制。

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至少是由三种类型的进程组成的:战略(特别是外交和军事)的相互作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和社会的相互渗透(特别是从人口统计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和依存关系。我的论点是,这更加难以掌控的第三种类型的关系与经典的类型相比,显得越来越重要,它通过引发新的经济动荡和新的暴力风险,反弹到这些经典类型之上。新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多的特征是:在理性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越来越难以理解。无论是系统的限制,还是风险和规则的相互作用,甚至连行动者的本质和身份似乎都难以一劳永逸地被定义。

这种不受约束的、变形虫般的进程进一步模糊了好坏的区别,并麻痹了人类无处不在、总是能作出最佳选择的能力。换言之,这一大规模的全球普遍趋势实际上冷漠地消除了多样性统一的整体问题,依据与上述极权主义系统类似。无论如何,这场全球僵局具有美好前景似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进一步论证的起点,这里介绍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罗杰·D. 马斯特斯的现代立场。在他看来,征服自然的不可能性意味着某些社会冲突将无法通过增加现有的资源或力量来解决。人类存在的事实确保如果存在争议,必须有人来作出裁决。这就引出了自然正义的价值:只要在人类的可能范围内,就有义务根据自然法则寻求公平或正义的解决方案。柏拉图注意到,当灵魂(或个性)的一部分履行了其自然功能之后,正义就会出现在他身上。柏拉图将社会正义定义为每一社会阶层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先决条件,出于对自然权利或公民权利的无限要求,道德要求我们自愿承担义务以实现

正义。

第二种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上要求恢复自然正义。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应再加上自愿承担的义务,这与莱布尼茨的观念是一致的。莱布尼茨认为,人类自身作为一个存在,因为其内在的存在观在原则上能够超越自身。

第三种是简·帕托卡关于精神传统与普遍释放力的现代困境基于哲学视域的看法:

然而,与我们的文明一起涌现的主要可能性就是有机会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偶然的法则转换为那些理解历史的人的法则。历史只不过是摇晃的确定性。它没有其他含义或结局。不过,这种含义和结局对世界上不确定的人类生存的虚假无限性已经足够,这样的欺骗大众的世界是复杂的,人们已经习惯奉承,已经沦为被操控的煽动行为的受害者……当代世界的危险是,因为拥有太多特定的知识,人们学会了不再提问……不存在这样的文明。问题是历史进程中的人是否仍然愿意承认历史……。一个从自由、生活、每天的利益出发的完全自由……这样的绝对自由不是另一些事物的手段,不是做……的阶段,而是隐藏在什么之后,可能什么都不是。重点正是如此,敞开自己,人们从他们的职业、才能、机遇和未来中响应号召。为了达到这一点,以便看起来是一个完全具体化的能量来源,同时也是克服力量的方法。

相应地,1989年以来,为了与马斯特斯和莱布尼茨的见识达成妥协,对现存世界的希望和失望似乎要求帕托卡所描述的极端人为牺牲。而且,这种人为牺牲不能仅仅保持在暂时的集体努力上;相反,它需要创造生活风格的人

生观。这样的观念需要将人类美德的框架作为人生支柱。

就多样性统一来说,看清问题及其基础的能力似乎是一个统一因素,从而对多样性进行有意义的洞察和排序。20 世纪的精神和道德困境的彻底反思,展现了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质,符合更微妙的统一性意识发展与新的多样性意识发展保持一致的要求。换言之,新的、更微妙的多样性统一意识是以对以往所有意识,即对所有现实的不确定性有着清晰认识为前提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完全新鲜的观点,因为它增强了西方精神的洞察力基础。相比而言,西方精神是从勇敢地强化神话精神的动摇倾向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对神话负有责任精神和道德勇气的情绪,概括并浓缩了一种普遍统一的合法性,足以解决 1989 年以来世界上各式各样、极其艰巨的多样性问题。然而,如果没有关于某一特定情况的适当经验知识,一般概念的普遍运用常常会遭致失败。相应地,一个真正和适当的多样性统一已被锚定在个人的有机整体和细节的经验知识上。因此,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合适的多样性统一包含了统一体中的个体差异。出于同样原因,需要勇敢实践、负责精神与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和谐。

关于宽容问题,其哲学基础在康德那里是常识——共通感。也就是,就判断能力来说,在其反思中,优先考虑到所有人思想中的代表方式,通过将我们的判断与其他人可能而不是实际的判断比较,让我们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进行判断,从偶然附加到我们自己判断的局限性中进行抽离。在亚里士多德强调经验知识的个人层面上,迫切需要一个恰当的多样性统一概念似乎才能满足上述要求。在既定背景下,从思考到判断,一个恰当的多样性统一的现代观念使我们回归到表象世界,从而对这个世界产

生意义,因为仅凭判断就能为意义提供满意的解释,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会确认我们的条件。

通过这样的方式理解和接受他人,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时代的多样性统一风貌,以便使我们在世界上如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并使我们的时代与俗世和解。这样的和解并非等同于平静或历史的终结。相反,在现代世界,人类生存的和解需要强烈的、基于精神上负责任的努力的积极行动。相应地,除理解和接受人类生存的极权主义替代方案外,还需要彻底消除人类的道德责任完全物化成可支配单元,允许承认两种基本的民族主义:一是以纯粹自我为中心和完全排斥身份来消极、激进地定义的沙文主义版本;另一种是以精神和道德为基础的世界性民族主义版本——根据我们共同世界的复杂的民主统一将个人领域和国家责任合法化。实际上,在看透现代民族主义困境后,可能会引发民主国家对发生在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等国冲突的一种有效的和高尚的政治态度。正是在这个扑朔迷离的、敏感的、具有挑战性的哲学起源和主题困境背景下,一个精心阐述的、令人信服的多多样性统一观点(它们的精神和道德基础上文已经阐述)或许可以完成它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 Knopf, 1993.
- [2] HANNAH A. The human condi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3] MICHAEL J S.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4] GEORGE F M. Diversity in unity[M]. Washington D C: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04.



引用格式:保罗·戈尔巴多¹, [翻译]侯丽羽². 民粹主义时代[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1): 40-47.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1-0040-08

民粹主义时代

The populist era

保罗·戈尔巴多¹, [翻译]侯丽羽²

P. GERBAUDO¹, [Translator] HOU Liyu²

1.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数据人文系, 英国 伦敦;
2.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坍塌,世界正在进入民粹主义时代。民粹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以人民主权为中心诉求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导潮流,是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主导性政治叙事。右翼民粹主义认为主权是民族主权,是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权力。左翼民粹主义将金融和贸易的流动视为对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威胁。主权问题是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结合点,领土共同体的自决权与保护构成了二者共同的政治诉求。未来我们将知晓,谁的主权叙事在民粹主义时代盛行,谁将赢得霸权之战。目前,右翼民粹主义似乎占上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左翼拒绝将自己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并在把主权视为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时犹豫不决。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所造成的愤怒和混乱,左翼民粹主义迫切需要回归其基本的人民主权观念,并构建一种先进的领土管制观,旨在建设一种新型的激进民主和社会保护机制,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

关键词:

民粹主义;
人民主权;
新自由主义

[收稿日期] 2018-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KSO9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8BKS02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ZJH-587)

[作者简介] 保罗·戈尔巴多(P. Gerbaudo),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数据人文系数码文化中心主任,国际社会学协会社会阶层和社会运动研究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思潮;侯丽羽(1980—),女,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青年文化与社会思潮。

[译者导言]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日渐式微的当下,自决权和领土安全成为最重要的核心政治诉求。民粹主义的崛起给当下世界政治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成为影响最广泛的社会思潮之一。与纯粹从理论层面探讨民粹主义的文章不同,本文主要从实践和现实层面全面分析了民粹主义在当下的最新表现形式、本质、核心诉求、特征、原因、影响和发展趋势。这篇文章建立在作者对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爆发的各种思潮和社会运动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作者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增加了文章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全面认识和分析当代国外社会思潮(尤其是民粹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批判视域和研究进路。原文题为 *The Populist Era*, 刊登于《探测》(*Soundings*)2017年春季刊(总第65期),第46—58页。

自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一个形势变得更加明朗,那就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喷薄而出的阳光瞬间照亮了新世界的面貌,缩短了既定秩序的渐衰”^[1]。最近,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及其候选人的一连串胜利不仅表明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在坍塌,而且也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吞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外壳的火焰的照耀下,新世界的面貌若隐若现。这个新世界的特征与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所熟知的世界具有天壤之别。

这个新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它给我们带来了怀有希望或者深感恐惧的理由了吗?备受热议的民粹主义刚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废墟中浮现出来,看起来似乎被美国的特朗普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的仇恨政治所占据,它只是一种右翼现象吗?正如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如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所

指出的那样,也许它也带来了自我解放的可能性。

要了解现在的历史情势,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两个不同的政治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用最近常被引用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旧时代正在逝去,新时代尚未来临”的空档期^[2]。按照这种说法,正在逝去的旧时代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剧烈的阵痛中逐渐浮现的这个新时代则是民粹主义时代。由于自由主义的中心议题已经难以为继,民粹主义将成为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主导性政治叙事。

当代历史的转折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引发了普遍的经济困境,而且对于整个新自由主义世界观,譬如创业精神、对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崇拜、建立超越国界及不受国家管控的互联共同体的愿景,都是一个致命伤害。对于一些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来说,这场意识形态危机已经迎来了“民粹主义时刻”,或者被称为是“民粹主义时代精神”:正在出现的新政治现象填补了所有皈依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建制派危机遗留下来的虚空——这一切似乎都带有民粹主义的烙印^[3]。在这个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借助于试图跨越左右分裂之趋势的幌子,民粹主义才得以出现;而且民粹主义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建制力量的共同逻辑。这些反对力量包括美国的特朗普和桑德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和公民党之党领袖、英国的独立党和杰里米·科尔宾。

面对如此高涨的民粹主义浪潮,欧洲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对所谓的“民粹主义、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感到绝望。民粹主义成为当代政治真正的主导潮流。然而,我们似乎还不能确定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这种困惑源于其长期备受争议的历史:近几十年来,民粹主义常常被视为任何反常或病态现象的万能术

语,被认为起源于所谓的“欧洲病”——其许多右翼民粹党派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外心理。然而,这种贬低民粹主义的看法似乎毫无用处。民粹主义远非一种边缘性的反常现象,它似乎将成为霸权主义的政治逻辑——它不仅表现为右翼排外的丑恶面目,而且还体现在像桑德斯和“我们能党”等的激进民主、平等的希望与愿景之中。

一、全球化世界中对主权的诉求

21世纪,任何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必然从欧内斯特·拉克劳的作品出发,尤其是《论民粹主义的理性》这本书。该书写于10年前,对于防止简化和贬低民粹主义至关重要,极富远见。在拉克劳看来,民粹主义既非反常也非例外,而是一种政治逻辑,旨在促使不同元素的特殊结合,以便建构“人民”这个统一主题,从而动员他们来反对应对迟缓的政治体制。这种逻辑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政治现象中,因为所有的政治团体都必定在他们的话语中涉及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性观念——人民。

然而,在拉克劳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将民粹主义视为形式问题、风格问题而非实际内容、实质问题,这种做法比较冒险。可以说,民粹主义既是内容问题又是形式问题。民粹主义言辞的常见特点——对建制派的叫嚣、对人民和民族统一形象的呼吁,以及对魅力领袖的频频认同——并不能构成“空洞的所指”(一个能脱离任何特定经验的能指,并且可以与任何政治内容相匹配和配对)^[4]。毋宁说,它们是一种特定政治内容的表达方式,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且与过去30年来主宰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对人民主权的诉求——判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对人民主权的诉求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正

式被列入所有共和宪法中的这一原则似乎处境危险。

在互联网和跨国公司联通全球的当今世界,主权——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在其领土内保持完整权威、管辖疆土的能力——被认为是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了。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权”又成为左翼和右翼中新出现的民粹主义阵营和领导人坚持援引的一个概念。英国的脱欧派要求收回控制权,其核心主张是从欧盟那里夺回主权,欧盟被指控剥夺了英国控制自己边界的权力。特朗普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也使用“主权”这一主题,坚称自己的移民计划和提议的贸易协定改革将确保美国的繁荣、安全、主权,并经常攻击自由派精英的全球主义。在法国,勒庞长篇累牍地反对欧盟、移民和恐怖主义,一有机会就提及“主权”,这一概念也是她竞选法国下一任总统的核心理念。在意大利,“五星运动”也经常呼吁主权。2016年,作为“五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亚历山德罗·迪·巴蒂斯塔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并且说意大利应该放弃欧元,重新获得对经济的控制权。

但是,主权问题并非专属于右翼和中间阵营,它在左翼阵营中也普遍存在。对人民主权的诉求是2011年各种运动的关键——“阿拉伯之春”“西班牙愤怒运动”“希腊反紧缩运动”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这些运动都要求人民收回国家权力,并控制贸易和金融流动。在西班牙,“我们能党”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经常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者,而且一贯采用爱国的话语体系。尽管伊格莱西亚斯批评脱欧战略,但他认为,民族国家应该在欧盟内部恢复其主权能力。在美国,与特朗普一样,桑德斯批评全球金融和全球贸易。桑德斯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TPP),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主权。此外,左翼民族主义运

动,如在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追求国家自决方面,也提出了“主权”的概念。

因此,可以说,主权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的“主宰性能指”:这是一个话语和政治的战场,它将决定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霸权争夺方向是前进还是倒退。

但究竟何为主权?更确切地说,何为人民主权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有必要说明,主权本身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术语。尽管许多左翼自由主义作家,如乔治·阿甘本和安东尼奥·内格里都认为主权与威权、右翼政治有着必然联系——许多活动家对此心存疑惑——但主权概念的内涵和政治意蕴远比这个判断更为复杂。

诚然,主权概念出现在专制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崛起之时,这些国家制度试图对某一特定领土施以绝对统治。然而,作为其具体变体的人民主权,也成为民族——人民民主的支柱之一,并被视为有效民主政府的必要条件。从人民民主在卢梭作品中的重要性及其对雅各宾派和法国大革命,以及对美国革命的影响来看,它是左翼历史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概念^[5]。对主权的诉求也是19世纪社会运动的一个特点。譬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术语的起源)和英国的宪章主义者,他们通常被称作民粹主义者,都试图动员人民大众来反对专制政权的统治。最后,人民主权的概念被运用于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最近则见于查韦斯和莫拉莱斯的拉丁美洲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这些运动都试图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在我们目前的历史情境下,在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在这个无孔不入的互联互通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已经在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资本主义公司的全球触角中显示出来——对人民主权的诉求有了新的

现实意义。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要求恢复领土主权——民众自治的空间基础,这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侵扰所导致的破坏和危机的一种回应。其核心观点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计划及其所描绘的互联互通的崇高愿景,已经创造了一个如同噩梦般的“扁平世界”(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以及一个失去控制和规则的空间。这个空间被资本、服务、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无缝穿越,而对地方性和全国性共同体造成的后果则不闻不问。正是这种全球市场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异化引发了收回控制权的诉求,正如英国脱欧全民公投运动的旗舰口号所宣称的那样:对领土自决和自治权的诉求是一种对全球流动的反应,全球流动破坏了所有在领土管制方面的努力。

对于左翼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具有更自由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倾向的人来说,这种主权政治的崛起似乎与由沙文主义和仇外心理驱动的右翼议程密不可分。然而,正如“我们能党”、伯尼和其他人对主权的逐步收复所显示出的情况那样,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后危机时代,一些左翼人士对民粹主义的拥护,并不是对右翼文化霸权的屈服。相反,它源于对以下观念的认同:要对目前的全球化危机做出回应,就必须对左翼计划进行彻底修正。完成这项任务,则需要摆脱若干问题重重的新自由主义设想,这些设想已经被左翼主观化了。

为了探讨民粹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及其核心主权政治,我们有必要采取长时段的视角。不过,在当前这样动荡的时期,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在经历了明显的长期停滞阶段之后,我们似乎正在经历列宁所说的“几周内发生了几十年事情”的时期。参照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情势与两个不同的政治时代——新自由主义时代和民粹主义时代——之

间的断层线相吻合,它们都有各自的主导叙事。

二、新自由主义对主权的抨击

新自由主义时代,作为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主导时期,通常被认为出现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6]。它由一些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卡尔·波普和艾恩·兰德作为指导思想提出,并作为政府政策被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右翼政治家实施。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以企业的形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7]148}。早期自由主义将自由市场视为自然现象。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变种,摆脱了早期自由主义在放任原则下形成的自然主义倾向。相反,它认为市场的产生取决于福柯所言的“司法—机制框架”的建设,取决于一个可以发挥资本主义博弈的法律空间^{[7]73}。这个框架形成于全球体系取代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反对意欲纠正市场失衡的社会政策之时。

这一新自由主义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批判性回应。在知识分子进行干预时,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认为这是一种霸权逻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当代各种主流政治的倾向,在左翼、右翼和中间阵营中都有所体现,它包括“国家控制与干预的新政和人民前线政策,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以及苏联的政治和经济选择”^[8]。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说法,所有这些阵营都意味着一个干预主义的国家最终必然导致纳粹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统治经济把国家看作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再分配的规划者。新自由主义者通过批判这种思想,确保了企业的自由和市场竞争的首要地位。

可以说,当前,我们正在目睹一个范式转变,这个转变与发生在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时代的转变类似。民粹主义时代涉及一种新的中心叙事,这种叙事能够重组整个政治空间,迫使所有行为主体据此进行定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

随着世界向着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过渡,民粹主义时代的出发点是否定前一个政治时代思想和价值观。民粹主义运动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中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围绕的议题只是所有民族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中的有效参与,而剥夺了民族国家任何实质性的社会目标。这种对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关键是重塑主权概念,并找到一个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地方与国家可以自治、自决的有效形式。主权问题是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结合点。这两个阵营给人们留下的共同印象是:今天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联系异常紧密的世界中重新确立领土控制和自决的形式。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关键的政治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超越令人失望的国家计划经济,以及福特时代官僚主义的新世界;如何建设一个能够自由发挥社会创造力和个人能动性的世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如哈耶克、米塞斯、弗里德曼等,把国家计划和社会政策视为国家官僚力量干涉社会的自发动力,如哈耶克对社会自发秩序和人为的国家秩序做出的显著区分时所表达的那样。

这些思想家敌视国家计划和保护主义,瞄准了一切形式的民主主权、领土管辖和管制,这些被他们视为是自律市场和创业精神的障碍。对主权的敌意是哈耶克的开创性著作《自由宪法》中的明确主题。他将主权描述为“教条主义民主主义者”的原则,“一种新的专断权力的正当理由”。他建议,多数统治应受到长期原则的严格限制,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公司和个人的自由免受国家干涉^[9]。

随着 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 1973 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一蓝图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中得到了具体应用,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胜利。跨国公司获得更多流动性资本,规避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开始跨国经营。它们的跨国经营规模为资本家提供了敲诈政府的手段,以获取更有利的就业和税收政策。与此同时,避税天堂激增,这也抑制了主权对税收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正如尼古拉斯·沙克森所描述的那样,通过对那些被用作海盗海湾的小岛屿或微型国家宣称主权,避税天堂颠覆了主权,从而藏匿了从国库中盗取的收益^[10]。由于全球贸易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而实现的贸易自由化也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剥夺了民族国家通过使用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保护当地工业的能力,从而置当地工人于全球竞争的底层,导致工资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

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金融、贸易和通信的联通,每天都有积极的变化:基于互联网而形成了全世界人民沟通的可能性;超市货架上有了进口产品;旅游限制减少,富裕的中产阶级享有更多流动性;对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更加包容。正如南希·弗雷泽所言,以上所述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方面^[11]。然而,全球的互联互通也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在 2017 年 1 月出版的著名的《牛津饥荒救济报告》中有记载:当前,全球最富有的 8 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贫穷的那 50% 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鉴于新自由主义战争对主权的这些影响,在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中,许多人认为主权是制定替代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必要原则,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除桑德斯和“我们能党”外,在这一轮事件中,大部分左翼都保持缄默。部分原因在于,左翼大部分人,无论是温和

派还是激进派,都吸收了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想,将关注点转移到中产阶级群体的后物质主义需求上,远离了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底层的代表(他们有时被称为全球化的遗老)。若要直面 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震动性后果,左翼迫切需要摆脱无意间沦为新自由主义计划从属地位的局面,并重新担当起保护工人和社区免遭资本主义蹂躏、争取社会和经济平等的历史使命。

三、重建领土民主与保护

民粹主义时代肇始于推翻新自由主义时代那些不证自明的假设,特别是它对民族——人民主权的争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粹主义似乎是新自由主义的克星。在新自由主义宣扬个人自由意志不受任何集团控制和管理束缚之时,民粹主义肯定了集体人民主权的首要地位。在新自由主义憧憬着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壁垒的全球化世界的形象之时,民粹主义不但重申领土和国家主权,而且主张要在这些离散和毗邻的空间中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共同体。简而言之,民粹主义试图恢复新自由主义最初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的原则:人民主权。

当代政治的主要困境涉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恢复主权的问题,即如何重建可以在相互联通的世界中提供保护、安全和支持的领土当局。主权问题的回归及其所包含的领土权力的内涵,意味着后危机时代的社会焦虑集中体现在贸易、金融和劳动力的流动上,而这构成了联通世界的经济命脉。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鼎盛时期,这些流动大多被视为财富之源,但在一个经济停滞、不安全、地缘政治不稳定和恐怖主义危害全球的世界中,它们则被视为风险之源。

对全球流动的任何管制都将涉及对国家角色的重新思考,也将涉及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宽松管制所造成的国家权力空洞化而采取的措施

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要愿望是打破一个看似过度扩张和干预的国家机器的刚性外壳。今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愿望是找到新的保护屏障、调整机制和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以便在一个不稳定的、过度干预的世界中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边界和传播系统的开放性,远远没有形成一种开放的文化——一种大众世界主义,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情况:一种恐惧症,一种对开放空间的恐惧,以及一种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

这种失控的感觉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如勒庞和特朗普提供了释放情绪的可燃物,他们成功地将恐惧症与仇外心理联系起来。因此,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左翼无视这种成见,把主权的话语权留给右翼。从根本上说,对恢复主权的诉求,源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民族国家被摧毁时带来的社会苦难和真实的屈辱经历,这一点必须予以重视。只有当左翼努力理解这一全球恐惧症并对其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时,它才有机会在这一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期撼动新右翼的主导地位。

在对主权的本真内涵的理解上,左、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区别明显,全球力量和流动是他们难以掌控的真正根源。对于右翼和排外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来说,主权首先是民族主权,是与民族共同体有关的权力,通常根据族裔和孤立主义的界线加以界定,并动员民族共同体对付外部敌人。这种对主权的憧憬带有浓厚的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色彩。对霍布斯来说,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在防备其他国家时提供安全和保护^[12]。在这方面,主权的重申意味着对移民——包括逃离战争的难民——关闭边界,排斥内部涉嫌危及社会安全和凝聚力的少数群体——现在聚焦为穆斯林。这种排外态度在英国脱欧全民公投中显而易见。在公投中,脱欧派通过诉诸移民和难民问题而获胜,他们指控

移民和难民将导致工资下降、公共服务消耗、助长恐怖主义等。

从“我们能党”到桑德斯,居于左翼民粹主义政治核心的进步主权观的特性截然不同。对于左翼民粹主义者来说,恢复主权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主问题,因为若没有某种主权的概念,若没有一个人民权力可凌驾于公司和个人“特殊利益”之上的领土范围,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人民主权可以被视为对目前的民主赤字的回应,就像科林·克劳奇分析的那样,是对“后民主”时代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左翼的话语中,人们经常看到主权与民主紧密关联^[13]。此外,对主权的诉求与在市场支配期之后重建经济保护形式的反复需要有关,如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所述,在资本主义扩张后的每个阶段,通常会出现对保护和监管的诉求。这是对资本主义将经济从社会中“脱域”出来的方式所产生的必然反应^[14]。因此,左翼民粹主义的愿景是以建立新的防御结构和保护性壁垒为中心,以免在开放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草原上出现“龙卷风式的资本主义”。

差别在于,左翼民粹主义者所确定的敌人是公司和银行,而不是外国人和难民,因为对领土共同体的福祉和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是金融和贸易的流动,而非移民的流动。主权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由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致力于保护普通百姓免受一个超越国家的、违背人民意志的权力精英阶层的宰制,并从经济流动所造成的令人不安和破坏性后果中获益。银行家、腐败的政客和游说者,以及三驾马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都被指责干涉了地方和全国共同体对某种程度的自主权的合法诉求。

未来我们将知晓,谁的主权叙事在民粹主义时代盛行,谁将赢得霸权之战。目前,右翼民

粹主义似乎占上风,这是因为左翼拒绝将自己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并在将主权视为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时犹豫不决。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所造成的民众的愤怒和混乱,左翼迫切需要回归其基本的人民主权观念,并构建一种先进的领土管制观,旨在建设一种新型的激进民主和社会保护体制,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7.

[2]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1971:276.

[3] MUDDE C. The populist zeitgeist [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2004(4) :541.

[4] LACLAU E. On populist reason [M]. London :Verso,2007:71.

[5]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social contract [M]. London :Penguin Books,2006.

[6]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 FOUCAULT M.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8—1979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1.

[8] HAYEK F A.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M]. London :Routledge,2013:160.

[9] HAYEK F 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0.

[10] SHAXSON N. Treasure islands :uncovering the damage of offshore banking and tax havens [M]. New York :St. Martin ' s Press,2014.

[11] FRASER N. 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J]. Dissent,2017(1).

[12] HOBBS T. Leviathan [M]. London :Penguin,2003.

[13] CROUCH C. Post-democracy [M]. Cambridge :Polity,2004:70.

[14]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M]. Boston :Beacon Press,2014.

(上接第 31 页)

者的手中(总体的权力和在所有共同体的成员中平等分配的权力都不再是权力)。因此,尽管霍布斯潜在地意识到虚空能指秩序本身与统治者所强加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分裂,但由于他将前者——通过契约——还原为后者,就不可能虑及两者之间的任何辩证或霸权游戏。

相反,如果我们重新将权力引入另一画面,将会发生什么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社会关系中权力的不平衡性,将会发生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将部分地被建构或不被建构,这样一来,权力总体集中于统治者的手中将不再是逻辑需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对总体权力的声称的证据就愈发不充分。

如果在社会中存在部分秩序,秩序的虚空能指与统治者的意志之间的同一化及其合法性将会产生进一步的需求,即这一意志的内容与社会已经所是的东西不会发生冲突。由于社会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同一化过程将总是不稳定的和可颠覆的,并且,由于这种同一化不再是自发的,不同的谋划和意志将试图霸权化不在场的共同体的虚空能指。而对这一裂隙的建构性质及其政治的制度化的认识是现代民主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 LACLAU E,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Verso,1985.



引用格式:陈科霖.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脉络与分析框架的重构[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48-55.

中图分类号:D625;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48-08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脉络与分析框架的重构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s analytical frame work

陈科霖

CHEN Kelin

深圳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通过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可知,我国传统治理是直线式权力结构,民国时期宪政体制重塑后呈现为多路并存式权力结构,如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小循环”为常规、“大循环”为应急的民众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三元主体间的互动制衡。针对我国这一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大国,在兼顾“历史—现实”与“复杂度—解释力”两个基本矛盾的平衡基础之上,建构基于“中央—地方—民众”三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解开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密码。这种分析框架可以深入解释我国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治理、多重目标与行为选择,以及底线合作与激励差异的内在核心逻辑,从而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关键词: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
历史脉络;
三元分析

[收稿日期]2018-09-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18VSI052);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QNFC1901)

[作者简介]陈科霖(1991—),男,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深圳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国家治理。

一、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结构

历史上,中国的治理体系由两部分组成——政府和地方(社会或军事)组织,后者包括士绅、宗族(家族)和军阀等,他们与政府互相承认但互不隶属^[1]。封建时代中央集权政府治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地方组织在国家治理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周王朝时代,基于逐级分封形成的畿服制成为奴隶社会末期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其治理格局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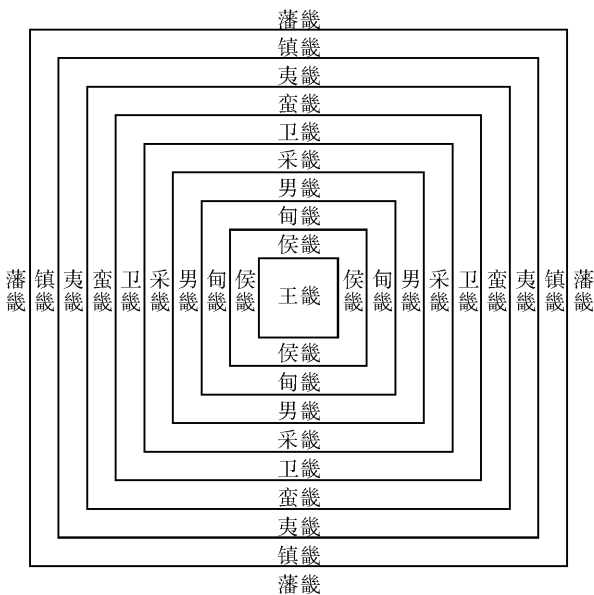


图1 周天子九畿治理格局示意图

有关畿服制的最早表述源于《周礼》。《周礼》将天下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所谓“畿内”是指周王室直接治理的中央,畿内的核心是王城,在王城之外由近及远分别为郊、甸、稍、县、甸,五者间俱以百里为界,它们与王城共同构成了行政体制的核心——“王畿”(或称“国畿”);而“畿外”则指王畿之外的广大地区。据《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大司马》记载,周王朝

时代“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这段记载表明,王畿之外的分封严格依据差序格局,依照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的顺序顺次渐远。其中,侯、甸、男、采、卫又合称“五服”*,而蛮、夷、镇、藩则位于五服之外的“外藩”。周王朝的国家治理以差序格局为基础,构建了以“王畿—五服—外藩”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王畿”作为周王室的财政基地,承担着王室成员的生活费用、王朝的各类宗教活动、军事活动、各项行政费用的开支和王朝官吏的全部俸禄等^[2];而“五服”对周王室担负着或多或少的纳贡义务;周王室的治理能力难于企及“外藩”,因而其间或向周王室朝贡,从而符合其“外藩”身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周时期的分封制,建立了基于郡县制的国家治理体系。郡县制宣告了中央向地方派驻官僚从事政府管理工作的开端。根据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3]的研究,自秦以降直至民国初年,地方行政组织层级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趋势:一是历时800年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组织由二级制变为三级制;二是历时约700年的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地方组织重复了由二级制到三级制的循环;三是历时650年的元明清与民国前期,地方组织逐步由多级制简化为三级制,甚至有短时期的二级制。依据高层政区、统县政区与县级政区的三分法,中国历代政区与地方政府层级的沿革如表1所示。

* 相传夏朝时所谓五服乃甸服、侯服、甸服、要服、荒服。参见《尚书·禹贡》记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而周王朝所建立的畿服制则为文中所述的九服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五服依据亲疏远近,分别担负着不同的纳贡义务。

表1 中国历代政区与地方政府层级的沿革^[3]

时期	高层政区	统县政区	县级政区
秦		郡	县、道
汉		郡、王国	县、道、邑、侯国
魏晋南北朝	州	郡、王国	县、侯国
隋、唐前期		府、州(郡)	县
唐后期、五代	道(方镇)	府、州	县
辽	道	府、节度州	州
宋	路	府、州、军、监	县、军、监
金	路	府、州	县
元	省	路 府 州	县
明	布政使司(省)	府、直隶州	州 县
清	省	府、直隶州、直隶厅	县、州、厅
民国初年	省	道	县、设治局

县级政区以下,则为官制所不及。一般来说,吏在基层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吏又称胥吏,一般由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的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等共同构成^[4]。与官不同,吏更接近于现代公共治理语境下的“街头官僚”,作为官在基层治理权的延伸,吏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亦经历了从乡里制度到保甲制度的转变。据《国语·卷六·齐语》记载:“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可见,在春秋时期,随着诸侯战争的不断兴起,以齐国为代表,就已建立以强军备战为目的的什伍乡里制度^[5];延及宋代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颁布《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材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

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6],这标志着保甲制的诞生。保甲制的确立进一步深化了封建王朝对全国特别是基层的严密控制。当然,保甲制的确立与推行也并不意味着皇权对县级以下基层的稳定控制。皇权究竟“下县”抑或“不下县”^{*},仍为学术界所争论,但国家意志及其统治力并不总能够贯彻到底层社会的治理之中确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就给予了乡绅参与基层自治的空间。事实上,对于吏这个层次的街头官僚来说,缺乏乡绅作为桥梁,其亦难于实现对基层民众的有效治理。同时,捐官制度的存在使得乡绅与吏甚至是官之间产生了可行的通路。而官员退休致仕返回原籍成为乡绅,又提供了体制运行的回路。因而封建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呈现出如图2所示的格局。

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在皇帝之下,基于官一吏、乡绅一民众的直线权力结构维系着国家整体治理的基本秩序。这一权力秩序稳定地持续了两千多年,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一封建专制体制才宣告结束。

二、民国时期宪政体制下的治理结构转型

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成为民主制的宪政国家。综观民国历史,无论是早期的北洋军阀混战期、前期的“剿共”战争时期、中期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后期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均未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根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国民党当局在训政阶段相继通

* “皇权不下县”(或“国权不下县”)源于费孝通的论点。费孝通认为,在县以上由王朝派官员管理,而县以下则由乡绅社会自治(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秦晖甚至进一步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当然秦晖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参见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皇权是否“下县”,确实存在着相关的争论(参见张海英:《“国权”:“下县”与“不下县”之间——析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过了《确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设之基础案》《县组织法》《县自治法》等议案。但随后受内政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又恢复了“保甲制”——一方面是为了推行所谓“新县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赣南等地“剿共”^[6]。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大片国土的沦陷与反复易手使得国民党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几近消亡。特别是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核心的斗争策略使得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大大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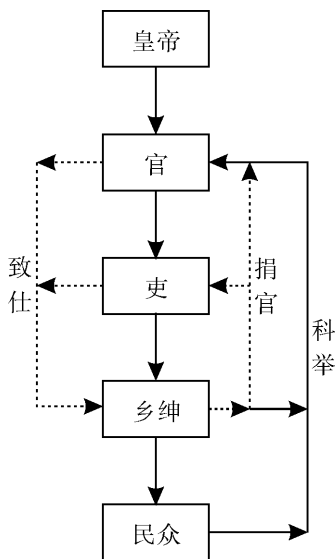


图2 封建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结构

国民党在执政之初,曾经有着明确的国家建设计划,即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第五条所述:“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按照孙中山的设想,首先需要完成以兵力统一全国,“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军政时期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训政时期则旨在推进地方自治的建设,宪政时期旨在“还政于民”。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建国“三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中国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只要国

民党严格按照这一路线加以执行,是有望建成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1928年国民党相继召开二届四中、五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政治问题决议案》和《整理军事案》等决议,公开全面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企图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国民会议于1931年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则是其法律背书。

民国时期,农村的地主乡绅阶层面临着新的治理挑战: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入,传统的小农经济濒临解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使得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生存条件逐步消失;另一方面,民国政府所赖以执政的阶级基础——大资本家、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而地主向资本家转化的社会流动通道是敞开的,因而地主乡绅阶层有机会通过阶层转换完成向城市的迁移^{*}。在双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了多条进路并存的治理结构。

三、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并未将农民运动作为重点,而是在工人运动方面倾注了主要力量。随着“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的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时期。而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点在农村基层,而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将获得巨大的革命力量。民国国家治理中特殊的“二元结构”,使得国民党对农村基层的动员能力与汲取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探索出的基层

* 在土改过程中,康生所发明的词汇——“化形地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指称此类地主阶级,即通过将资产转移至城市从而转型为资本家,以隐蔽其在农村所榨取的财富,进而逃避被批斗的一类地主阶层。

组织体系则发挥出超强动员力量,成为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组织保证。

1931年,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家治理的开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治理结构上分为全国、省、县、区、乡五级制。自此,“皇权不下县”的历史传统被打破,乡政府正式作为一级政府进入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之中。乡级政府下设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内务、工农检查、文化、卫生等固定的办事机构^[7],亦设置有临时性的委员会等组织。由于苏区大部分位于农村基层地区,因而如“豆选”等直接民主形式亦被共产党所采用,在相当程度上赢得了民心^[8];而在以“打土豪、分田地”,甚至是直白如“打倒土豪劣绅,吃红番薯”的口号带动下的农民运动,为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高度组织化+直接民主+农民运动”三位一体的治理方式,实现了阶级基础积累、基层政权建设与革命军事斗争三方面的有效推进。

全国解放后,基于党政军一体的战时政府体制已不再适应建设时期的需要,以大区一级为例,其名称就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政委员会”向“行政委员会”的转换。随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五四宪法”得以通过,成为新中国依法治国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受“文革”的影响,“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出现了阶段性的倒退,但随后由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八二宪法”恢复了“五四宪法”的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与2018年5次修订,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9]。可以说,法治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及其发展进程的重要理念。“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通行的行为准则。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和组织层面:政治领导通过路线、方针、政策对国家治理进行宏观把控;思想领导则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教育党员、干部与群众贯彻大政方针;组织领导则基于党的干部人事制度进而实现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条内涵则进一步丰富了党的领导的内涵,并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可见,党的领导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仍然在不断加强,凸显了其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强大影响力。

公民参与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在日渐凸显。制度化的公民参与包括以人大为代表的代议制参与、以政协为代表的协商参与、以公民监督为代表的监督参与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推进了公民参与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信访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对于解决公民监督难、监督远、监督繁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但是,信访制度在现实运行中却“墙内开花墙外香”——基于信访体制的规定**,信访事项的解决按一般程序仍将回到原部门,而出于各种原因,原部门对信访事项的处理结果往往难以使相对人满意。在此情形之下,相对人为谋求满意的结果,常会选择越级上访的方式解决,而越级上访的通道是被关闭的***,以致相对人闹出更为激进的越级上访形式,从而出现了诸如“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实怪圈。有学者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政体。由于时值国共内战时期,国家疆域、人口、行政区划不定,特别是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中央红军主力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行政体制、名称等时常变化,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

** 参见《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三款之规定。

*** 2014年2月25日中办、国办引发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不支持、不受理越级上访。”

指出,“闹大”首先是利益受损民众公开地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其次是弱勢的抗争者进行外部资源动员的过程,然后还是一个公民主导的政府议程设置的过程^[10]。

以“闹大”现象为例深入考察,可以进一步解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由于中央无力开展对庞大国家的直接管理,基于层层委托代理构建覆盖全国的行政体系,以辅助参与国家治理就成为必然。中央通过对干部人事的强控制、直接控制实现对地方官员执政行为的弱控制、间接控制,并要求地方官员依法行政从而降低执政成本与风险;中央虽然不能够直接管理民众事务,但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奠定了执政稳定性的思想基础,而当民众对地方官员不满时,民众首先会依据中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借以表达对地方官员的不满情绪,从而迫使地方官员提升服务质量,当这个“小循环”无法解决民众的困难时,民众会借助“闹大”的方式迫使中央介入,从而在基于中央“为人民服务”的正当性权威基础上,借助中央干部人事管理的权限对地方官员予以问责,进而在“大循环”的框架下实现问题的解决,并最终降低执政的系统风险。在整个国家治理运行机制中,以“小循环”为常规,“大循环”为应急的三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制衡,构成了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逻辑,并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国家治理所隐含的内在风险。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主体及其风险降低机制如图3所示。

四、“三元互动”分析视角下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再审视

在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建构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理论的复杂度与解释力之间的关系。

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说是对社会现象高度的凝练与概括。与自然科学中现象对于定律相对准确的服从性不同,社会科学受人的主观性的影响,事件对规律的服从性明显弱于自然科学中现象对定律的服从。因而就社会科学而言,尤其要重视数理统计中的两类错误*。作为一般的研究思路,应当在尽量避免犯第一类错误的基础上降低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这就要求“规律线”的设计要尽量简洁。

从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3个观察点寻找规律的过程见图4。基于3个观察点的拟合可以采取3种典型的备选策略。由图4不难看出,以形如 $y = ax + b$ 式的一次拟合仅能够使观察点在一定程度上落到一次回归线附近的一个区间之中;以形如 $y = ax^2 + bx + c$ 式的二次拟合则可以精确地将3个点均落入回归方程之中(且唯一);而以形如 $y = ax^3 + bx^2 + cx + d$ 式的三次式进行拟合,可以得出无数条曲线。

以此类推,经过 n 个不共线点($n \geq 3$)的拟合曲线,可得出如下推论**:

1) 利用 $(n-2)$ 次及更低次拟合,无法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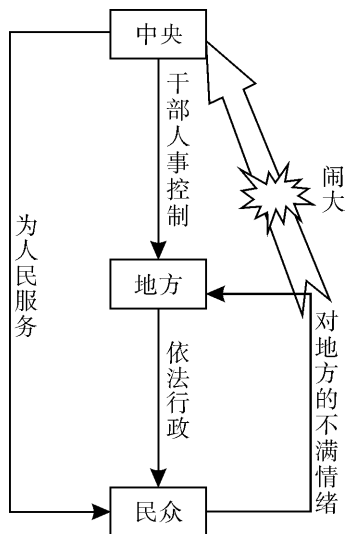


图3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主体及其风险降低机制

* 第一类错误,是指当虚无假设正确时,而拒绝虚无假设所犯的错误,这意味着研究者的结论并不正确,即观察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处理效应;第二类错误,是指虚无假设错误时,反而接受虚无假设所犯的错误,即没有观察到存在的处理效应。

** 因文章主题与篇幅有限,此处数学论证从略,但这一引理不难得到印证,如有兴趣就此问题探讨者可与作者联系。

完全经过所有点的拟合曲线,但存在一条(或数条)最佳曲线,使得所有点离曲线距离之和最小(低次拟合的最佳性);

2)利用 $(n - 1)$ 次拟合,可以得出一条完全经过所有点的完美拟合曲线(适次拟合的唯一性);

3)利用 n 次及更高次拟合,可以得出无数条完美经过所有点的拟合曲线(高次拟合的无穷性)。

基于这一推论可以进一步解释理论的复杂度与解释力之间的关系。对于若干观察到的现象而言,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并合理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是研究者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理论的复杂度如同上文所提及的拟合曲线,拟合曲线的次数愈高,所能够解释的观察现象则愈精确,因而模型的解释力也就愈高。但理论的复杂度与解释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虽然愈复杂的理论对已观察的现象的解释力愈高,但当新的现象出现时,复杂模型的解释力恰恰可能会更低。如何在平衡复杂度与解释力的基础上建构理论模型,无疑是对研究者理论建构能力的深入考验。

有作者曾经指出,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有两条核心主线: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11],前者与后者之间相互关联,使得两种关系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产生了互动。基于“中央—地方”的二元考察,易于从国家治理的权力运作方面观察并获取经验,但对这一权力运作背后的深层次影响机制考察不足;而基于“国家—民众”的二元考察,易于较为

完整地认识国家治理的全景,但与“民众”相对的“国家”则常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见,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进行了切入,但如何从一个整体性视角来系统地认识中国的国家治理,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索。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两条核心主线进行系统化的整合,从而尝试构建一个三元的分析框架,以更为深入地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参与主体及其互动模式。

结合前文所述的“复杂度—解释力”框架,基于“国家—民众”的分析视角可以解释一系列国家治理中的现象(如图5a)左半部分所示);同样地,基于“中央—地方”的分析视角亦可以解释另一系列国家治理中的现象(如图5a)右半部分所示)。而图5b)则展示了一幅利用整合的三元分析视角解释国家治理现象的场景。相比于图5a)所示的情形,虽然模型的复杂度增加了,但也更加完整了。对于碎片化的研究视角,如果可以通过增维的方式构建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并且在兼顾理论之解释力的前提下不过多地将模型复杂化,那么这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仍是可取的。

分析中国的国家治理时,相比于二元视角,三元视角的三重关系可以带来新的研究发现(如图6所示)。以“国家—民众”的主视角为基础向三元拓展,将“国家”这一主体拆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主体,“国家—民众”关系则可拓展为“中央—民众”与“地方—民众”两种关系,加之新加入的“中央—地方”关系,使得原有两维度的关系拓展为三元互动关系。三元互动关系揭示出一种可能,即“中央—民众”关系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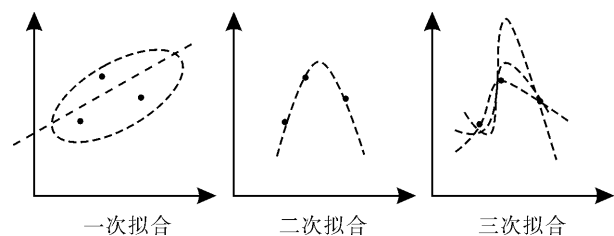


图4 从3个观察点寻找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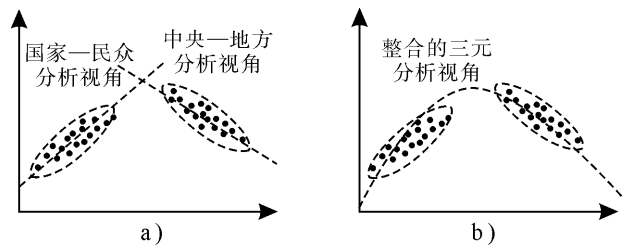


图5 由二元视角向三元视角的整合

方—民众”关系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机制,而对这一机制的深入挖掘将有助于进一步解开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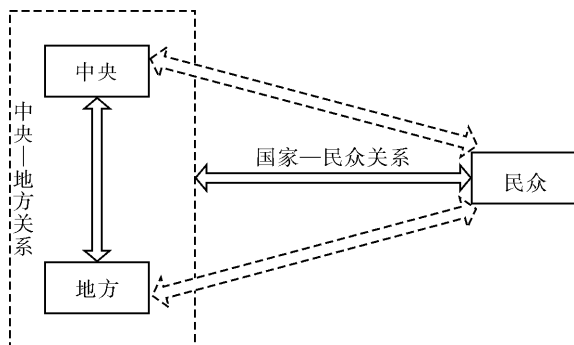


图6 观察视角拓展产生的新关系

在“中央—地方—民众”三分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决策委托人、执行代理人 与民众三方治理主体,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三元治理价值,意识形态、绩效与程序三重治理压力,以及政治教化、晋升激励与法制建设三种治理手段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三元互动治理结构^[12],它可以深入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中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治理、多重目标与行为选择,以及底线合作与激励差异的内在核心逻辑^[13]。这一逻辑的构建有助于解释作为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大国^[14]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国家治理问题,从而丰富与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 张静. 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J]. 社会, 2014(6):85.
 [2] 吕文郁. 周代王畿考述[J]. 人文杂志, 1992(2):92.

- [3] 周振鹤.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58.
 [4] 叶炜. 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81.
 [5] 臧知非. 先秦什伍乡里制度试探[J]. 人文杂志, 1994(1):68.
 [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八·起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尽其月[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4.
 [7] 李伟中.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J]. 社会科学研究, 2002(4):119.
 [8] 钟利民. 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管理体制[J]. 江西社会科学, 1992(5):90.
 [9] 牛铭实, 米有录. 豆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80.
 [10] 吴邦国. 我国已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EB/OL]. (2013-03-08) [2018-09-08]. [http://theory. people. com. cn/n/2013/0308/c49150-20726969. 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08/c49150-20726969.html).
 [11] 韩志明. 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J]. 人文杂志, 2012(3):163.
 [12]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J]. 学术月刊, 2014(10):5.
 [13] 陈科霖. 论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互动结构[J]. 人文杂志, 2017(7):112.
 [14] 王频, 陈科霖. “三元互动结构”:制度逻辑、内在张力及其重构[J]. 社会科学家, 2017(9):76.
 [15] 陈科霖. 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互动逻辑[J]. 公共行政评论, 2018(6):207.



引用格式:张力伟.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价值[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56-62.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56-07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ory and its reference value to China

张力伟

ZHANG Liwei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作为现代世界最具合法性的政治价值之一,民主理论依然保持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广受关注的新式民主理论。一般认为,协商民主是对参与式民主的重构。而在新近研究中,参与式民主理论对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开放的民主结构与参与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解决了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小的问题,拓展了协商目标——不仅要达成决策,更要关注其政治功能。参与式民主理论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在于:一是构建更为开放的决策体系,保证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决策格局,在保证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反映的同时,落实政府回应,形成参与的双向信息流动;二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逐渐拓展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制度化形式,构建系统性、多层次的协商民主结构,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让民主回归生活、回归基层,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效能。

关键词:

参与式民主;
协商民主;
国家治理现代化

[收稿日期]2018-08-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专项任务研究项目(17JFZX035)

[作者简介]张力伟(1992—),男,辽宁省营口市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

20世纪以来,民主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性政治价值,不少后发国家先后迈入民主国家行列,采取不同的制度形式实施民主政治。“民主的传播依赖于民主理念的合法性,民主的崛起与传播人人平等的观念息息相关。”^[1]作为现代世界最具合法性的政治价值之一,民主理论依然保持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在自由民主、多头民主、精英民主等不同理论的互鉴、反思、共进中,作为新式民主理论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广受关注。一般认为,协商民主是对参与式民主的继承,也是对参与式民主的重构^[2]。在政治理论中,协商民主更是被视为最成功的民主新形式^[3]。而在新近研究中,参与式民主呈现复归之势,并展开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深刻反思。鉴于此,本文拟立足于二者的学术争鸣,在简要分析参与式民主与协商民主之关系的基础上,介绍参与式民主的新近研究成果,分析参与式民主对协商民主的批评反思,从中提炼出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巩固与深化提供思路。

一、从参与到协商:参与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演进与不足

1. 参与式民主的起源、特征及其不足

参与式民主源于自由民主的异化。虽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高调宣告自由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但其在现实中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在号称自由、民主、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贫富悬殊、种族隔离、政治冷漠成为普遍性的政治病症。对此,本杰明·巴伯将自由民主称为“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他认为,自由民主的价值“是谨慎的,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它服务于排他性的个人主义企图和私人目的。由于自由主义民主根源于这种不稳固的基础,所以不能指望它能够形成有关公民资格、参与、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美德的坚实理论”^[4]。于是,自由民主沦

为单纯的选举程序,大众的政治参与被精英挤压,民主有名无实。对此,理论家们呼吁,民主需要重新将实实在在的“参与”引入到民主过程中来,改变有名无实的异化状态。参与式民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哈贝马斯、阿伦特、麦克弗森等都为参与式民主提供过思想资源。但学术界的共识是,佩特曼于1970年代发表的《参与和民主理论》才是参与式民主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参与式民主源于古典民主,认为政治生活中的全面参与才是实现自由平等的保证,公民自由取决于对政治事务的参与,参与性社会才是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5]。总的来看,参与式民主理论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参与式民主拓展了政治的内涵,认为政治不仅关涉政府这个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还包含工作场所等生产场域,“参与性社会的观念要求‘政治’的范围延伸至政府以外的领域”^[6]⁹⁹。参与式民主嵌入在社会各个领域、层次,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广泛性。其次,参与式民主强调对决策的参与而非简单的投票。参与不仅仅是政治行为,还是政治平等的表征: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每个人的利益都要被平等地考虑^[7],参与要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决策过程。最后,参与式民主注重对公民政治能力的培养,是一种发展型民主理论。就民主的发展性价值而言,公民直接参与是为了能够享有自由、锻炼能力、贯彻平等^[8]⁵⁸。参与式民主理论继承了卢梭的思想遗产,认为参与决策是自己成为自己主人的手段,通过参与可以认识政策、懂得政治,是提升自身能力、获得归属感的必经之路。

不过,参与式民主并非否定代议制民主,而是希求与其形成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以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要。然而,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概念、价值与应用方面也存在着弊端,这是参与式民主一直难以拓展的重要原因。一种直接的批评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对个人参与的期望太高,对当代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判断不足”^[2]。

因此,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修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新思潮,又成为民主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

2. 协商民主的内核、实践与不足

协商民主继承了参与式民主的志向,继续批判代议制民主的弊端,与参与式民主相似,协商民主也统合了民主的过程与实质,以自由、平等为内在价值。只是协商民主更加聚焦民主决策中的审议协商。协商民主理论家认为,协商事实上也是参与的一种形式,强调政治选择必须是自由、平等和理性的行为者之间就目的进行协商的结果^{[9]1-18}。在他们看来,不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直接民主,个人冲突、名人政治、口水政治,以及赤裸裸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和野心都充斥其中,与之相反,他们拥护有见地的辩论、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8]266}。

目前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基本遵循两种思路:一是根据协商民主的理念发展出新的形式;二是关注协商民主的方法与技术,将其付诸实践^[10]。协商民主开始应用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也开始通过统计学、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测算其绩效。实践中,公民会议、公民陪审团、愿景工作坊、协商民意调查等是协商民主的几种基本形式^[11],被广泛应用于巴西、加拿大、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当然,协商民主也未逃过被批评的命运,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批评包括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概念角度看,批评者认为协商民主过于理想化,忽视了政治中多元分歧与冲突的事实^[12]。从实践角度看,协商民主面临着推广成本高、协商技术复杂等问题^[10]。

参与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皆缘于批判代议制的弊端,试图将代议制的唯过程论转化为过程与实质相互嵌套的制度安排。参与式民主认为,只有通过真实的参与,才能提升政府责任意识、促进政治回应。协商民主认为参与本身存在问题,希望通过协商取代参与,视民主为审慎商谈达成决策的过程。协商民主理论在学术论争中看似取得了胜利,但

其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而参与式民主则根据现实不断进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重新调整了理论指向与适用性,并针对协商民主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二、参与式民主理论的自我调适与对协商民主的反思

参与式民主理论并未回避其瓶颈,甚至也承认受制于政治社会现实^[3]。但是基于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协同的“参与式治理”概念的流行,使得重新探讨参与的内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除时代变迁带来的制度环境的改变外,参与式民主理论家认为对协商民主的研究具有片面性,因为其仅聚焦协商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而很少关注是否真实地促进了公众参与^[3]。面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的诸多困境,参与式民主理论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并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反思。

1. “参与”的类型学分析与协商的限度

概念是政治理论构建的基础,概念的混用、误用与替代往往会引导不同领域的研究。就广义的“参与”而言,其内在分为沟通、咨询和参与三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其参与机制中往往都存在发起人和公众代表两个核心主体。就决策而言,二者之间是一个传递与分享信息的过程。沟通与咨询往往是单向度的信息流,参与则是双向的^[13]。以此为分析框架,协商民主理论家由于过分关注交谈而忽视了协商中的信息分享,从而导致协商效率降低。这一现象后来得到了协商民主理论家的关注,在加拿大的协商民主实践中,信息共享成为协商中的关键环节^[10]。而参与式民主理论家更进一步,认为协商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手段,而应是民主制度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目前的协商民主运作在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系统之外,忽视了宏观的民主制度,协商决策的场域并没有同更为广泛的公众联系起来^[3]。以加拿大选举制度改

革的公民会议为例,参加协商的公众代表所选择的方案却在全民公投中落败,说明协商同整个社会是隔离的,虽然公众代表理解了选举制度改革的优势,但是社会公众对此漠不关心,最终导致了决策的失败。

可见,协商民主的限度在于忽视了整体性的社会,仅仅将协商圈定在小范围的论坛、会议之中。在涉及民主的规模时,参与式民主也承认小规模团体协商和参与的绩效,但其不像协商民主那样将协商仅限于特定团体、特定时间^[3],而是基于参与的信息流理论,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信息流问题。在参与式民主理论家看来,协商、交谈与辩论存在于任何民主形式之中,协商只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3]。民主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制度内部的交互性沟通,一个场域内的协商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此,协商的场域要同整个社会勾连起来,形成完整的信息流。例如,在不民主的制度之下,精英内部的协商决策并不能称之为协商民主,而更类似于学者所说的“威权协商”^[14],民主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特征。选举制度的议题关涉全社会,权力当局有义务让全社会了解关于选举制度的信息,使得在全社会形成信息流,反馈到协商层面当中,而不是让代表们关起门来学习选举制度知识。

基于对参与的信息流和协商民主实践困境的分析,参与式民主理论家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巩固与深化:(1)不同于单向度的信息输入与传递的咨询和沟通,参与是实在的交互过程,参与主体既要充分地讨论议题,也要对决策有真实的影响力,具有控制议程的权力。(2)强调参与式民主的教育功能,个人需要“通过参与学习参与”^[3],因为参与式民主的教育功能只有在民主的结构之下才最有可能,民主的结构给予了每个人平等参与的机会。(3)参与式民主统合了特定场域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强调了参与式民主对多层次、多维度的民主建设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参与

式民主既要嵌入与民众相关的领域,还需要不断拓展,以实现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之间的有效衔接。

2. 参与式民主的目的和协商的限度

早期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将自身的功能锁定在公民教育层面。例如,佩特曼就谈到,“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参与的教育功能和工业领域的关键性地位”^{[6]40}。佩特曼的论证可以抽象为参与能力与参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即在公众参与能力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参与制度会不断地维系下去。然而,佩特曼的理论后来被经验所证伪,参与式民主在追求共识时可能无法保护个人权利,在面对多元利益和差异时,参与式民主依然采取简单的多数规则来决定最终结果的做法也常常失效。

面对这些批评,参与式民主理论力求从规范与实证两个方面完善自身,在其自我修正中,参与式民主将协商当作重要的参数加以考虑。事实上,参与式民主认为协商只是参与之后的事情,现实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消弥代议制的弊端,如果连参与都没有,谈协商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正如前文所谈到的,参与式民主认为协商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是存在的。协商民主事实上没有说清楚两个重要问题^[3]:其一,协商到底在何处发生?对此,协商民主仅给出了小型社区、市民会议这种小规模场域的答案,而且这些场域内的协商还逐渐被一些失败的案例所证伪。其二,协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协商民主理论家给出了取得共识、达成决策、表达个人偏好、实现偏好转换等说法,但任何民主都是要取得共识的,那么协商民主之目的的特殊之处又体现在哪里呢?

针对协商民主之目的的暧昧不清,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最近的修正中将民主化突出,认为参与式民主的目的不仅是教育,最关键的是要成为民主化的动力。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参与式民主从结构的视角出发,认为其民主化的主张体现在对参与机会的强调,参

与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分配的过程^[15]。参与式民主在开放的环境中最为可能,而通过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亦能够将封闭的结构转化为开放的结构,使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其次,强调公众应在自身最熟知、关系最密切的领域积极参与,并循序渐进地扩大到整个政治系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当公众意识到自己的参与能对决策产生影响时,就会对参与产生强烈的兴趣;公众的视野也并非像原有研究中表述的那样仅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公众也乐意参与更加宏观、整体性的决策^[3]。最后,参与式民主通过促进回应来构建真实的民主。参与式民主理论家认为,巴西的参与式预算*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核心在于其对治理绩效的提升和政府责任的倒逼,这也是参与式民主推动民主化的力量所在^[3]。

针对协商民主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参与式民主理论家提供了更具有包容性与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以实现协商民主的批判与超越。总的来看,参与式民主对协商民主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承认协商民主基本价值的基础上重视制度结构,指出了开放的民主结构与参与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其二,解决了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小的问题,认为参与应在关注与公众息息相关的领域的同时逐渐拓展,以形成多领域、多层次的系统性参与式民主格局;其三,拓展协商目标,认为民主的目标不仅是达成决策,更应在立足于民主教育功能的基础上着重关注其政治功能。

三、参与式民主理论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并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16]^[17]。结合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参与式民主理论可以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1. 构建更为开放的决策体系

参与式民主理论认为,开放的政治系统对于民主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保证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是治国理政的关键。“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17]^[29]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同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化相伴而行,改革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如果不能有效应对,那么改革的发展成果将大打折扣。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就需要各个利益群体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身的利益诉求有机会得到决策系统的合理关切,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18]一旦政治系统走向封闭,那么整个政治流程将会形成梗阻,既无法汇聚良好的信息,也不能输出科学民主的决策,进而导致系统失灵。因而,构建更为开放的决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保证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防止利益集团对决策议程的裹挟,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决策格局,使得决策始终围绕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轴之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由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广大群众组成,是“一核多元”的有机整体。在保证国家对大政方针方向把握的基础上,尊重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可以使他们能够分享决策权力,积极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发挥自身功能,协助国家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在构建协同共治的决策格局方面,既要防止既得利益者对议程的控制,又要降低参

* 需要指出,巴西参与式预算是世界上较为成功的参与式民主案例,当然,由于参与式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一案例也经常成为协商民主理论家关注的重点。但是佩特曼认为,从过程角度看,巴西参与式预算更应该被纳入参与式民主的范畴。目前,巴西参与式预算已经不局限于政治领域,也被私人部门、NGO内部所借鉴。

与成本,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与诉求有制度化的输入渠道。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和时代背景下,一要构建参与型政府,促进信息公开,积极完善现有的各项利益反馈制度,如人大、信访、听证等;二要顺应科技发展,充分发挥网络与媒体的作用,采用互联网与新媒体等现代工具拓展利益表达渠道,构建网络民主;三要调动社会力量,利用社会组织将民众的声音汇聚起来,形成更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在政社互动中实现民众利益诉求的反馈。

其次,在保证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反映的同时,落实政府回应,形成参与的双向信息流动。参与信息流的双向性要求从相关利益群体中获取信息,保证信息量的最大化(最少的信息损失),当信息传递到其他主体并进行有效处理后再次反馈回去,由此实现良好的交互^[13]。质言之,参与要求参与主体同参与对象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形成输入—输出的循环流动。在决策系统中,输出就是政府回应的过程。政府回应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对信息的接受,而是将信息处理的结果返回给参与主体,供参与主体评判。例如,一项政策在转化为具体实践后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动态监督,并在参与主体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政策,实现信息的再次反馈,最终构成完整、有序、长效的信息流。这一信息流不仅是参与的基本流程,而且是决策的修正机制,只有在不断的反馈回应的过程中,决策者才能够不断发现新问题、处理新问题,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如民主理论家萨托利所指出的,民主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变为现实,就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变为监控性反馈机制^{[19]85}。

2. 构建系统性、多层次的协商民主结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7]291}。与西方协商民主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立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制度结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发明并不断创新发展

的制度形式,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性与现实性。当然,与西方协商民主共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强调协商对于民主的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7]292}。因此,要想进一步深化巩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应以商量为核心,以参与为手段,构建一个系统性、多层次的协商民主结构。

所谓系统性、多层次,是指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逐渐拓展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制度化形式,形成协商的良好风气,在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所培养协商的良好习惯。这是弥补大型社会民主缺陷、促进公民参与、提升公民能力、深化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手段。虽然受制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治理规模,全民参与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代议制依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存在,但可以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到与其同一层级、与其生活相关的领域中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等聚焦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之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与政府展开社会协商,就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和执行者展开协商对话,充分发挥不同领域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协助政府解决具体领域的问题。此外,广大社会公众还可以参与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和社区中,拓展出工作场所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例如,工人可以针对劳资问题同企业展开协商,学生与教职工可以就教育发展问题同学校展开协商,社会居民可以针对社区和谐稳定问题共同协商,等等。参与式民主的实践表明,公众有兴趣参与到同自身息息相关的领域中,这种协商式参与有助于问题的实际解决。简言之,不断拓展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切实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的来看,参与式民主理论强调参与是全方位的,正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所言,只有

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在民主程序下运行,社会的民主政治才具备充分的条件^{[19]VIII}——这也正是参与式民主强调的民主化的内核。同样,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是全方位、系统性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17]297}。社会是由不同细胞构成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在社会细胞中发扬协商的良好风气,带动人民民主。

四、余论

参与式民主虽然产生于西方,但由于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与实践性,具备了适用于价值观更加多元的不同社会制度的能力。参与式民主基于自身理论的不足和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优化,重点关注开放的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的民主,这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民主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理论的更新,更在于实践中民主制度的活力和有效性,我们应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让民主回归生活、回归基层,拓展参与渠道、培植协商氛围,构建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与民主模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激发出社会主义民主自身活力,才能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效能,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 福山.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族全球化[M]. 毛俊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9.
- [2] 陈尧. 从参与到协商: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深化[J]. 社会科学,2013(12):25.
- [3] CAROLE P.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revisited [J]. Perspective on Politics,2012(1):7.
- [4] 巴伯. 强势民主[M]. 彭斌,吴润洲,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4.
- [5] 陈尧. 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逻辑与限度[J]. 政治学研究,2014(3):18.
- [6] 佩特曼. 参与和民主理论[M]. 陈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7] 达尔. 论政治平等[M]. 谢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
- [8] 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M]. 燕继荣,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9] 埃尔斯特. 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M]. 周艳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10] 张力伟. 协商民主的内在张力:基于中外实践案例的梳理[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3):64.
- [11] 谈火生,霍伟岸,何包钢. 协商民主的技术[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5-51.
- [12] 郑琪. 民主政治与激情——论墨菲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批判[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64.
- [13] GENE R, LYNN J F. A typology of public engagement mechanisms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005(2):251.
- [14] HE B G, MARK E W.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J]. Perspective on Politics,2011(2):269.
- [15] MODISE L J. The notion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relation to local ward committees: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J]. In die Skriflig,2017(1):2248.
- [1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8] 张贤明. 低成本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之道[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13.
- [19] 李普塞特. 政治人[M]. 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引用格式:韩超,杨洁.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63-68.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63-06

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Study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

韩超, 杨洁

HAN Chao, YANG Jie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观念,以及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结合自身历史、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等条件进行的实践探索、形成的各种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对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有如下启示:一是提高农业、农村、农民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产业效益低下和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二是统筹城乡整体规划,使农村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三是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让一定范围内的郊区居民享受到由城市居民带来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同时二者在文化观念上也可以互补;四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均衡发展

[收稿日期]2018-11-23

[基金项目]郑州轻工业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17050)

[作者简介]韩超(196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洁(1992—),女,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城市和乡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英国产业革命时城市从乡村分离以来,城乡关系便随之产生,城乡关系问题也引起了各国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于改革开放后才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其研究尚不深入,亦不全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王长生等^[1]通过对重庆市 2000—2009 年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发现重庆市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虽然自 2007 年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有所提升,但城乡经济、社会、生活、环境等各方面仍处于二元结构的发展状态。李传兵等^[2]指出,马克思的城乡关系思想在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伟大实践中正表现出重要的指导意义。任吉东^[3]认为,在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城乡关系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和完善。贺雪峰^[4]认为,当前中国的城乡经济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远比农村经济发达,正是基于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缓解当前中国发展中城乡不平衡的问题。

综上可知,国内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针对某个地区、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城市史和乡村振兴等方面,而对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较少。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早于中国,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鉴于此,本文拟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对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进行考察,从中获取经验启示,以期推动我国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一、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理论

发达国家最早对城乡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

是亚当·斯密^[5],他以经济学为视角提出的自然顺序论,明确了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发展顺序,揭示出城乡关系的本质和初始状态,奠定了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和框架。之后,阿瑟·刘易斯、古斯塔夫·拉尼斯、费景汉、迈克尔·利普顿和麦基等学者根据不同时期所出现的城乡发展问题,又提出了不同的城乡关系理论,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954 年,阿瑟·刘易斯^[6]在他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并存着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和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这一理论虽为后续城乡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忽视了农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过于强调通过城市工业化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片面引领,以达到城乡平衡发展的目的,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研究模型^[7],重点关注农业发展对城市工业扩张的基础与限制作用。

针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状况,1960 年代末,托达罗则进一步提出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用预期收入的概念较好地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的现象,认为这是由人们对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的判断决定的,而不是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所导致的^[8]。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上,他认为应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视,就地建立农村工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减少城市的向心力^[9]。

这种对工业和农业两大经济主体之关系的二元研究,表示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开始将城市和农村分离为两个主体,发展中国家研究城乡

关系开始关注农村的发展状况。

2. 城市偏向论和乡村中心论

1970年代以来,围绕城乡发展问题,理论界先后形成了城市偏向论和乡村中心论。城市偏向论是农村经济学家 M. Lipton^[10]提出的,他认为虽然理论上承认了农村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积极的发展要素依旧大多偏向城市,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极不利于乡村的发展。20世纪后期,为缓解由城市偏向政策导致的城市交通拥堵、污染严重、就业困难等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现象,广大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乡村,乡村中心论也由此产生。但这种过度关注农村单一发展、忽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和引导作用的理论,使城乡关系研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3. desakota 概念

事实证明,任何偏向一方的城乡发展理论,在城乡发展的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因此,19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城乡之间的关系。加拿大学者 T. G. Mcgee^[11]提出的“似城非城、似乡非乡”、城乡界限日渐模糊的 desakota 概念,表明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无法分割的密切关系。这一观念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分观念,摒弃了城乡之间对立发展的做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广泛接受,多数人开始以城乡融合的理论视角观察和研究城乡关系。

从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变化,可发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对城乡关系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城乡融合发展将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趋势。

二、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

很多国家在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不

仅验证了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而且探索出一些成功模式。但因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条件的差异,每个国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措施和程度均有自己的特点,以下选择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分析。

1. 强调乡村发展的英国模式

英国是产业革命的摇篮,因而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步入城市化之后最早关注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面对城市化带来的诸多城乡矛盾,英国于18世纪就开始在全国进行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在1948年制定了《城乡规划法案》,将城乡发展问题法制化,为各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英国的城乡规划中,最值得借鉴的是英国政府对乡村传统特色保护的重视。1949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国家公园和享用乡村法》,通过法律来保障英国乡村的传统特色^[12]。

英国对乡村传统特色的保护,一方面提高了城市居民对乡村作用的认识,使他们认为乡村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农产品,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城市的优美田园风光,更为他们的城市生活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对乡村的保护就是在保护他们城市的花园;另一方面鼓励农民在经营自己土地的同时采取良好的环境保护措施,并给予嘉奖和补贴。英国政府采取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仅让农民保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又使农民从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无形财富,保障了英国乡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 町合并村的日本模式

二战后,日本为了赶超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日本天生不足的农业发展面临更多的问题,城乡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本政府开始采取

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的政策,把城市和农村纳入综合规划之中,开展市、町、村大合并运动。市、町、村为日本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市是城市地区;町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区,相当于中国的镇;而村即为农村地区^[13]。在日本,从数量上来看,村是最多的,在大合并运动中,大量规模较小的村被町吸收,部分町又逐步被市合并,从而使村、町、市的排列顺序从数量上转变为町、市、村的排列顺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组织结构中,町既吸收了市的现代化又保留了村自身的特色,形成了“城中有乡,乡中有村”和谐发展的田园都市新型町,推动了日本田园城市建设,成为日本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典型。

3. 都市区带动的美国模式

美国也曾因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城乡关系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美国采用了以建设大都市区带动城乡发展的模式。

20世纪初,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随之一系列城市问题如人口过多、住房拥挤、环境恶化等越来越严重。1920年以后,伴随着美国科技的发展、交通网络的完善,美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居民开始向城市周边生活环境较好的郊区转移,大量的工商业也向郊区迁移,形成连接美国城市和农村的大都市区地带^[14]。为不断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了大都市区带动城乡发展的模式,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其一,对农业实行补贴。由于美国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和对农业的高科技投入,事实上农业成本很高,农民得到的利润也微乎其微。农民之所以可以继续生存,除美国政府积极帮助农民开拓国际市场外,更离不开美国政府对农民从购买农具、种植维护到农产品市场销售给予的一系列政策补贴。

其二,完善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美国政府每年在财政上都会有大量资金投入农村的道路、水电、排灌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保障农村在各方面毫不逊色于城市,从而有效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5]。

其三,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发展。在美国,一位农民之所以可以耕种几百亩甚至几千亩的土地,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高科技农业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另外,美国还大力推进农业院校的发展,开展多元化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自身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既缓解了城市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缓和了城乡之间的矛盾,为后续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做了铺垫。

4. 城乡平衡发展的德国模式

德国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最突出特点是一直坚持城乡平衡发展政策,采用城乡等值化的均衡持续发展模式,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城市甚至乡村,各地的城镇布局和经济发展没有明显差异^[16]。一方面德国在城乡建设和规划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地区差异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所有地区均形成平等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在社会保障上,德国宪法给予农民享有市民享有的一切基本权利和待遇,在德国没有市民与农民、城市与乡间的差别。德国在城乡规划中相当注重公民的参与,尊重和采纳公民根据当地的地理条件提出的一些规划建设,以减少城乡规划建设的阻碍,促进城乡的平衡发展^[17]。

德国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并不是以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实现的,而是采用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提高城乡基础设施享用水平,不断加强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促进城乡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础上,以优势互补实现更高层次协调发展的。

三、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所进行的实践探索及其取得的经验对我国有如下重要启示。

1. 提高农业、农村、农民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

从国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来看,农业和农村除具有解决人们温饱的功能外,还能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改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现阶段必须纠正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倾向,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高农业、农村、农民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地位。

首先,应宣传农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农村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应加快国家政策体制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将强调经济增长、偏向城市发展的传统政策取向转变为支持城乡深入互动、协调发展的政策取向,以适应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的需要。最后,应提高和保障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农村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树立市场意识和经营理念,以缩小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农业向二三产业的延伸,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产业效益低下和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

2. 统筹城乡整体规划

统筹城乡整体规划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我国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在保留农村自身特色的同时,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应积极引导农村地区主动融入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使农村的发展不只表现在村民居舍楼层的简单改变等外观上,而是结合农村的自身发展特点,在保留农村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增添一些适应农村生

态环境的人性化设施,给农村居民带来更为实惠、便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农村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

3. 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美国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的大都市区地带,不仅很好地缓解了城市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辐射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一措施对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在完善相应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政府可给予郊区居民一定的住房补贴,吸引城市居民到交通便利的郊区居住,以缓解这些大城市的就业和住房压力。这些迁移到郊区居住的居民在享受郊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还会吸引一些二三产业向乡村转移,可为一定范围内的郊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为之带来一些新的文化观念,使郊区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不断发展。

这种由城市辐射带动周边郊区的发展模式,不仅可以使由城市向郊区迁移的居民享受到贴近田园的舒适生活环境,还可以让一定范围内的郊区居民享受到由城市居民带来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同时二者在文化观念上也可以互补,可实现城乡之间的双赢发展。

4.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城乡双向互动的过程。针对我国以前重视城市规划忽视农村规划而带来的城乡分别规划不合理问题,未来应将城市与农村统筹规划,借鉴德国的城乡均衡发展经验,实现我国城乡均衡发展。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应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内在平等,不断缩小城乡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加强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积极推进二者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双向互动,在广泛采取市民和农村居民建议的基础上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合理的空

间规划,从而保障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发展。

四、结语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对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结合自身历史、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等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探索、形成的各种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考察可知,城乡融合发展将是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要求与趋势。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和农村在社会政策、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一些差异可能会逐渐消失,但一些生活习惯、信仰和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差异仍会存在。因此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二者之间优势互补的平衡、协调发展,而非简单地追求二者之间各种差异的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在借鉴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以推动我国城乡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长生,宋玉祥.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测度[J].探索,2012(2):140.
- [2] 李传兵,俞思念,陈浩然.马克思城乡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中国化实践[J].社会主义研究,2012(4):18.
- [3] 任吉东.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问题探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1):31.
- [4] 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
- [5]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

- [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2.
- [6]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J].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1954(5):139.
- [7] KARIN S,ALEXANDRE R G. Urbanization solutions of a thirdworld country's metropolis to its social environment challeng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4(8):36.
- [8]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于同申,苏蓉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9] TEMPLE,JONATHAN. Growth and wage inequality in a dual economy[J].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2005(2):145.
- [10] LIPTON M.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M]. London: Temple Smith,1977.
- [11] MCGEE T G.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expanding a hypothes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
- [12]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考察团.英国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建设考察报告[J].财政研究,2008(1):70.
- [13] 焦必方,孙彬彬.日本现代农村建设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8.
- [14] 刘艳艳.美国城市郊区化及对策对中国城市节约增长的启示[J].地理科学,2011(7):125.
- [15] 汪冬梅.日本、美国城市化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3(9):69.
- [16] 叶剑平,毕宇珠.德国城乡协调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以巴伐利亚州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0(5):78.
- [17] 秦高炜,孙东琪等.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研究进展[J].现代城市研究,2017(8):70.



引用格式:张绍乐.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障碍、任务与对策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69-74.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69-06

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任务、障碍与对策研究

Research on tasks,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exploring for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

张绍乐^{1,2}

ZHANG Shaole

1.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2;
2. 航空经济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大举措,是促进沿海与内陆联动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选择,是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新空间、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主要任务是:加大改革力度,提升开放层次;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注重联动发展,增强辐射作用;完善法律体系,确保有法可依。目前,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面临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制度创新有待加强、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带动作用不够明显等障碍。要加快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就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选择合适建设模式;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引领产业高端发展;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创新能力。

关键词:

自由贸易港;
营商环境;
服务贸易

[收稿日期]2018-09-28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费项目(18E4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CJJ081);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045);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8B040)

[作者简介]张绍乐(1987—),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航空经济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1]。这标志着中国的自由经济区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对于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自贸区建设正稳步推进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近年来,随着中国保税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自由贸易港相关问题的研究。政府部门主要从政策层面对自由贸易港建设加以引导。学术界对自由贸易港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自由贸易港概念、类型和基本功能的研究。李振福^[2]认为,自由贸易港是设立在一个国家关税国境之外的免征所有或大多数货物关税的港口,并将其划分为转口贸易型、工商型、旅游购物型和综合型四种类型;刘英奎^[3]认为,自由贸易港是在一个国家境内关外设立的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且商品、资金、人员自由流动的特殊区域,是目前世界上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区域,并将中国自由贸易港的基本功能界定为进行制度创新、深化对外开放、促进要素集聚、推进“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四个方面。二是关于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积极作用的研究。黄志勇等^[4]认为,自由贸易港建设能够提升中国港口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沿海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张释文等^[5]认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对于加强中国沿海港口建设、促进自贸区升级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推动中国参与国际规程制定等,具有重要作用。三是关于自由贸易港建设面临问题的研究。黄志勇等^[4]提出,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面

临政府管理制度和理念不适应市场化需要、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管理要求、多重政府目标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等制度方面的困境,以及现有保税区基础设施及其配套服务不达标,监管方式和监管水平与国际惯例有差距,缺少总体规划等技术方面的困境;李猛^[6]则认为,自由贸易港政策创新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法律体制障碍、离岸市场经济发展较慢、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滞后、市场风险较大等。四是关于推进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的研究。任建雄^[7]提出,浙江建设自由贸易港应在做好立法工作、创新管理体制、促进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转型等方面做出努力;罗雨泽^[8]认为,中国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发展模式、完善管理体制等。

综上所述,虽然学术界针对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对于自由贸易港的概念界定、面临问题、对策建议等方面的研究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性、深层次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在系统梳理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与面临障碍的基础上,提出加快推进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意义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对于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大举措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货物贸易国、吸引投资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和对外投资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中国主动参与经济

全球化进程、积极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现象,因此,中国的态度对于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至关重要。中共十九大准确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明确提出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对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强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 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促进沿海与内陆联动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选择

从空间范围来看,中国对外开放从沿海地区起步,进而由东向西从沿海地区、沿江地区向内陆地区、沿边地区依次推进。经过40年的发展,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巨大成就,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禀赋、营商环境和体制机制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中西部地区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洼地,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能够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提供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从而进一步加强开放合作,促进沿海地区开放与内陆地区开放有机结合,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开放新格局。

3. 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新空间、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的内在要求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与合作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约束日益趋紧、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弱化等因素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出来,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传统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

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可为相关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搭建服务平台,以帮助相关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形成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从而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网络,积极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新空间,不断培育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新优势。

二、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主要任务

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加大改革力度,提升开放层次

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主要任务之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最大动力就在于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对外开放层次。2013年以来,我国在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探索出了诸多成功经验,如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构建了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在促进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当前,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我们应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努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破除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主动适应国际规则新变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开放水平和开放层次,促进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提升开放层次的有效途径和重大举措,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

2. 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创新体制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容。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升温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的外资流动性有所降低,各国吸引外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在土地、劳动力等

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和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以及国内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使得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对外商的吸引力逐渐降低。因此,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创新市场准入、外商投资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监管方式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提高吸引外资的软实力,培育竞争新优势,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3. 注重联动发展,增强辐射作用

注重自由贸易港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增强自由贸易港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要任务。我国各地区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要注重联动发展,增强辐射作用。一要注重自由贸易港与其他的国家战略规划联动发展。例如,对于河南省来说,在推进自贸区建设和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进程中,要处理好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国家战略规划 and 战略平台的关系,对接各项战略规划的政策措施,以发挥战略叠加效应。二要注重自由贸易港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例如,对于福建省来说,应加强自由贸易港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州新区等区域的联动,充分发挥它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厦漳泉一体化发展。

4. 完善法律体系,确保有法可依

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完善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相关的法律体系需要我们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应该系统梳理国外典型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法律体系,总结其先进经验和做法,提炼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并结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以供决策部门参考。二是国家相关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参考专家

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过程中在法律法规方面遇到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制定科学合理的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政府部门的监管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确保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进行有效监管。

三、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面临的障碍

中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任务明确,但还面临着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制度创新有待加强、管理机制仍需健全、带动作用不够明显等障碍。

1. 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当前,中国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阻碍了其向自由贸易港的转型升级。国外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大多是先构建自由贸易港的法律体系,制定相关法律条文,确保依法建立自由贸易港,并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条文,从而保证自由贸易港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确保有法可依。但是,目前中国尚缺少国家层面的自由贸易港相关法律,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使得政府部门的监管缺少法律依据,无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有效监管。

2. 制度创新有待加强

制度创新是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发展和向自由贸易港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从中国现有自贸区的发展实践来看,大部分自贸区都在政府职能转变、金融管理与服务、投资便利化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对比国际先进经验,我们发现,国内现有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企业注册流程、互联网办理等一般操作层面的程序性创新较多,而事中事后监管、自由贸易账户等政策体制层面的实质性创新较少;单一

部门内部的办事流程得到简化,跨部门的深层次制度创新举措力度不够;部分优惠政策仅得到某一国家部委的支持,而缺少其他国家部委的配套政策支持。

3. 管理机制仍需健全

健全的管理机制是确保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正常运营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的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营平稳,但在管理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多头监管现象依然存在。现有的政府监管模式导致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造成监管效率低、资源浪费严重。二是审批程序多,工作协调难度大。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方案需上报国家相关部委,但由于不同改革事项涉及的部委较多,因此审批程序较多,审批环节复杂,工作协调难度较大。三是联席会议的作用有限。虽然国务院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但由于其并非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管理部门,其作用的发挥较为有限。

4. 带动作用不够明显

充分发挥自贸区对于周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其建设的重要目的。当前,中国的各个自贸区在促进周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贸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还不够明显。一方面,自贸区对周边区域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各个自贸区对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仅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反而对部分区域的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虹吸效应,影响其产业承接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自贸区与周边区域的合作深度不够。多数自贸区与周边区域的合作尚停留在一般产品供应、原材料供应等较浅层次的合作,而在技术研发合作、全产业链合作等深层次的合作还有待加强。

四、加快推进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议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选择合适建设模式

纵观目前全球范围内100多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模式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由贸易港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一是转口贸易型。这类自由贸易港的主要特征是商品生产国与商品消费国之间的贸易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第三国的自由贸易港进行交易的。二是工商贸易型。这种类型的自由贸易港在空间上突破了港口码头的范围限制,延伸到港口腹地,功能上也由单一的转口贸易扩大到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并举,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为周边区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三是旅游和购物型。这种类型的自由贸易港大多自然风光优美,适合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四是综合服务型。这种类型的自由贸易港地理位置优越,功能由最初的转口贸易逐渐扩展到金融服务、旅游等,对港口所在城市和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应依托海港、航空港或铁路港发展综合服务型自由贸易港,同时各个自由贸易港应根据各自所在城市的产业基础选择若干适合自身条件的产业。

2.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优化国家贸易结构、顺应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重要途径。我们应不断完善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其一,应着力构建服务贸易发展载体。各个自贸区和拟建的自由贸易港所在城市应定期组织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博览会、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展会,为服务贸易型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搭建平台。其二,应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应推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其三,应积极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应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为契机,打

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出口基地;推进服务贸易与大数据、云计算等融合发展,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其四,应持续扩大服务贸易开放领域。应推进国内金融、文化、设计等行业的优秀企业加快对外开放,开展跨国经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营造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增强中国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应注重引进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等。

3. 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引领产业高端发展

各地应在认真梳理自身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吸引全球创新资源聚集,引领产业向高端发展。首先,应持续优化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应进一步简化市场准入许可,逐步清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推进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改革进程,促进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创新“容缺后补”登记制度,简化企业登记注册程序,加快推进涉企服务的数字化进程。其次,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应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夯实支撑产业发展的科技基础;完善激励机制,加大对科研创新团队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奖励力度。再次,应进一步扩大产业开放领域,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严格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在农业、文化等领域取消或放宽外资准入限制;鼓励拟建自由贸易港的港内优秀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国际知名企业在技术研发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以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

4.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创新能力

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有助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和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应不断完善相关制度,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构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一要不断推进金融制度创新。

应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社会资本方在各地拟建的自由贸易港内成立分支机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活动;针对各地拟建的自由贸易港的港内环保、物流、文化等领域企业的实际需求,开发不同形式的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模式。二要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功能。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借助计算机技术,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优化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界面,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三要构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应严格落实金融监管法则,完善金融监管细则,为金融监管部门开展金融监管业务活动提供依据;建立健全金融数据收集系统,科学分析收集到的金融行业相关数据,甄别出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金融、工商等部门应联合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跨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切实提高金融风险监管能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2] 李振福. 我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J]. 中国船检, 2017(12):16.
- [3] 刘英奎. 以自由贸易港建设引领创新发展[J]. 区域经济评论, 2018(2):8.
- [4] 黄志勇, 李京文. 实施自由贸易港战略研究[J]. 宏观经济管理, 2012(5):31.
- [5] 张释文, 程健. 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思考[J]. 中国流通经济, 2018(2):91.
- [6] 李猛. 新时代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政策创新及对策建议[J]. 上海经济研究, 2018(5):60.
- [7] 任建雄. 浙江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战略路径与对策[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3(2):9.
- [8] 罗雨泽. 借鉴国际经验 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J]. 理论导报, 2018(4):41.



引用格式:张奕阳, 闻萌莎. 新常态下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的着力点[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1): 75-81.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1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1-0075-07

新常态下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的着力点

Focal points of selective developments of He'nan's economy and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张奕阳¹, 闻萌莎²

ZHANG Yiyang, WEN Mengsha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思政部, 河南 新郑 451191;
2. 华东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新常态下,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的现实困境表现在,传统资源优势减弱,生产要素优势递减,对外贸易面临挑战,生态环境优势恶化。困境成因在于,行政职能转变的体制摩擦,发展动能变换的内驱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的精微欠缺,创新驱动发展仍是短板。新常态下加快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其着力点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局域引领,不断促进制度创新,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关键词:
新常态;
河南省;
经济社会发展;
选择性发展

[收稿日期] 2018-12-17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一般项目(172400410442)

[作者简介] 张奕阳(1965—),男,山东省聊城市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后,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河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表现出了新常态的特征。2015年1月召开的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都指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新常态下,河南经济社会的选择性发展面临许多现实困境,弄清遇到困境的成因,明确选择性发展的着力点,对促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的现实困境

选择性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选择性特点,都必须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在新常态下,经过长期的选择性发展过程,河南省依据自身特点所形成的优势在现实中面临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资源优势减弱

新中国成立后,地处中原的河南省承袭传统,结合自身优势,经过几十年的选择性发展,在传统的纺织、建材、耐火材料、煤炭、化工、氧化铝等能源和原辅材料产业上取得了明显优势。随着国家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和实施“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河南省紧抓机遇,大力发展交通物流业,逐步提升自身优势。但是,新常态背景下,鉴于经济形态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石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等因素的出现,传统的资源优势在减弱。在环境压力增大、石油和天然气替代传统燃煤的形势下,河南省的传统煤炭和煤化工、重化工等行业面临着严峻的经营压力,优势地位在减弱;其他领域,如电解铝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其传统资源优势也在逐渐失去优势。

2. 生产要素优势递减

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资源大省,长

期以来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具有低成本的优势。得益于选择和发挥这些低成本生产要素优势,河南这个内陆省份的经济总量在全国长期保持着较高水平。虽然和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等发达地区比较起来,低成本生产要素还存在比较优势,并且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但是,随着大量劳动力出省打工、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土地和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成本在增加,低成本生产要素优势在递减。

3. 对外贸易面临挑战

河南省地处我国中部核心地区,具有独特的交通和区位优势,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大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获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河南自贸试验区的获批,使得河南省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本省经济。但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潭,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反经济全球化、鼓吹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逆流。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更增加了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不景气和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外部需求不旺,出口拉动效益减弱,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河南省发展对外贸易带来了消极影响和严峻挑战。

4. 生态环境优势恶化

河南省在以往的选择性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长期粗放式发展、环保意识淡薄,再加上汽车保有量的大量增加,城市建设和改造规模扩大,以及农药和化肥的不科学使用等,使河南省的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的程度不容小觑。虽然政府治理环境的措施、力度和投入逐年加大,但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改变。以省会郑州市的空气污染为例,在全国被环保部监测的70多

个大中城市中,郑州市的空气质量排名长期稳居后十位之列。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郑州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下了很大力气治理空气污染,但是一旦出现静稳天气,雾霾就笼罩郑州。

二、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的困境之成因

选择性发展的实质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有目的的自觉选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失去了主体选择性或主体选择性出现失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自然的潜在,不可能被发现,因而发挥不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新常态下,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就其成因来说是多方面的。从主体选择性方面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行政职能转变中的体制摩擦

纵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自然万物的生长进化,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都是有目的地适应外界、物竞天择、顺应历史的选择过程。对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政府选择发挥什么样的职能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中共十八大后,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一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措施,加大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力度。河南省也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全省各级政府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和部署。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就全省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逐步理顺,法治政府正在建立。但是,要完成法治政府的建设并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加快步伐。由于行政职能转变存在着体制摩擦,长期形成的一些定势和惯性要彻底打破需要时间,简政放权条件下,要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需要探索,因此政府

职能的转变还没有真正完成。

2. 发展动能变换的内驱乏力

在谈到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选择性的关系时,马克思形象地把人看作“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1]。这里所谓的“剧中人物”就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随心所欲的,是要受到“剧情”也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约束和支配的;所谓的“剧作者”就是指人们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选择自己的活动,撰写属于“自己的剧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与全国一样,河南省不顾“剧情”即社会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把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认为所有制形式越公、公有制规模越大,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河南省经济发展动力的选择性失误,曾导致本省长期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均等,只能压抑个人对自身正当利益的追求和消费,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内生动力。在反思改革开放前的教训时,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146}改革开放后,提倡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富裕起来,消费这个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就河南省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工资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全省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乡二元制结构的逐步消失等,都推动了消费需求。另外,河南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具有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战略地位,在全国所处的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越发明显,对拉动省内需求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动力主要依靠投资扩张和对外的物流贸易带动,再加上河南的人均收入水平偏

低,本地内需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并没有完成,内驱发展动能仍显乏力。

3. 精细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欠缺

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它形成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有自己的特点,即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选择活动才能体现出来。“脱离了人的活动而谈论‘历史规律’,只能是历史的神秘论。”^[3] 改革开放后,我国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实施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央制定政策时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坚决反对“一刀切”。河南省在中央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身实际和特点的政策和发展方式,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选择性发展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在此种形势下,河南省的高新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一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血液制品、生物制药、抗生素原料药、新型电池和超硬材料等方面具备了一定优势。宇通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富士康落户郑州,使河南省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等方面抢占了先机。但是,长期以来,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是粗放型的,投入高,消耗大,效益低,污染重。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虽然正在改观,但还没有彻底终结,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还需提高其精细化程度。

4. 创新驱动发展仍是短板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是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选择性的统一。新常态下,选择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之后,针对我国新常态发展趋势,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河南顺应这一时代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有力地支撑了河南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4]。但是,与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的一些发达省份相比,河南省的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还有相当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引进不足,创新主体的作用发挥不够,创新激励的氛围和机制还没有形成。目前创新驱动发展仍是河南省的短板。

三、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的着力点

新常态背景下,河南经济社会要获得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找到并完善选择性发展这一有效路径,将其作为着力点。结合新常态下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和成因,按照省委省政府已明确的战略思路,建议选择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推动河南经济社会选择性发展的着力点。

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应适应经济发展速度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尽快转变职能,纠正急于出手、乱出手的毛病,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摒弃GDP崇拜。因此,河南省各级政府必须切实有效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硬骨头”来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就河南省来说,转变政府职能的要点是:继续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强力推动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依法依

规行政;切实转变工作作风,通过改进政风促进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大力推进和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健全科学精干高效廉洁的行政体制机制;科学地完善各级政府的职责体系,合理地划分不同层级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履职重点和权责范围;既要简政放权,又要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为各类经济体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稳固平台,使各类经济体在这个平台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有进一步把该放的权放掉、把不该管的事交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务到位,才能有效推进政府的治理创新,更好地遂民意、促发展、利和谐”^[5],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5]。

2. 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

新常态下,河南省应加快符合河南实际的城镇化建设,以此带动美丽乡村建设,从大的范围调整、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实行了40年,这种经营体制所带来的发展动力远不如从前了。现在常年在乡村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在农村耕种的青壮年劳动力相对不足。虽然最近几年河南省农业连获丰收,但是这种丰收却难以掩盖河南省农业整体存在的投入高、效益低、质量差的问题。河南农村的出路应选择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上。河南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通过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立功能齐全而不是楼房堆积的小城镇,逐步把农民吸引和转移到城镇中来。这种新型城镇化建设好处多多:有利于加快实现河南省的城乡一体化;有利于河南农村的集约化生产和经营;有利于河南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科技化;有利于消除河南省农村存在的落后观念;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更多解放农村劳动力,增强正在递减的生产要素优势;有利于改善河南省农村居民的居住、教育、医疗、卫生、环境

和健康条件,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总之,只有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切实改变农村面貌^[6]。

3.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新常态背景下,对河南这个地处内陆、对外开放水平还比较低的省份来说,选择积极融入、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是应对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实现对外开放突破和升级的一次重大战略机遇。河南省应从整体上强力推进航空港、国际陆港、郑欧班列、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综合性大口岸等要素平台体系建设^[7],使河南省利用区位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上的重要节点省份。具体说来,应结合河南实际,扬长避短,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东引”与“西进”的关系。河南省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资源和交通优势,抓住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大力实施“东引”战略,同时应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二是提升节点城市辐射能力与构建开放共享平台的关系。河南省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更大作为,除应从根本上着力提升郑州、洛阳、开封等主要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外,还应强化与省内外尤其是中原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的合作和互联互通能力,共同构建开放共享的平台。三是宏观设计与微观实施的关系。河南省虽对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但还应抓紧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搞好微观实施。总之,河南应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平台和重点项目为抓手,以郑欧班列、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股权收购等为示范,强化政府引导和服务,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能动性,调动大学和科研院所在人文、科技交流中的积极性,抓紧落

实,扎实推进,从而早见成效^[8]。

4. 充分发挥局域引领作用

一个地方的发展要有区域价值引领,如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区,新设的雄安新区,各地的开发区和高新区等。新常态下,河南省应重点选择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试验区的引领作用,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中原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园区的价值引领作用。当前河南的产业结构还是以农业、重工业为主,这两大类型的产业对临空型产业发展是不吻合的,河南现有产业层次与航空港区高端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航空港区、国家级新区和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河南省在产业结构、产业发展层次上有非常大的提升,有效缓解传统资源优势的减弱。就发挥郑州航空港经济试验区和河南省自贸区发展的价值引领作用来说,必须做到:其一,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更加重视提质增效,注重发展质量,要坚持航空港区高端发展方向,严格投资准入门槛。其二,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把郑州航空港经济试验区打造成空中和陆路丝绸之路内陆核心区。其三,培育拓展新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建设高标准中原航空城。应通过大力拓展新的高端产业带动就业,通过就业带动人口落户和聚集,通过人口落户和聚集带动航空城的形成和发展。其四,应积极利用自贸区优势,探索内陆地区开放新模式,拓宽开放广度,提升开放高度,拓展开放深度。

5. 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新常态背景下,河南省经济社会要获得持续健康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有没有创新,创新能力和成果是大是小,制度创新是核心。在一定意义上,所有创新活动都有赖于制度创新的积淀和持续激励,通过制度创新得以固化,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9]。应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其他方

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不断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只有创新才有活力,有活力才能吸引外部人才、更多“创客”、外来移民、外来企业落户河南,给河南的发展带来智慧、资金和动力。应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涌现,最终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创新需要胆量、气魄,也需要智慧。河南省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应聚焦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制度方面的革新。应当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环境^[10]。同时,应在商贸、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养老、保险、人才引进等制度方面进行创新。

6.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存环境的优劣,事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指数和获得感,事关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用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治污,回应近一亿河南人对生存环境的关切,是新常态下河南省必须面对的重点任务。其一,应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曾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333}。由于环境污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也是过度追求GDP和表面政绩的衍生物和负产品,政府在治污方面总是瞻前顾后。因此,制度建设显得尤其重要。加强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制定字面上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严格执行。其二,减少污染存量。环境污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要根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减少污染存量。就治理空气污染来说,一是要坚决淘汰落后的、污染严重的企业;二是要尽快淘汰那些穿行在大街小巷、城乡之间的黄标车,更要淘汰那些尾部喷洒着大量黑烟的农用车;三是要淘汰和拆

除那些分布在城市、乡村甚至山沟里的或高或矮的吞噬着蓝天的燃煤烟囱。就治理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来说,就是对现有污染源,综合采取清洁生产改造、污染深度治理、限产限排、停业关闭等措施,确保达标排放^[11]。其三,防止污染增量。治理污染除减少污染存量外,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污染增量。就治理空气污染来说,首先,应严格提高新增产业节能环保准入门槛,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确保排放达标。其次,应控制城市汽车和农用柴油车的新增数量,大力提倡、资助、鼓励购买新能源汽车和农用车。再次,应坚决制止建筑工地的扬尘污染,合理控制拆迁和建设规模。最后,应制止秸秆、树叶、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乱烧乱焚,采取措施,进行合理化利用和处理。就治理水体和土壤污染来说,一要实现城乡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和稳定运行;二要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支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开展标准化改造和建设,深入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等。此外,应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建设美丽河南,大力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严厉打击破坏环境的违法违规行,坚决查处环境监管领域的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腐败和寻租行为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5.
- [4] 秦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以河南省为例[J].学习论坛,2017(4):38.
- [5] 李克强.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5-12(02).
- [6]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EB/OL].(2009-09-23)[2018-11-24].www.gov.cn/idhd/2009-09/23/content_1424451.htm.
- [7] 河南多地市领导:融入“一带一路” 河南在路上[N].大河报,2015-01-31(02).
- [8] 河南:全面融入、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N].河南日报,2015-01-21(06).
- [9] 何德旭.注重制度创新 努力提高制度执行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8-09(05).
- [10] 建设创新型国家只争朝夕[N].光明日报,2007-03-14(01).
- [11] 陈吉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N].经济日报,2015-11-30(03).



引用格式:宗迅,王瑶瑶,高慧丽. 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82-89.

中图分类号:TU98;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82-08

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

Study on cultural heritag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Zhengzhou area

宗迅¹, 王瑶瑶^{1,2}, 高慧丽^{1,3}

ZONG Xun, WANG Yaoyao, GAO Huili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2. 郑州财经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3. 郑州宜家家居有限公司 设计部,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郑州地区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相邻县市与西部、南部偏远地区,以清代、民国时期的建筑为主。按照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方式划分,郑州地区的民居建筑大致有结构严谨的合院与楼院、窑洞、窑房结合的民居三种类型。郑州地区现存的民居建筑遗产在建筑式样、分布特点,以及与环境结合等方面鲜明地反映着其独特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特征,是黄土高原向东南平原过渡地区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实物资料,是郑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下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实并不乐观。因此,要做好郑州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一应让社会各层面真正认识到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和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二应深化科学研究,发掘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加强各区域间、对象间的比较研究,探索各自独特的保护发展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三应探索新的城镇体系与居民生活方式,制定适宜的保护策略;四应遵循客观规律,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成功经验;五应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民居的保护工作,探索多方力量参与保护的机制。

关键词:

郑州地区民居建筑;
文化遗产;
合院;
窑洞

[收稿日期]2018-10-1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3-ZD-098);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3BSJJ070);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SKJ-2018-966);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9-ZZJH-603、2019-ZZJH-606)

[作者简介]宗迅(1977—),男,河南省洛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建筑与城市科学、环境设计与建筑环境心理。

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中比重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部分^[1],而民居建筑又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

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经历了从单个建筑保护到群体建筑保护的过程。自1961年始,国家陆续将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建筑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家出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2002年又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明确要求保护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从而赋予了历史文化村镇特定的文化地位。2003年国家又设立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制度,对“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保护文物特别丰富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地方各级政府也陆续将一大批历史文化村镇和民居建筑遗产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这些举措为有效保护民居建筑遗产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省在此方面入选数量并不多。2012年9月,经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属于行政性的概念,包含的范围更加宽泛,强调农耕文化聚落载体的完整存续状态,强调在物质保护的同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立足于保护传统农耕文明的根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由具有重大价值的单体建筑(建筑群)发展到反映传统风貌、地方民族特色的片区,再到注重物质文化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及注重农耕文明存续状态的传统村落,国家已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将其纳入了较完整的保护体系之中。在2012—2016年公布的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全国有4153个村落入选,其中河南省有124

个村落入选。河南省的传统村落、民居也得以受到更多的关注。

民居建筑研究作为乡土建筑研究中的一个子系统,起始最早,成果最为丰硕。然而,业界对河南省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相对欠缺。在被称为“中原民居的补遗之作”的《河南民居》问世之前^[2],河南省民居的整体状况甚至还不甚明了。以郑州市为例,其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河南省会城市,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诸多头衔,但目前郑州市内及周边除遗存丰厚的遗址、遗迹外,能反映地域风貌的民居建筑越来越少。业界近些年也对其给予了广泛关注,但除局部案例研究偏热外,仍有大量列入传统村落与保护名录的民居建筑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鉴于此,本文拟对郑州地区(辖6区、5县级市、1县)现存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与类型,提出保护发展策略,以期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一、郑州地区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情况

目前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中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共计62处。本研究对同时入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案例做重复计数,共计73处(次),具体见表1。

1. 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情况

截至2013年5月,我国共公布了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地区共有3处入选,全部位于巩义市。其中,康百万庄园于2001年入选,张祜庄园和刘镇华庄园于2013年入选。河南省于1963年公布了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截至2016年1月共公布了7批,郑州地区共有11处入选,其中7处分布在巩义市,3处分布在荥阳市,1处分布在上街区。郑州市

分别于1987年3月、2009年6月公布了两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2处,其中巩义市6处,新密市4处,荥阳市、新郑市各3处,惠济区、中原区各2处,登封市、上街区各1处。

2. 入选各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情况

截至2014年2月,我国共公布了6批、共528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郑州地区惠济区古荥镇入选第4批名录。截至2014年4月,河南省共公布了6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郑州地区共有6处入选,其中登封市2处,巩义市、荥阳市、惠济区、上街区各1处。

3. 入选各级传统村落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共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郑州地区共入选4处,其中登封市2处,新密市1处,荥阳市1处。2013年6月,河南省公布了首批省级传统村落,截至2018年1月共公布了5批,郑州地区有26处入选,其中登封市15处,巩义市和新密市各4处,荥阳市3处。

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见图1。由图1

可知,在73处(次)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中,郑州市区范围有6处入选(中原区2处、惠济区4处),占总数的8.2%;与市区南部相邻的新郑市(3处)、西南相邻的新密市(9处)、西部相邻的荥阳市(11处)共23处,占总数的31.5%,60.3%的入选者分布在市区以西及西南的上街区(3处)、巩义市(21处)和登封市(20处)。

二、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分析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2011年)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在其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包含了已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文化村镇中的不可移动文物。因此,第三次文物普查是目前内容最全面的不可移动文物数据资料。本研究以其为基础资料,结合实地调查与相关研究成果,对郑州市民居建筑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郑州市被登录的六类不可移动文物总计8651处^[3],在涉及民居建筑的古建筑、近

表1 郑州地区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情况

位置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河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中国传统村落	河南省传统村落	合计
巩义市	3	7	6	—	1	—	4	21
登封市	—	—	1	—	2	2	15	20
荥阳市	—	3	3	—	1	1	3	11
新密市	—	—	4	—	—	1	4	9
惠济区	—	—	2	1	1	—	—	4
新郑市	—	—	3	—	—	—	—	3
上街区	—	1	1	—	1	—	—	3
中原区	—	—	2	—	—	—	—	2
二七区	—	—	—	—	—	—	—	0
管城区	—	—	—	—	—	—	—	0
金水区	—	—	—	—	—	—	—	0
中牟县	—	—	—	—	—	—	—	0
合计	3	11	22	1	6	4	26	73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文物局官网(<http://www.sach.gov.cn/col/c11644/index.html>),河南省文物局官网(http://www.haww.gov.cn/wwzy/node_2797.htm),郑州市文物局官网(http://wwj.zhengzhou.gov.cn/city/index_21.jhtml),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henan.gov.cn/zwgk/fgwj/szfwj/>),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http://www.meburd.gov.cn/xcfg/jsbwj_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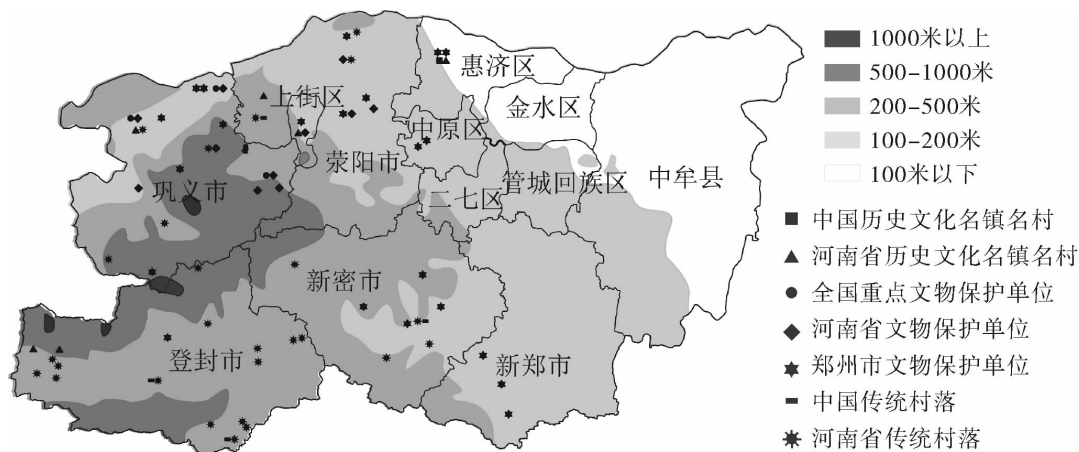


图1 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

现代重要史迹与代表性建筑三类中,以民居、宅院、民宅、古宅、旧宅、老宅、住宅、大宅、临街房、家寝、大院、老屋、庄园、山庄、府、旧居、故居、窑洞等命名的民居建筑共有 3071 处列入名录。

1. 空间分布

在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名录的民居建筑中,郑州市上街区(902处)以占到入选总数(3071处)29.4%的比例,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登封市(536处)、新郑市(379处)、巩义市(342处)、荥阳市(234处)、中牟县(187处)、新密市(181处),市区范围的二七区(113处)、管城回族区(90处)、中原区(83处)、惠济区(23处)、金水区(1处)总计310处。显而易见,郑州市区范围内的民居建筑仅占总数的10.1%;与市区东部相邻的中牟县、南部相邻的新郑市、西南相邻的新密市、西部相邻的荥阳市等共981处,占总数的31.9%;半数以上的民居建筑分布在郑州市区以西及西南与市区不相邻且相对偏远的上街区、巩义市与登封市,与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分布情况相似。

2. 时间分布与建筑风格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绝大多数的民居建筑是在民国(1912—1949年,占比55%)与清代(1644—1911年,占比43%)建造的。中国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建筑引入中国,近代建筑开始产生,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期间中国的建筑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融合时期。民居建筑中官僚、豪绅等在宅邸建造中采用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河南省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大庄园中的刘镇华庄园、张祜庄园是这一时期民居建筑的代表。刘镇华庄园多处房屋采用了西方建筑风格;张祜庄园则以本地传统建筑风格为主,个别院落因引入外来设计师的设计而融入了我国南方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元素^[4],反映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康百万庄园则采用了纯粹的河南传统建筑风格。

3. 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

按照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方式,郑州地区的民居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结构严谨的合院与楼院

合院民居是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院落空间布局形式,是在地势较平坦地带,按传统的中轴对称、封闭严谨的空间序列布局,由相互分离的抬梁式构架房屋组成的院落(见图2),常见的有两座建筑围合的二合院、三座建筑围合的三合院,以及由临街房(倒座)、左右厢房、正房构成一个围合单元的四合院。也可在此基础上沿

中轴线向后延伸,在正房的后面增加左右厢房、正房,构成一个新的围合单元。以此类推,最终可形成由复数围合单元构成的两重(进)或多重院落。院落外围墙壁高大,不开窗户,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和防御性。比如,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登封市大金店老街,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登封市垌头村、朝阳沟村、刘村等村落中遗存的合院民居等,都是按照中国北方传统合院的空间序列布局的。而入选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荥阳市油坊村秦氏旧宅、巩义市刘家大院,以及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新密市吕楼村民居等,则是将位于院落中心位置的正房建为两层甚至三到四层的多层楼式单体,以一栋正房或正房间加两侧厢房三栋单体楼围合成楼院(见图3)。楼院通常位于宅院的最后一进院,与前院的客厅形成前厅后楼院的合院布局。这种设计不仅增加了可使用空间,更加突出了私

密性和防御性。

(2)窑洞

郑州市座落在黄土高原和豫东平原相接的地带,市区西部形成一道十分明显的分界线,郑州市西部各地直至西部郊区在嵩山的北侧,北临黄河,南北宽度约五十公里左右,是原生堆积的黄土原,其间围绕河流有众多冲沟,其中分布的窑洞形式包括被学术界称为靠山(靠崖式)窑、天井窑(下沉式)、明箍窑(砌筑式)三种类型。靠山窑是依天然地形适当修整后横向挖窑,并在窑前留有建房的位置,最终建房构成窑房结合的封闭院落(见图4)。巩义、荥阳、上街、新密是郑州窑洞民居的主要分布区,以靠山窑为主。天井窑是在没有可直接利用的山崖时,先向下挖一个方地坑,四周形成直壁,然后再依据需要开凿出的可供居住生活用的窑洞(见图5)。郑州地区的下沉式窑洞主要分布在巩义市西南部,入选第二批河南省传统村落的西村镇东村的下沉式窑洞是目前少有的仍有少数村民居住的村落。明箍窑是在平地上直接用砖石土坯等发券砌筑而成的,是在地势平缓、黄土堆积层浅薄或岩石外漏等不具备开挖窑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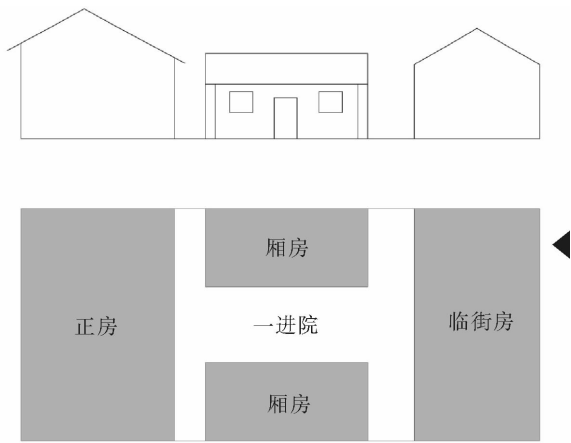


图2 合院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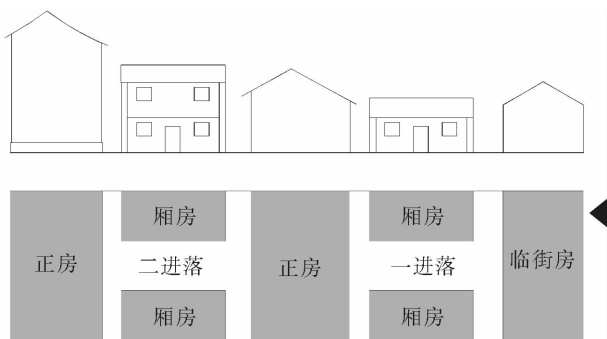


图3 楼院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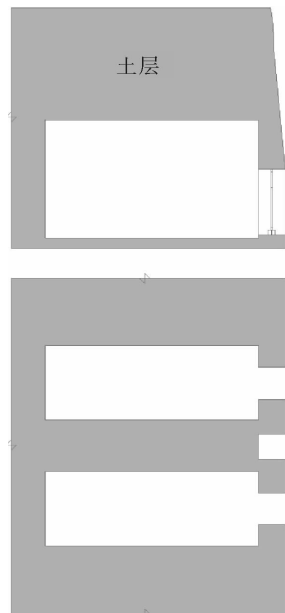


图4 靠山窑

地方常见的窑洞形式(见图6)。登封嵩山南坡及其群峰之中,大部地区岩石突露,仅在南部颍河谷地和嵩山东坡存在薄层黄土堆积,整个登封黄土窑洞分布数量不多。在无黄土堆积层的地区,如登封南部的柏石崖村,则是利用石料等依山或临山造窑,也有窑前建房或围墙形成院落的。

(3) 窑房结合的民居

按照中国传统合院的空间序列布局,以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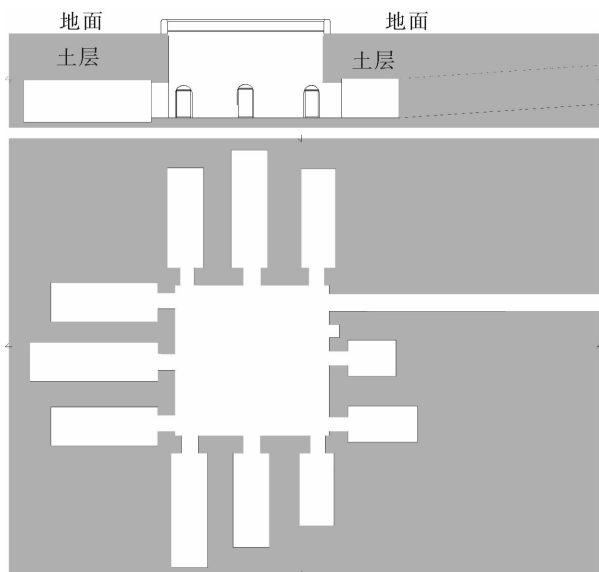


图5 天井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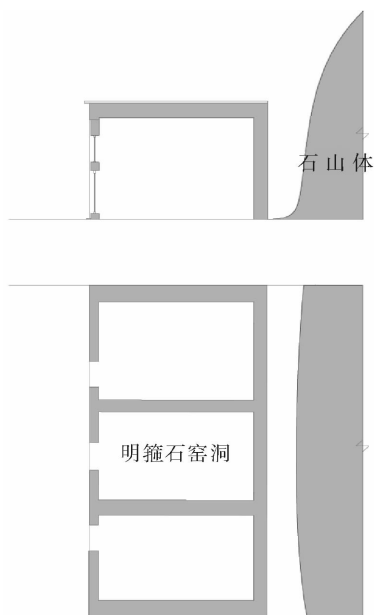


图6 明箍窑

山开挖的靠山窑或在平地上砌筑的明箍窑洞作为上房,结合抬梁式构架厢房与倒座,由此形成窑房结合院落(见图7)。根据经济条件与使用需求,也可建起规模宏大、装饰华丽的多进院落,如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康百万庄园、张祜庄园、刘镇华庄园等就是中原地区保存比较完整、建筑质量较好、防御功能较完善的典型代表。

随着黄土高原的消失,京广铁路以东窑洞民居几乎不存在了。方顶村、东村、柏石崖村等的靠山窑、天井窑院、窑院结合民居,虽没有康百万庄园、张祜庄园、刘镇华庄园等官僚、豪绅宅邸设计精巧,造型华丽,而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民居建筑,体现着农耕文化的传统与生活方式,反映出劳动人民依势而建的质朴智慧。

三、郑州地区民居建筑遗产特征

1. 时代、空间结构特征

郑州拥有36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经历了金元时期的战乱之后,人烟稀少,土地荒废,农业衰退。明朝时期推行移民制度,山西等地的迁民先后到河南落户,与前代相比,战争破坏大为减少,社会较为稳定,人口增长很快。清和民国时期,村落、民居建筑也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现存的传统民居建筑大多是这两个时期的遗存。1840年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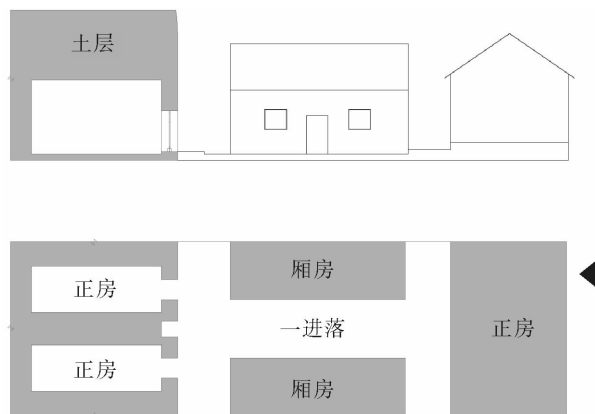


图7 窑房结合的民居

会,少部分民居建筑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多数延续了当地传统建筑样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战火匪患,民居建筑除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出于居住方面的安全,建立坚固的防御系统、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成为必然。因此,以聚族而居为基础的合院、庄园堡寨都体现出封闭、自保的特征。除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大庄园外,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方顶村依山势砌筑寨墙,寨内靠山开窑、平地建房、寨外耕作,形成一个战时可守、平时可耕作的生产生活防御一体化的村落形态。同样入选第五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巩义市新中镇灵官殿村的泰茂庄园是清咸丰初年张氏家族依山而建的,共有六层,房屋、窑洞相结合,空间错落有致紧凑和谐,形成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建筑群。

2. 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郑州座落在黄土高原和豫东平原相接的地方,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差异明显,山地、丘陵、平原各种地貌均有分布。郑州市西部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2/3,山崖沟壑纵横,是中国窑洞民居分布的东南边缘地带,无疑也是下沉式窑洞、窑洞与合院结合的民居地带。郑州市东部平原面积占郑州市总面积的1/3,在这一地区窑洞民居几乎不存在。除此之外,由于历史上天灾水患、战火匪祸带来的影响,郑州东部平原地区遗留下来的民居建筑遗产较少且分散。近年来,随着经济、人口、交通的高速发展,郑州地区已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取得的辉煌成绩有目共睹。然而,目前郑州市区内能完整反映传统历史风貌的历史街区已几乎不复存在,除商城遗址和少量文物尚存,传统民居遗存已是凤毛麟角。

现存分布在郑州市区以外的民居建筑遗产在建筑式样、分布特点以及与环境结合等方面

鲜明地反映着其独特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等特征,是黄土高原向东南平原过渡地区农耕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稀少且不可再生的历史见证和进一步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比如,方顶村出于防范选择山峦沟壑砌筑寨墙聚族而居,保留了较完整的村落系统,体现了居民生产、生活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窑洞民居分布的最东南边缘地带窑洞与合院结合民居中较完整的遗存;而入选第五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巩义市芝田镇官庄村刘家大院(也称“王家大院”),最初是王姓家族由山西迁至巩义后,在“又没有做高官,又没有做生意,做庄稼勤俭出产积攒建造”的四个联排大院与一座高楼,是一个具有防御功能的民居建筑群;登封市大金店老街是在郑州地区遗留的传统村落中仅有的传统商业街区,依自然山水地势布局而建,至今仍保留着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农耕文化,以古寨墙为界,寨外耕作,在寨墙范围内保留着较完整的传统商、住街区,其中有一些仍保留着“商、住、坊”一体化的格局,较好地遗存了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以其宏观的形象反映出与其他村落的差异。

四、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随着河南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郑州市已涌现出一批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以及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公布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然而,实质性的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则只能算刚刚起步,保护开发模式仍处在探索之中,如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巩义三大庄园已开发成旅游景区,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秦氏旧宅、董天知故居与一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获得了政府的出资修缮,入选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的方顶村、入选河南传统村落的吕楼村、海上桥村等正

在由社会资本推进相关项目开发。但是,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并列入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河南省共34个)的郑州市登封市大金店镇大金店老街、徐庄镇柏石崖村等传统民居现仍为普通居民使用着,未见保护到位。

目前,遗留下来的传统民居除存在农村普遍出现的空心化、居民老龄化等复杂的外部问题外,还存在老朽化、居住环境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等居住生活方面的内部问题。对于居民而言,生活环境是第一位的,保护文化遗产是第二位的。在原有的家族制度、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瓦解后,居民为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对传统民居实施了翻建、增建、扩建等改造,致使老建筑遭到破坏、损坏,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状并不乐观。

以往被忽视、未受广泛关注的普通老百姓的民居建筑,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彰显着鲜明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等交融形成的地域特征。传统民居的变化发展难免影响到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的延续与发展方向。因此,应充分认识到:传统民居是构成郑州地域特色文化景观的重要物质要素,是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农耕文明的根基,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应成为乡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方向。应认识到尊重本地区既有的文化价值、传统特色的必要性,传承好包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传统技艺在内的传统文化,保护好河南省农耕文化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应注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在保护居民利益,寻求实现乡土建筑与地域环境和谐相处、地域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合理控制发展、适度开发,使其注入新的活力。

为加强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转变认识,让社会各层面真正认识到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是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二是深化科学研究,进一步开展深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发掘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加强各区域间、对象间的比较研究,明确各自的特色与保护利用的核心,探索各自独特的保护发展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发展问题;三是探索新的城镇体系与居民生活方式,针对城镇环境与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新需求,制定适宜的保护策略,科学改善生活环境,解决传统居住空间与新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四是在保护实践中应遵循客观规律,充分挖掘民居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优势,准确定位,科学控制,适度发展,使传统民居焕发新的活力,有甄别地吸收、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民居保护的成功经验,同时吸取教训,切勿重蹈覆辙;五是应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民居的保护、监管工作,探索多方力量参与的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 [1] 单霁翔. 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研究(上)[J]. 城市规划, 2008(12): 33.
- [2] 张家泰. 中原民居 补遗之作——评《河南民居》[J]. 中州建设, 2009年(1): 80.
- [3] 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Z]. 2012.
- [4] 毛葛. 巩义三庄园[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6.



引用格式:章顺凯,江文森.“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90-95.

中图分类号:J5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90-06

“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folk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 the contex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章顺凯, 江文森

ZHANG Shunkai, JIANG Wenmiao

阜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当前,“非遗”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国“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不仅要做好传授、传播与继承,更应注重与时俱进的突破与创新。其一,对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传授而言,应突破宗族、性别等方面的局限,实现师徒关系的现代转变,树立科学的技艺传授观念;在传承模式上,应以传承人为核心,培养传承团队;应将“非遗”文化融入地方学校课堂,培植、汇聚“非遗”人才;应通过工作坊、社区活动中心等,打造“非遗”技艺活态化体验平台,构建科学的“非遗”技艺传授模式。其二,对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传播而言,应利用互联网、影视、活动等多元传播途径,促进其广泛传播。其三,对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突破与创新而言,应运用新材料、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区域旅游业,以促进“非遗”文化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

“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
传承;
活态化体验平台

[收稿日期]2018-09-2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693);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4SK031);校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6WBZX01)

[作者简介]章顺凯(1982—),男,安徽省安庆市人,阜阳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理论与实践。

继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等部门共同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指出:“传统手工艺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振兴传统工艺,有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1]由此可见,当前,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为“非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作为“非遗”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手工艺正处于一个绝佳的发展时期。

民间传统手工艺特指在民间产生、发展并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技艺,与之相对的是宫廷手工艺(也称为“特种手工艺”)、现代手工艺。民间传统手工艺因其丰富的种类、深厚的民间根基、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广泛的社会认同等,其传承在新时代的国家发展建设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代“非遗”语境下,研究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尤其是研究被列入“非遗”名录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更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非遗”作为国家重点保护、优先发展的对象,入选标准较为严格,而“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往往能够代表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代表行业内的较高手工艺水准,入选较容易。

关于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问题,理论界多倾向于专题性研究或个案研究,且过多地讨论其发展现状和保护方法。本文拟从语境学的视角深入发掘“传承”一词的深层含义,同时结合当代“非遗”语境,从宏观视角深入探讨民间传统手工艺如何从技艺的传授、传播、突破与创新等方面进行当代传承,以供学界参考。

一、“非遗”语境下“传承”一词的深层语义

发掘“传承”一词在“非遗”语境下的深层含义,并不断丰富其内涵,拓展其外延,有益于

在新时代科学地把握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导向与创新思路,也是研究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的关键。

当代“非遗”语境是对研究内容所处时空环境的限定。语境即指使用语言的环境,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语言发生场合及其他相关因素。语境学认为,“与话语中心关涉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对象、话语目的及上下文等语境因素综合决定着语言的语义生成”^[2]。因此,要想探讨“传承”一词的深层含义,就要紧扣当代“非遗”语境。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实施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对“非遗”,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该《意见》为“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未来传承发展提供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把握“传承”的本义,还应领会其深层含义,即当代传承不仅要求做好传授、传播与继承,更应注重与时俱进的突破与创新。应在继承前人或同行的优秀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需要进行大胆创新,使优秀的“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此外,“传承”中的“传”与“承”是相辅相成的,不能顾此失彼,需要协同发展。

二、“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科学传授

由于国家对“非遗”的重视与支持,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手工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被列入“非遗”名录。但同时,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也有许多“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濒危处境,其中,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传授教育和传承人培养,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对“非遗”的

认定中有明确规定,申报各级“非遗”的项目必须有具体的传承人,传承人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所申报项目,还要在行业或所在区域有公认的影响力,有能力且正在承担该项目的传承任务。所以,当下应运用当代教育理念与教育条件,大力培养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和相关从业人员,使历经世代考验的精湛民间手工艺在当代得到科学传授,进而为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做好人才储备。

1. 树立科学的技艺传授观念

手工艺的传授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神秘的话题。纵观古今,我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关于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授的辛酸故事,存在着大量被广为诟病的陋习,如手艺传男不传女、不传外姓人氏等。如今,民间传统手工艺曾经赖以生存的传统土壤被当代的多元化所取代,传统的技艺传授观念越发显得不合时宜,已经严重阻碍了民间传统手工艺的进一步发展,甚至造成其濒临失传的危险。因此,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树立先进的技艺传授观念,是当代“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发展的需要。

(1)突破宗族、性别等方面的局限。各行各业都有特殊的工作内容与工作要求,其技艺传承均存在一些限制条件,民间传统手工艺这类技术性的工作,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非遗”名录的民间传统手工艺都有着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往往是传承人重点保护的内容。为了确保自身手工艺的独一无二,在手工艺的代际传授过程中,都会设定许多条件,如只能在家族内传授、只传男性不传女性等。此外,将同行视为竞争对手的敌视观念,也大大限制了同行间的交流,这不利于相互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宗族观念已日趋淡化,家庭单位成为新的核心。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当代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人们性别歧视方面的传统观念,而且,在当代新技术的发展下,女性与男性在工作上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也越来越

小。此外,当代社会所提供的丰富多样的就业机会,大大降低了民间传统手工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且“非遗”传承人的子女在能力、意志与爱好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差异。这些新变化为“非遗”语境下的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既提出了新的要求,又提供了新的契机。应树立先进的技艺传授观念,顺应新时代社会特点,尊重“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自身独特性,在保证其健康发展的同时,还应打破家族限制,扩大传授范围,消除性别歧视,加强同行间交流,避免过度保护,以促进“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2)实现师徒关系的现代转变。民间传统手工艺在代际传授过程中,父子相传与师徒相授是两种主要的传授方式,并由此形成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的复杂渊源关系。传统观念中,师徒关系的建立是一件严格而正式的事情,拜师仪式因时代不同、行业不同、个体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别。传统的师徒关系在现代教育出现之前或出现之初,对于文化传承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与当代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传统师徒制中的许多旧观念已明显地不合时宜。对于传统的封建观念,应坚决摒弃,其滞留时间越长,负面影响越大。

老一辈的“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大多是在传统师徒制下成才并将手工艺传承至今的,所以传统师徒观念对其影响至深。然而,传统师徒制易使当代新型社会意识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敬而远之。当前,国家大力提倡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确保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资源的输入,现有的“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应转变不科学、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在继承好传统学徒制中的精华部分同时,充分吸收当代教育理念,运用当代教育方法与教育手段,因材施教,使下一代传承人学到精湛手工艺,同时还应注重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2. 构建科学的技艺传授模式

在当代多元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之下,许多“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发展规模受到限

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技艺传授模式比较单一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国内外同行和其他领域的成功实践经验均表明,紧跟新时代的科学的技艺传授模式能有效促进“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更好发展。

(1)以传承人为核心,培养传承团队。确保传承人进行活态化传承是目前“非遗”保护的首要任务,所以,对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传授来说,发掘新生代的传承人至关重要。“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复杂性、技巧性和艺术性等均对传承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故其新生代传承人的培养决非一日之功,必须经受长期的锻炼和各种严格的考验。

同时,在当代“非遗”语境下,仅凭传承人的一己之力,很难实现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科学与充分发展。因此,应以传承人为核心,培养实力雄厚的传承团队,依据技能水平、年龄、特长、分工等搭建“金字塔”型的人才队伍,从而实现“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最佳传授效果,进而使其持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2)融入地方学校课堂,汇聚丰富的人才资源。将“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融入地方中小学与高校课堂,能够极大地拓宽其受众面,使教师和学生都成为其最直接的传授对象。这种模式具有多重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拓展研发团队,汇聚新生代人才资源,培养潜在的未来市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等;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学校课堂教学资源;此外,还可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传承人和传承团队。

(3)通过工作坊、社区活动中心等打造活态化体验平台。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也是“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需要传授的人群之一。应协同传承人及其团队或其他相关研究人员通过工作坊、社区活动中心等打造活态化体验平台,手把手地亲自教授,以立体化传授方式引导广大群众深入“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项目,带领他们重新认知其蕴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美、掌握基本技能,并进一步参与到未来的相关传承活动之中。^[4]

三、“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广泛传播

每一种文化艺术的发展都需要推广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传播具有速度更快、受众更广、效率更高等特点。因此,为促进民间传统手工艺更快、更广地传播,应充分运用并不断开拓当代多元化的传播途径。

1. 互联网传播

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当代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互联网+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目前也已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甚至成为传统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赋予人们高效、迅捷的即时传播体验,所以,将当代互联网技术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相结合,是民间传统手工艺更快、更充分、更有效传播的重要途径。当代互联网传播可根据传播载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网络教育学习平台、网络媒体、自媒体、网页、搜索引擎,以及各类APP等。结合不同类别的“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自身特点,从丰富的互联网传播途径中发掘与之相适合的途径,有助于实现精准高效传播,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发链式传播。

2. 影视传播

影视传播以动态的影像为表现形式,具有广泛性、时效性、时代性、直观性、艺术性等特征。电影与电视是人们认识、了解“非遗”的重要桥梁,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民间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影视节目。《留住手艺》《指尖上的中国》《非凡匠心》《大国工匠》等影视节目,将我国现存的许多优秀民间传统手工技艺,以纪录片或综艺的形式,探寻传统手工艺背后深藏的秘密和神奇制作方式,用镜头呈现出别样的匠艺与慧心,进一步拉近了人民群众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之间的距离,甚至引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对某些优秀的“非遗”的时尚追逐。此外,当下的热播电视剧《延禧攻略》也是“非遗”通过影视传

播成功的重要实例。剧中大量人物的服饰精美考究,制作工艺上融入了刺绣、缂丝、绒花等多种“非遗”技艺,且均由老师傅亲自制作,甚至邀请了传承人进行亲自指导。随着该电视剧的热播,剧中赏心悦目的精美服饰不仅使观众们领略到了“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艺术之美和文化之美,而且还使这些近代少为人知的“非遗”通过活态化数字化传播,重新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并开始以新的方式进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

3. 活动传播

活动传播是以活动形式进行的传播。近年来,随着国家和社会对“非遗”价值的重新认知与发现,为民间传统手工艺量身定制的各种规格的传播推广活动频繁涌现,如非遗博览会、“文化遗产日”非遗系列活动、非遗保护论坛、非遗文化进社区等。“非遗”活动传播应避免传统式的纯静态展示或过度的产品营销,突出活动的情景化、体验化与活态化,通过非遗传承人或手工匠人的现场演示,将原汁原味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全方位展示给观众。尤其应重视与现场观众的面对面互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邀请观众与大师一起现场制作。活动传播所提供的面对面的交流与身临其境的现场参与式体验,是其区别于其他传播途径的最大优势,也是当代“非遗”语境下推动民间传统手工艺真正扎根民间、进一步深入民心的关键。

四、“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突破与创新

进入新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消费需求与价值观念等均烙上了新的时代印记。当代“非遗”语境下,民间传统手工艺一方面应保护其原生态发展,另一方面应以当代人喜爱的方式融入当代日常生活,这也是其当代传承的重要目标。这里的关键是应突破传统,汲取当代设计理念、管理模式、品牌策略等,进行大胆创新,从而找到“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与当代新的日常生活的结合点。

1. 运用新材料、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对于民间传统手工艺而言,其制作技艺的非物质性必须以物质性的东西(器物)为载体进行展现。因此,以“非遗”为依托,进行物质化的产品(器物)开发,不仅可突破其传统的固态式保护,还可激活“生产—开发—保护—再生产”的链式传承模式。^[5]当代各种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为民间传统手工艺的新产品开发提供了更丰富的表现可能,也为促进这类传统手工艺更好地融入当代日常生活创造了条件。通过生产性保护可实现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本转化,进而反哺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由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其新产品的开发中应避免因一时的私利而盲目地进行现代工业式的规模化生产。产品的粗制滥造、过度的跟风模仿、不良竞争的加剧等,都将破坏市场健康发展的秩序,甚至会导致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类产品的开发可分为五种不同的梯度,也可称为“梯度开发”^[6]。其中,一度开发,是指原汁原味的复制;二度开发,是指保持原材料不变,根据市场需要与审美需要所进行的变量开发;三度开发,是指保留原有形态,同时改变制作材料与大小;四度开发,是指保留精华部分,进行选择性的开发;五度开发,是指深度发掘新的文化元素与新的视角,进行深度开发。科学合理的新产品开发策略有助于“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走出困局,走上迎合新时代需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日本石田竹工艺店第二代传人石田正一于2006年春夏巴黎时装周担任“三宅一生”品牌的服装制作,用竹子制作裙子,此外,他还受客户委托用铝条代替竹条进行编制,然后将作品装饰于名古屋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堂天顶之上。^[7]

2. 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区域旅游业

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要坚持“文化传承,彰显特色”的基本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

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8]。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备受瞩目的过程中,建设有文化传承、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和民族气质的魅力城镇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与目标。“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因其蕴藏着丰厚的地域文化、历史、艺术等价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将这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旅游、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品牌形象塑造等进行紧密结合,不仅能为其当代传承创造良好的时空环境与丰富的产品展示、销售平台,还有助于打造区域文化特色、充分利用区域性的产业集群效应,不断推进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特色鲜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将直接驱动区域旅游业,这一点从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得到印证。1980年代以来,日本在小城镇建设中充分利用地域特色资源,打造特色城镇,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使不少优秀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大放光彩,如群馬县水上町的“竹编之家”和“陶艺之家”、岩手县的“盛冈手工村”等。^[9]日本“一村一品”的发展理念已得到许多国家的高度认可,并成为当代城镇化发展、“非遗”类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的重要借鉴。

五、结语

丰富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是祖辈们世代亲近自然创造出的民族文化瑰宝,它们绽放出的奇光异彩,时刻让人们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新时代,充分认知其时代价值,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新设计手法,促进其当代传承,不仅能够促进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材料、传媒、设计理念等均会推陈出新,“非遗”的具体传承方法也会随之持续丰富。中国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是庞杂而高深的,每一

种手工艺类型均有其独特性,所以在其传承实践中最科学的态度还是灵活应变。至今,尚无一种研究方法能够以一概万,因此,本研究也必然存在诸多局限性,在此仅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10]。把握时代机遇,传承精湛技艺,勇于突破创新,紧密结合新的时代生活所需,民间传统手工艺必将开启美好的未来、走向世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通知[EB/OL]. (2017-03-24)[2018-07-1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24/content_5180388.htm.
- [2] 周淑萍. 语境研究:传统与创新[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32.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17-01-25)[2018-07-15].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 [4] 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陕西剪纸·咸阳渭南卷[M].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24.
- [5] 肖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产业研发[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117.
- [6] 苑利,顾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42-143.
- [7] 日本樱花编辑事务所. 京都手艺人[M]. 刘昊星,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24.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 北京:新华社,2014:4.
- [9] 秦永福. “一町一品”运动——日本“社区文化”总体营造中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开发[J]. 上海工艺美术,1996(2):18.
- [10] 桓宽. 盐铁论[M]. 陈桐生,注释. 北京:中华书局,2015:297.



引用格式:杨远,朱畅然. 先秦时期舞蹈图案研究——以考古发现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96-103.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096-08

先秦时期舞蹈图案研究

——以考古发现为例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dance patterns in the pre-qin period

—Taking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for example

杨远,朱畅然

YANG Yuan,ZHU Changran

郑州轻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彩陶、青铜器等器物上,有一些表现人物舞蹈活动的题材。就目前发现来看,依据功能进行分类,其舞蹈图案主要有巫术仪式舞蹈、图腾崇拜舞蹈、宴饮娱乐舞蹈三类,其中前两类主要见于史前时期的彩陶装饰图案中:马家窑时期的“二人抬物”舞蹈和组群舞蹈图案,反映的是巫术仪式舞蹈活动的场面,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而人形蛙纹舞蹈,可能是马家窑人在舞蹈活动过程中的装扮形象,是对当时蛙图腾崇拜活动的形象记录。宴饮娱乐舞蹈主要见于东周青铜器的画像故事纹中,其图案结构严谨,人物形象多变,服装华美,乐器较多,构图上更加丰富,相比图腾舞蹈、巫术舞蹈多了些柔美和华丽,舞蹈更注重其娱乐功能。这种舞蹈功能的变化,反映了人类从模仿动物祈求神祇护佑到自我娱乐的过程。

关键词:
马家窑文化;
舞蹈图案;
巫术仪式;
图腾崇拜;
宴饮娱乐

[收稿日期]2018-11-0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BYS027)

[作者简介]杨远(197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艺术考古;朱畅然(1992—),女,辽宁省法库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史。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展示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如先秦时期彩陶、青铜器上的舞蹈图案,反映了我国早期舞蹈活动的发展过程。而这些图案在发现之初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对其进行了个案研究,但对其反映出的舞蹈艺术发展的过程至今尚未见纵深研究,尤其是其所折射出的舞蹈功能的变化,尚未引起注意。鉴于此,本文拟以考古发现的舞蹈图案为例,对我国先秦时期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

就目前的发现看,先秦时期的舞蹈图案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巫术仪式舞蹈、图腾崇拜舞蹈、宴饮娱乐舞蹈。现分述如下。

一、巫术仪式舞蹈

在原始宗教、巫术仪式活动中,舞蹈是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舞通神”是其重要的环节和其重要作用所在,它常使信徒和舞者进入颠狂状态,客观上也使舞蹈艺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马家窑文化时期可能已经产生了具有巫术仪式功能的乐舞。

1995年,在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宗日遗址M192出土了“二人抬物”彩陶盆^[1],通高11.3cm,口径24.5cm,底径9.8cm,细泥制作,唇外侈,略鼓腹,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小钮,盆内外均为黑彩,内壁绘有四组对称的二人抬物图形和横竖线,人物相向而立,身微前倾,双臂前伸,共抬一圆形物,人物与横线之间用竖线隔开,下面是平行纹,盆口沿饰三角纹和斜线条纹,盆外彩绘有平行带纹和单钩纹(见图1)。

对于这种“二人抬物”纹饰的内涵,学者们发表了不同意见。汤惠生^[2]认为这是一幅极为珍贵的有关原始公礼的形象描绘,整幅图案所描绘的乃是“公”的祭礼^[3],多人共同从事祭

祀,乃是一种“公”的象征记录^[4]。霍福^[5]从劳动的形式和劳动的内容两方面进行解读,认为“二人抬物”图案是我国最早表现古人夯筑墙体的劳动场面。李锦山^[6]则提出该纹饰展现的是原始播种祭祀场景,认为二人所抬球状物应当视为谷粒,但现实生活中绝无如此硕大的种籽,它只是祈殖巫术中使用的模拟性道具,具有象征意义。刘铮^[7]则认为“二人抬物”纹样体现了取水归来的生活场景,是当时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精彩瞬间,是叙事型绘画风格的一个典型代表。邵明杰^[8]认为该纹样似为在行祭祀仪礼之乐舞或驱鬼逐疫之乐舞。

我们认为,“二人抬物”纹样应该是祭祀舞蹈的形象反映,可能是对羌人祖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跳羊皮鼓舞的形象描绘。宗日遗址有两处祭祀遗迹,一处是墓上祭祀,一处是祭祀坑,这说明当时已经存在祭祀活动。据《后汉书》《新唐书》记载,河(黄河)、湟(湟水)、挑(挑水)、岷(眠江上游)之间是古代西羌散居之地。俞伟超^[9]认为,马家窑、庙底沟、半山、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可能是发展较早的一些羌人文化的前驱。因此,这种图案可能描绘的是羌族先人的巫术活动。如今羌族仍保留着最隆重的民族祭祀节日——祭山会和羌年节,分别于春秋两季举行。春季祈祷风调雨顺,秋后则答谢天神赐予的五谷丰登。在祭祀活动中,跳羊皮鼓舞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羊皮鼓严格说来原本不是常人跳舞所击之物,其最重要的功用在于它非释比*莫属,是羌民社会中释比在击鼓跳舞以请神驱祟仪式中使用的具有神圣性的法器^[10]。传说放羊娃偷走天书后,在放羊途中劳累睡着了,醒来时,所有的天书都被一只头羊吃进了肚里,正着急时,树上的金丝猴对他说:“羊子吃掉了你的经书,你快杀掉山羊,用山羊皮制成鼓,做

* 释比是羌人对羌族民间男性经师的一种称呼,有惩恶扬善、主持公道的意思。

法事的时候,敲起羊皮鼓,经文就会脱口而出。”此法果然灵验,从此以后,释比们举行相关巫术仪式时就大跳羊皮鼓舞^[11]。

羌民在祭山会、羌年节等祭祀活动中,经常要跳羊皮鼓舞(见图2a),有单人舞、双人对舞和群舞(6-8人组成一个舞队)等形式。对单人羊皮鼓场景的剪影处理后可看出(见图2b),其是一个人双手捧一圆形物的造型。图2c)是三组双人羊皮鼓舞,对其中两组进行剪影处理后,比较清楚的是左边一组(见图2d),这组剪影看到的是两个弯腰抬着圆形物的人,看起来就是两个人在搬着一件圆形物体,与宗日遗址“双人抬物”极为一致,而且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发现有陶鼓等遗物^[12]。由此可见,“二人抬物”图案可能就是对羌人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跳羊皮鼓舞的描绘。根据马家窑时期陶鼓与祭祀活动出现的事实,我们认为祭祀活动的舞蹈也已经出现。

但由于绘画角度或是先民的绘画技法有限的原因,“二人抬物”图将两个跳羊皮鼓的小人的鼓重叠绘制,或是当时的羊皮鼓稀缺,两个人同时击打一个羊皮鼓。“二人抬物”图的小人下方有五道水平横线,最上方一道代表地面,其下四道代表水波纹;在每组舞蹈的小人左右两边各有一组竖线,可能是近处树木的简化,竖线中间的短横线整齐划一,可能代表道路。整个图案,可能表示宗祀之日人们来到湖边的森林中,为举行某种巫术仪式而欢快地跳着羊皮鼓舞。

马家窑文化还出土了两件舞蹈纹彩陶盆,其中一件是1973年秋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编号为M384)的彩陶盆^[13],口径29 cm、腹径28 cm、底径10 cm、高14 cm,器形



图1 马家窑时期彩陶盆

较大,敛口、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唇与内外壁均有彩。其主题纹饰为舞蹈纹,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为两道(见图3a)),似反映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繁之意。另一件是1994年出土于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编号为M157)的彩陶盆^[14],口径26.4 cm、腹径26 cm、底径5.2 cm、高12.3 cm,折沿,微敛口,平底。在橙红色泥胎上用黑彩描绘出精美的图案,上腹彩绘三线钮结纹,口沿绘斜线与三角纹,盆内彩绘两组舞蹈人像,分别为11人和13人,中以圆点弧线间隔(见图3c))。

这两件彩陶盆舞蹈纹的展开图(图3b、3d)大致相似,以下简称“大通盆”和“同德盆”。两组舞蹈纹的图案颜色较深且能清楚地分辨出人物的动态。两组小人舞群都在水平四圈平行带纹和一圈较粗的平行带纹中。可以看到,两组平行带纹的绘制并不均匀,最上端一圈明显粗一些。小人头顶上的一圈平行带纹也较粗,上下两条较粗的平行带纹除有装饰的作用外,还被赋予了“天”和“地”的含义,表示人类活动在天地间。我们认为下面三圈带纹象征着水波,此陶盆若盛



图2 羌民跳羊皮鼓舞时的场景

水,在四圈平行带纹最上端一圈的位置,可以隐约看到其他三圈带纹如同水波一般,舞群似在池边跳舞,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趣。^[15]

此外,每组舞蹈图案两边各有相对弧线纹若干条,其为装饰纹样,线条流畅,间隔相等。在每两组相向的弧线纹之间有一条斜行的柳叶形宽带纹,大通盆有3组,同德盆有2组,后者在柳叶形宽带纹上下各有一个圆形纹。笔者推测,舞者两边的弧线纹可能为河边的树干或者垂柳的枝条,为了突出舞蹈的优美,河边的树干绘成弯曲的弧线,与人物的手臂弧线相呼应,较好地衬托舞蹈之美^[15]。

大通盆上的舞蹈图案为每组五人手牵手状,面向一致,小人头上有类似于发辫的装饰,都偏向一侧,每组靠近外侧的两个舞蹈小人的外臂上均由两条短线组成,像是模仿舞蹈动态幅度之意^[16]。每组小人都以一足支撑重心,另一足做起势或落势的舞蹈动作,小人下体有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为两腿,下腹体侧有一斜道。李泽厚^[17]则从古史文献记载与舞蹈纹中人物的装饰上推测,孙家寨彩陶的舞蹈纹表现的是一种巫术活动,具有严肃的巫术作用,舞蹈纹中的人物臀部的斜出之物为操牛尾,头部的装饰是干戚羽旄。我们认为,舞群大腿根部斜道是先民模仿西王母的一种祭祀活动,手拉手的五位女性在柳条垂落的小河边跳着祭祀的舞蹈。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是古代人们在祈求神

的庇佑活动时的一种记录^[15]。彩陶盆上的整个舞蹈画面,人物突出,用实线条表现,重在写实,描绘了先民们在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边,手拉手集体跳舞祈求神庇佑的情景。

同德盆上的舞蹈图案为一组11人、一组13人,手牵手欢快地跳舞,她们的舞姿较为随意,节奏并不一致,应该是重仪式、轻韵律的一种反映。关于小人腹部的形状,我们认为可能是妇女所穿的宽大裙子或是怀孕妇女大肚之形(怀孕妇女祈福求子)。有学者认为,这些舞者手臂相连,应该是在表演一种连臂舞,而这种舞蹈与生殖巫术有密切关系^[18]。我们认为,这种舞蹈可能是穿着短裙的同德美丽的少女们为祈求神祇护佑所跳的一种巫术舞蹈,其舞蹈的目的和大通舞蹈一样。

由此可见,张家窑时期彩陶盆上的“二人抬物”舞蹈和组群舞蹈图案可能反映的是巫术仪式舞蹈活动的场面,具有较强的功利性。

二、图腾崇拜舞蹈

图腾崇拜是早期人类表达信仰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我国史前时期的彩陶装饰中极为常见,其中有的舞蹈图案可能就是图腾崇拜的反映,而这些图案可能是对一些动物动作的模仿。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曾提出:“有时候舞蹈不过是对动物动作的简单模仿。”^[19]但这种模仿,反映的可能是人类的动物崇拜习俗,如马家窑文化发现的蛙形舞蹈纹,应该就是图腾崇拜的典型反映。

1977年在甘肃兰州土谷台先后发掘了84座墓葬^[20],其中,M31是一名成年女性和一名儿童的合葬墓,出土了一件泥质红陶变体人形鸭形壶(见图4a)),绘有无头变形蛙纹和有头变形蛙纹各一个;M53为一名儿童墓葬,出土了变体人形无耳盆一件,盆内饰两个变形蛙纹,头呈圆形,内填双格线菱形网格,口沿饰交错的锯齿纹(见图4b));M18为一名成年男性和一名成



图3 马家窑时期手拉手舞蹈纹盆

年女性的合葬墓,出土了一件双耳壶,肩饰四个有头变形蛙纹(见图4c);M84为一名成年男性和四名儿童的合葬墓,出土了一件变形蛙纹无耳盆,盆内饰有一个大头蛙纹,内填棋盘网格,前腿前端有4个分爪,沿外有垂弧纹(见图4d))。

用蛙纹作装饰,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彩陶中就已经出现,但都比较具象。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马家窑类型彩陶,而在半山类型以后的彩陶中很少发现有写实的蛙纹(见表1)。这几件器物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的彩陶。从以上图案看,半山类型以后蛙形纹开始简化,更加几何化、抽象化,表现的是似人似蛙的手舞足蹈状。这种变形的蛙纹是先民把蛙神话成人还是把人妆扮成蛙神?我们认为,这种舞蹈行为的图像应该是图腾崇拜乐舞的反映。在原始宗教中,先民们把与自己氏族密切联系的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族徽或图腾标志,将其奉为自己的祖先或保护神。在图腾崇拜的仪式中,人们用舞蹈的方式颂扬祖先和神的功绩,以求神的庇祐,这是人类社会早期常见的一种娱神媚神的活动。

图腾舞蹈是人模仿、装扮成图腾动物形象

的一种活动。覃守达^[22]认为,模拟图腾的形象,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图腾,得到图腾的帮助与庇护,如塔吉克族人舞蹈作鹰飞行状以及朝鲜族的鹤舞、龙舞、狮舞等。在我国广西,壮族还保留着蚂拐(青蛙)节的习俗,传说他们认为掌管风雨的是青蛙女神,因此在每年春节到来之时,村寨都会举行一次隆重热烈的蚂拐节歌会,敲锣打鼓,跳蚂拐舞,唱蚂拐歌,共庆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见图5)。

笔者推测,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马家窑时期的先民总结出:听到青蛙叫声后就会有雷神打雷,随后便会下雨。因此他们可能认为蛙是雨神,遇到大旱天气,先民们模仿青蛙跳舞并模仿青蛙的叫声,这样雷神听到后就会下雨,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遇到大水泛滥成灾,先民们也会模仿青蛙跳舞祈福,表明自己是蛙的后代,洪水不应对自己造成伤害等。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青蛙有繁殖力强的含义^[23],因此跳蛙舞祈福也可能含有希冀后代繁衍旺盛的生殖崇拜理念。

李智信^[24]曾经提到,人纹的产生应该是人们渴望反映自己并长期地探索其表现形式的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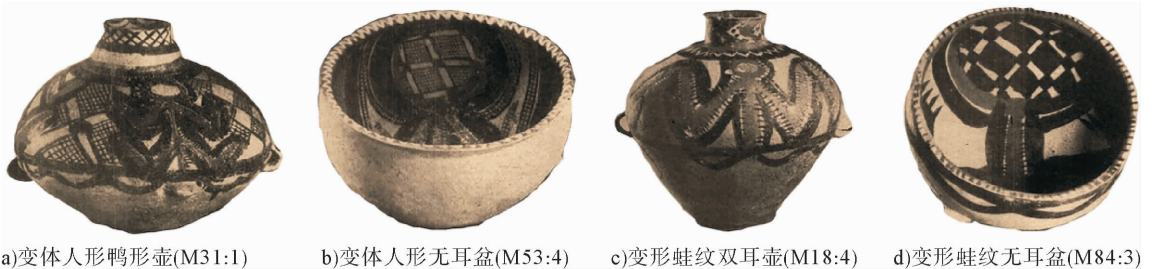


图4 半山、马厂时期变形蛙纹彩陶盆

表1 彩陶蛙纹从半坡类型到马厂类型的变化^[21]

纹样	半坡类型	庙底沟类型	马家窑类型	半山类型	马厂类型
蛙纹					



图5 壮族青蛙节蛙舞场面

果。总之,这种人形蛙纹,可能是马家窑人在舞蹈活动过程中的装扮形象,之所以把这类舞蹈场景绘制在彩陶上,应该是对当时蛙图腾崇拜活动的形象记录。

三、宴饮娱乐舞蹈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出现了把人的生活描绘在青铜器画像中的纹样——画像故事纹题材^[25],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就是贵族宴饮娱乐舞蹈。青铜器上镶嵌或刻画的宴饮娱乐舞蹈纹,主要见于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淮阴高庄战国墓、成都百花潭中学M10、河南辉县琉璃阁M1、陕西凤翔王寺等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

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现战国宴乐铜壶^[26],通高40 cm,口径13.4 cm,腹径26.5 cm,足高2 cm,小口、长颈、斜肩、深腹、平底、圈足,肩上有兽面衔环,有盖,盖面微拱,上有三鸭形钮,纹饰以铅类矿物镶嵌而成,其中壶的上腹部饰以舞蹈纹、弋射等图像(见图6a))。

1977年,陕西凤翔王寺出土的一件战国初期的镶嵌射宴壶^[27],通高40 cm,口径10.8 cm,腹径23 cm,足高3.4 cm,小口、长颈、斜肩、深腹、平底、固足,肩有兽面衔环一对,造型与百花潭宴乐铜壶一样,壶身以带状斜角云雷纹将壶身隔为四层,每层用金属片嵌出各种图案(见图6b))。

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一定社会生活情景的写实性纹饰,开始出现在青铜器装饰中,狞厉的美逐渐为清新的艺术风尚所取代,其中,宴饮、乐舞等写实性纹样表现的是那些突破了礼制限制的权力新贵们尽情享受快乐的情景。此时的舞蹈,其娱乐功能加强了,更加轻盈、飘逸、柔媚。已经发现的青铜器物纹饰大致都制作为上下层的环带状布局与构图,但又因各类器物存在着造型差别而各有不同^[28]。

成都百花潭宴乐铜壶展开图(见图6c))有多层装饰,其舞蹈图像位于第二层。这一层图案可分左右两组,其中,左面一组表现的是宴乐、武舞图象,人物都佩戴有帻;左部上层为宴饮,下为奏乐,分别有击钟、击磬、吹笙、打鼓和丁宁等。再向右,有七人,四人面向左边站立,着长裳,佩剑,分成两行,右手前伸,微向上曲,左手持矛,矛柄饰带三条,作舞蹈的姿态,似即《礼记·乐记》所说的“干戚之舞”,也就是武舞。这一武舞造型,可能取材于本地固有之“巴渝舞”^[27]。

凤翔王寺镶嵌射宴壶展开图(见图6d)),是上、中、下三层的带状布局与构图,其中第三层镶嵌宴饮、乐舞图三幅,是一幅表现战国时代贵族生活的风俗画。室内左起第一人,即主人,面朝右跪坐在高台之上,头戴冠,腰佩短剑,右手扶在一盛器上,左手伸向前方似接物状,头上方悬挂一张弓。主人的前方有面向左边为他进食和献艺的奴仆七人。其中,第一名侍者高举觶递给主人,在他的前方放置两觚;第二名侍者两手持



图6 青铜器上的乐舞

觶,第三、四人双手下垂作舞蹈状;第五名侍者站立于另一室,左手执觶,右手执一似勺状物,面前有两釜置于架上,其后为两舞人。显然这三人和建筑又是一套模板,与左边画面拼装在一起,是为烘托新兴地主阶级享受生活的宏大场面。在这组图像的最下端嵌错有甗、鼎与鱼,它们与室内的饮宴舞蹈活动有着内在的联系^[29],这表明这种舞蹈是为宴饮活动助兴娱乐的。

从上述两组铜器刻纹所刻画的面看,其舞蹈形式应该是古代贵族宴饮时进行的舞乐助兴表演,其图案结构严谨,人物形象多变,服装华美,乐器较多,构图更加丰富,相比图腾舞蹈、巫术舞蹈多了些柔美和华丽之感,相比巫术舞

蹈,其是在室内进行,而且常与宴饮结合,观赏者在欣赏舞蹈、赏心悦目的同时,也展现出自己作为贵族尽情享乐的情景。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舞蹈更注重的可能是其娱乐功能。

四、结语

从马家窑时期彩陶上的图腾舞蹈、巫术舞蹈,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娱乐舞蹈,形象地反映了我国传统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也折射出我国早期社会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的发展变化过程。从图腾崇拜乐舞到巫术仪式乐舞再到娱乐舞蹈,也反映出我国早期舞蹈的变化,是从人类模仿动物以求神祇护佑再到自

我娱乐的一个过程。随着人类的思想进步及时代的发展,舞蹈的种类也不再单一,包容性与创造性增强,习俗、宗教、祭祀、舞蹈、娱乐等内容作为素材都逐渐进入了生活舞蹈的范畴。

参考文献:

- [1]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名族博物馆. 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1998(5):7.
- [2] 汤惠生. 舞蹈盆及二人抬物盆释义:宗日遗址文物精粹及论述选集[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
- [3] 汤惠生,张文华. 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62.
- [4] 汤惠生,乔虹. 连臂舞的人类学考察[C]//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256.
- [5] 霍福. 宗日“二人抬物”彩陶盆解析[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4):49.
- [6] 李锦山. 二人抬物纹彩陶盆与祈殖巫术[J]. 文博,2005(1):56.
- [7] 刘铮. 宗日彩陶“二人抬物”纹寓意探析[J]. 文博,2013(2):31.
- [8] 邵明杰.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乐舞资料浅论[D].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0.
- [9] 俞伟超. 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J]. 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1):2.
- [10] 李祥林. 羌族羊皮鼓及其传说的人类学解读[C]//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2011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论文集[C].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20.
- [11] 四川阿坝州文化局. 羌族民间故事集[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295-299.
- [12] 彭云,马兰. 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1984(5):393.
- [13]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J]. 文物,1978(3):49.
- [1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名族博物馆. 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1998(5):7.
- [15] 朱畅然. 史前到北朝陶器物上舞蹈图案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05.
- [16] 潘旖妍. 生命之舞——对舞蹈纹盆纹饰的浅层图像解读[J]. 水墨丹青,2012(5):73.
- [17]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1.
- [18] 邵学海. 先秦艺术史[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43.
- [19] 普列汉诺夫. 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M]. 曹葆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99.
- [20] 魏怀珩. 兰州土谷台半山—马厂文化墓地[J]. 考古学报,1983(2):182.
- [21] 杨小能. 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M]. 唐际根,孙亚冰,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01.
- [22] 覃守达. 壮族蛙舞审美人类学考析[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3):22.
- [23] 袁磊,卢自宝. 最本原的精神——浅析传统蛙纹的内涵表达[J]. 艺术与设计(理论),2018(4):127.
- [24] 李智信. 关于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与蛙纹的几点看法[J]. 考古与文物,1995(4):48.
- [25] 杨远. 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52.
- [26] 四川省博物馆. 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J]. 文物,1976(3):43.
- [27] 韩伟,曹明檀. 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J]. 文物,1981(1):16.
- [28] 朱军献. 东周青铜器造型与人物画像纹饰[J]. 中原文物,2017(4):63.
- [29] 杨秉礼,李天荣. 试论凤翔高王寺镶嵌射宴壶[J]. 西北美术,1997(4):23.



引用格式:周紫薇,吴小华,孔莉莉,等. 基于VR技术的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叙事重构[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1):104-108.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1.01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9)01-0104-05

基于VR技术的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叙事重构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contingency plans for warship mission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周紫薇¹,吴小华¹,孔莉莉¹,周学广²
ZHOU Ziwei¹,WU Xiaohua²,KONG Lili¹,ZHOU Xueguang³

- 1. 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设计系, 上海 210000;
- 2. 海军工程大学 信息安全系, 湖北 武汉 430033

摘要:叙事重构是在对故事作观察、调查、剖析后,由叙事者加以主观能动性的诠释化理解而重构故事的过程。运用叙事学理论,结合舰艇航行、舰艇灭火和舰艇防空三个典型任务,依据时序、角色、空间和非线性特性,可得出四种不同的叙事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舰艇防空任务重构、舰艇角色重构和舰艇虚拟训练重构三种重构方法,从导演的角度重构舰艇作战场景、模拟任务训练过程、虚拟作战效果评估。据此,可开展舰艇防空预案的重构、舰艇角色数字化的重构和舰艇虚拟训练预案的重构,以重构舰艇作战场景、模拟任务训练过程、虚拟作战效果评估,为VR技术应用于军事演练提供了一种思路样本。

关键词:
叙事重构;
舰艇典型任务;
虚拟现实;
VR技术

[收稿日期]2018-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GJ003-152)

[作者简介]周紫薇(1992—),女,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叙事理论及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及应用;吴小华(1962—),男,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设计、企业形象策划。

[通信作者]孔莉莉(1976—),女,上海市人,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理论;周学广(1966—),男,江苏省高邮市人,海军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信息与通信系统、虚拟现实。

叙事是用口头、书面语言或者用静止的图像、动态的影像描述真实或虚拟的事件。法国学者 T. Todorov^[1] 提出了叙事学概念,把讲故事理论化;美国叙事学家 H. David^[2] 提出了后经典叙事学,关注叙事者与叙事内容的交互作用。解构是对结构进行中断、解体或分裂操作,叙事解构是创造者在自我理解作品的基础上,为了凸显作品的功能性、主题的鲜明性而对作品进行的分解和整理。叙事重构常见的就是编剧,即用另一种方法对文本内容进行选择性的重新构建,使叙事向重构者预设的剧情转变^[3]。

舰艇是执行海上作战任务、实现占领目标的主要作战平台,是移动的国家领土,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力量。舰艇的典型任务包括三类科目 8 种任务 19 个任务剖面^[4]。为了完成舰艇典型任务,指挥员通常把拟采用的行动方案预先编制为舰艇典型任务预案,以概括性语言表述,其实质等同于叙事。为了正确地了解下达任务命令的指挥员与上级的意图,参谋人员要重述任务(重构任务),阐述任务的 5 个方面:谁来做,做什么,何时做,在何处做以及为何做^[5]。其中,做什么、何时做和为何做通常由上级确定,本级指挥员只需要顺利地、完成这些行动就完成了舰艇典型任务。重述任务早期是采用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来实现的,1990 年代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不断完善,开始由大型计算机来承担重述任务。随着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元年(2016 年)的到来,通过创造数字虚拟场景,实现了具有沉浸、交互和想像 3I 特征的观赏沉浸感和视觉、听觉、触觉、行为,以及思维与虚拟场景的自然交互的成本的急剧下降。VR 在军事虚拟演练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军事虚拟演绎是军事专家用较少的投资,最低的风险去逼真地重演作战的过程,其实这是一种作战的叙事重构过程。运用 VR 技术和设备演绎舰艇训练任务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这使得基于 VR 技术的叙事重构应用在军事学上成为可能。

目前,叙事重构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少,且就事论事,在军事领域开展叙事重构理论研究的就更少。鉴于此,本文拟运用叙事理论编制舰艇任务预案,运用 VR 技术重演(重构)舰艇军事训练全过程,以达到提高舰艇军事训练质量、缩短舰艇装备研制周期、验证海军舰艇指挥理论和节省舰艇训练经费的目的,展示艺术与军事相结合的图景,供学界参考。

一、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叙事方法

海军舰艇典型任务预案是完成舰艇作战任务和舰艇航行任务而制定的预备方案,在指挥员下达执行某预案后,还需要下级战斗员重述预案,即分解和细化预案。分解和细化预案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1. 时序叙事

在舰艇典型任务预案里,叙事时按照逻辑关系对某个“现场”进行再现或表述的方式,一般存在顺叙、乱叙、倒叙和插叙四种。以舰艇航行任务预案为例,舰艇必然要经历备战备航、离码头、狭窄水道航行的步骤,才能进入海上航行。这个大的时序关系不能搞错,否则,舰艇就无法在海上正确航行了,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事,也就是要采取顺叙方式。

在舰艇防空任务预案里,敌方目标距离我舰的距离是一条重要的作战参数。何时使用远程防空与近程防空,取决于舰艇指挥员的指挥技能和战斗作风,也可能出现友邻作战单位(舰艇/飞机)主动为本舰开展防空作战的情况。因此,舰艇防空预案的叙事时序是随着战场变化瞬息万变的。也就是说,对舰艇防空任务预案的叙事方式应是乱叙。

在舰艇训练任务结束后的总结讲评会(讲话稿,属于军用文书一种)上,指挥员/训练机

构可以就某一舰艇执行任务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复盘,运用来自训练/演习全过程的所有作战参数记录加减到复盘操演中,谋求演习的最佳结果或者避免出现最坏结果。这里的叙事方式可以采用倒叙、插叙。

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时序叙事,更加强调舰艇训练任务的内在闭合性与可选择性;而舰艇训练任务讲评则与叙事重构的呈现方式更为接近,重构假设越复杂,结局推演越诡谲、不可测。

2. 角色叙事

舰艇典型任务预案主要对训练科目、演习方案、演习背景设置等内容进行规划设计,早期的舰艇典型任务预案大多采用图上作业、沙盘推演、作战模拟等军事叙事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反复推演(重构)舰艇完成任务的过程,修改、优化作战设定,从而提高舰艇指挥员的水平、能力和自信心。用模拟舰艇执行典型任务的检验性演习(包括研究性演习、示范性演习)来替代实舰实操(如实兵演习),是当代海军作战训练的重要趋势。

舰艇典型任务的叙事者是舰艇指挥员与舰上官兵。舰艇指挥员下达舰艇任务命令后,各二级部门会立刻响应,并根据任务要求与本部门的关系,按照平时训练结果带领手下的官兵执行、编制预案,有序地开展预案规定的动作、行动。美国海军开发的“虚拟舰艇作战指挥中心”能够让受训者体验到像实战一样的作战效果,这一点取决于舰艇官兵与训练预案之间的角色叙事。

3. 空间叙事

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空间叙事包括主角、旁视与第三方(无人机/威亚)。为揭示空间的布局、设计与人的习惯、路径变迁之间的关系,可用VGA空间句法分析等整合度分析方法,包括运用凸空间、视域和轴线模型三种方法^[1]。

在舰艇典型任务预案里,主角(第一人称视角)被预定为众多“屏幕”中的一个。这里的“主角”不特指人,也可以是一架飞机、一门近防炮。空间叙事的现时感,使叙事呈现出一种正在发生的状态,让受众在当下成为故事的见证者。将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空间叙事变成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由一个确定性的训练演化为一个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交互体验过程,可引导受众感知、参与训练过程,并由受众的参与度决定最终训练的完成度。

如果说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时序叙事是以舰艇训练、演习预案为主线,与文学叙事近似的话,那么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空间叙事则是以影像为媒介,以场景为叙事单位,兼具影像和文学叙事特征,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是军事指挥与传统艺术的交融。

4. 多线性叙事

多线性叙事在军事指挥中应用广泛,训练有素的海军舰艇部队官兵对此更是应用得心应手。以单艘舰艇机舱灭火任务预案为例,从着火点上报开始,舰长下达灭火命令,动力(分队)长、电力(分队)长和损管指挥中心分队长同步接到灭火命令后,各自有序地按照日常训练时的步骤纵向下达和执行相应的动作(见图1)。由图1可知,二级部门长(包括动力长、电力长和损管中心分队长)各自的指挥预案关系简单直接,而纵向多线性叙事时序关系极为清晰,反映出官兵日常训练的清晰的因果关系^[6]。

以美国海军为例,一个编队有9-13艘军舰,包括航母、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和供给舰等,这些军舰有承担编队防空任务的,有担负反潜任务的,有对岸攻击的,有对舰攻击的,所有这些任务呈现出多线性特质,考验着编队协同作战能力。对这些任务的叙事即为多线性叙事。1964年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武力干预突发事件200多起,大多数情况下动用了航

母编队,可以说,美国航母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是经过反复多次的军事演习、兵棋推演、实战应用才练就出来的。

以中俄“海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为例,这次演习实现了由练程序向练谋略的转变^[7],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先期筹划到组织实施,全程贯彻实战化要求;二是红蓝对抗“背靠背”,由原来的计划导调向计划与临机导调转变;三是统一了作战背景和战役情节,带动了海上科目和演习层次,凸显了海上战场的复杂性和双方高度的对抗性,提升了参训部队的谋略水平和指控能力。这种多国多舰艇共同执行任务也属于多线性叙事范畴。

二、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VR叙事重构

VR叙事重构是运用VR技术和设备开发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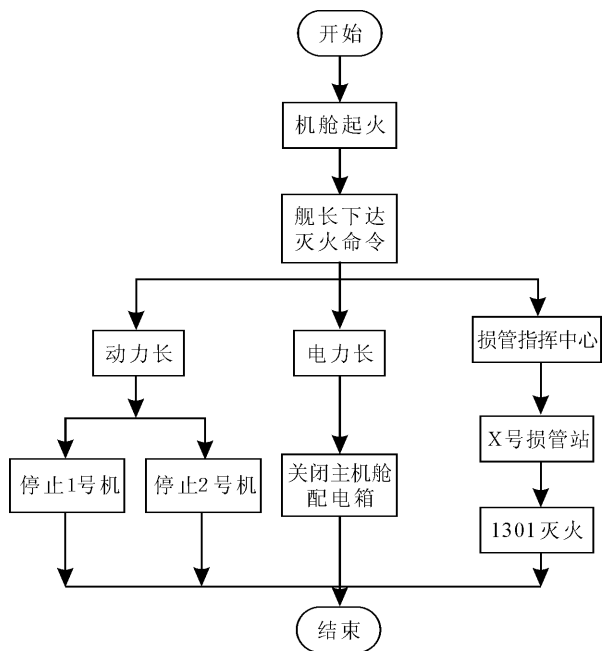


图1 舰艇机舱灭火流程图

够重演舰艇训练任务的叙事重构,是叙事重构向高级阶段演变的表现,它不仅可增强军事演习的互动性,还可满足人们对虚拟军事演习的多元化需求,并能提供更丰富的演习结果与交互体验。VR叙事重构可以从镜头语言、视听语言、叙事语言等多重角度,对影响军事演习情境构成的时空元素进行相关的理论分析研究,以阐述如何运用交互重构叙事手段进行虚拟军事演习。

1. 舰艇防空预案的解构与重构

舰艇编队对空防御作战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海军研究的热点,舰艇防空任务预案主要从空中目标类型、目标距离、目标攻击意图、目标角度、目标速度等因素考虑来袭目标^[8],因为空中目标速度与目标角度对舰艇防空的影响因素差异性不显著。舰艇防空预案的解构具体见表1。

由表1可知,重构舰艇防空任务就是编写舰艇防空作战预案。战争是一场巨大的行为艺术,是由一个个士兵和他们的行动来完成的,舰艇指挥员的指挥行为与行为艺术类。不同类型的舰艇要遵循“有什么枪打什么仗”的原则,根据舰载武器系统的不同,可由舰艇指挥员选择不同的舰艇防空作战预案,从而重构出效果各异的舰艇防空作战样式(见表2)。

2. 舰艇角色的解构与重构

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的角色构成包括舰艇、舰艇上的装备和执行任务的舰艇官兵。舰艇角色的重构步骤为:一是用可视化建模工具重构一艘数字化舰艇,涉及工作量巨大,需要有前期的相关舰艇参数准备与可视化工具;二是模块化各类装备,从舰载机到舰载火炮、车辆、舰艇

表1 舰艇防空预案的解构

目标类型	目标距离	目标攻击意图	威胁程度	叙事/作战应对方案
预警机、侦察机	> 80 km	雷达不工作	低	呼叫舰载机拦截
战斗机、轰炸机	6 km, 80 km	侦察雷达扫描	中	使用对空导弹拦截
反舰导弹	< 6 km	火控雷达扫描	高	使用近防炮拦截

专用设备,以实现积木化开发舰艇重构任务;三是涉及的人物重构必需突出特色,如军装及其相关标志、装备模型的蒙皮等内容。

3. 舰艇虚拟训练预案的解构与重构

舰艇虚拟训练任务是运用传统叙事重构理论重述(重构)数字化舰艇和舰艇任务预案,重演舰艇训练过程,注重运用VR技术、三维可视化、动画、数字媒体等艺术手法,实现军事领域VR创作的新突破。

一是数字化舰艇重构。为了解舰艇结构,可以开发船体结构检测与评估系统,通过准确的船体结构三维呈现软件,把船体知识传授给学习者。由于VR技术和产品得到了突破性发展,可以利用VR技术和设备,建设舰艇虚拟漫游系统,逼真再现舰艇结构,使参观者身临其境地了解舰艇。

二是舰艇典型任务预案编制。以舰艇损管典型任务预案为例,其包括空间定位、燃烧模型、灭火模型等内容,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设定高精度空间定位和科学燃烧、灭火模型,由参训者选择舰艇损管预案训练科目,进入全新的舰艇损管训练。在虚拟灭火训练场景预案编制中,可以使用火场仿真数据和仿真软件,使虚拟火场的叙事演化遵循规律;同时,可以将实际灭火经验编入损管辅助决策库,重构出科学的灭火交互模型。

三是重构舰艇演训过程。参训舰艇部队可根据训练计划编写演习方案,参加舰艇演训。在演训过程中,导演部(全知视角)可通过调整演习方案,改变演习力量配比,重构舰艇演训过程,实现舰艇典型任务演训的交互体验。通过建立完整的舰艇训练系统和评估体系,包括科

表2 舰艇防空预案的重构

舰艇类型	舰载机	对空导弹	近防炮
航空母舰	可用	可用	可用
驱逐舰/护卫舰	无	可用	可用
其他舰艇	无	无	可用

目设定、过程管理、成绩评估、数据统计等模块,实现舰艇演训的叙事,可以把训练过程全信息录制,设置并支持VR环境下的“时光穿越”式的舰艇训练过程回放(重演)。

三、结语

叙事重构是在对故事作观察、调查、剖析后,由叙事者加以主观能动性的诠释化理解,进一步客观重构故事的过程。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结合舰艇航行、舰艇灭火和舰艇防空三个典型任务,依据时序、角色、空间和非线性特性,分别得出了四种不同的叙事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舰艇防空任务重构、舰艇角色重构和舰艇虚拟训练重构三种重构方法,从导演的角度重构舰艇作战场景、模拟任务训练过程、虚拟作战效果评估,为VR技术应用于军事演练提供了一种思路样本。

参考文献:

[1] TODOROV T. Grammaire du décameron[M]. Mouton;The Hague,1969:132.

[2] DAVID H. 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M].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1-40.

[3] 周伟晨. 对话的营造——运用解构方法的再设计探索[D].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6.

[4] 杨根源. 海军作战指挥概论[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91.

[5]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定下战术决心的过程[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26.

[6] 张一品. 作者动画——中国当代动画的艺术实验[D].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5.

[7] 祁雷,张由琼. 实现由练程序向练谋略转变[N]. 南方日报,2016-09-20(A02).

[8] 林桦,王公宝,武从猛,等. 水面舰艇编队对空防御目标威胁评估分析[J]. 舰船电子工程,2016(10):16.